封皮：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by Charles Bettelheim***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Second period: 1923–1930***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 第二时期：1920-1930

**夏尔·贝特兰著（Charles Bettelheim）**

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翻译

夏尔·贝特兰对苏联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新解读，其第二卷充分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在1920年代对解体中的工农联盟的政策决定了苏联社会的未来。

到1921年，在1917年的革命中经历了摆脱战争、饥荒和地主压迫的农民，已经被多年的内战搞得筋疲力尽，心怀不满。当时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重建经济，这首先意味着必须重新建立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盟。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克对这场危机的回应。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对这本书的评论（*Monthly Review*，1977年10月）中指出，一条是把问题看作是短期的，通过奖励和让步来安抚农民，通过农业生产的增长使经济至少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在这种观点中，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对农民的革命改造被视为一个遥远的目标。

斯威齐指出，第二条路线是，将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视为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需要制定政策，既向农民提供物质援助和奖励，以说服他们相信合作化道路符合自己的最佳利益，同时把他们的观念从孤立的小生产者改造成有社会意识的社会成员。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是第二种路线，但党并没有按照列宁的意愿发展新经济政策。本卷的核心是讨论列宁去世后党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这也是苏联所有后续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核心。

**夏尔·贝特兰**1913年11月生于巴黎。自1948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的研究主任，并自1958年以来担任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les Centre d'Etudes de Planification Socialiste）的教授。他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研究中心和《计划问题》（*Problèmes de Planification*）杂志的主任。他于1936年在苏联工作，此后曾多次访问苏联。他曾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德国、以色列、墨西哥、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整个西欧进行学习和参加会议。他还曾多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曾在印度、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埃及和古巴担任技术顾问或经济顾问。他是许多文章和书籍的作者，包括《印度独立》（*India Independent*）、《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经济计算和所有权形式》（*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eté*）、《论向社会主义过渡》（*On transition to socialism*，与保罗·斯威齐合著）均由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

Printed in U.S.A.

Jacket design by Martin Stephen Moskof

SBN: 0-85345-437-X

Monthly Review Press

62 West 14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1

21 Theobalds Road, London WC1X 8S

**注意**：这本书的英文翻译使作者有机会检查他的一些参考文献，并因此修改了部分文本。

**目录**

[前言](#前言)

[对“第二时期”的简介](#对\“第二时期\”的简介)

[**第一部分 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

[1. 重建货币和财政体系](#重建货币和财政体系)

[2. 经济计划机制与程序的发展](#经济计划机制与程序的发展)

**第二部分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乡村。分化和阶级斗争。农业政策和农业社会关系的转变**

[1.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直接生产的社会条件](#新经济时期直接生产的社会条件)

[2. 新经济政策期间制约农业生产关系再生产与转变的经济社会条件](#新经济政策期间制约农业生产关系再生产)

[3. 农村地区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再生产与转变](#农村地区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再生产与转变)

**第三部分 工业和城市部门内的矛盾和阶级斗争**

1. 工业和城市部门内的矛盾的直接表现

2. 工业和贸易中私人部门和国家部门之间的矛盾

3. 国家部门的所有制形式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构

4. 国有工业在整个生产条件再生产过程中的整合情况

5. 价格、工资和利润的范畴及其阶级意义

6. 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

**第四部分 布尔什维克党内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变化**

1. 争取工农联盟的斗争

2. 争取快速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斗争

3. 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构成及其转变

**第五部分 “伟大的变革”和新矛盾的出现**

参考

索引

字母缩写和俄语词汇

Artel 一种特定形式的生产者合作社

Batrak 农业工人

Bednyak 贫农

CC 党中央委员会

CCC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 of the Party）

CCTU 工会中央理事会

Chervonets 一种相当于10个金卢布或7.7423克精炼黄金的硬币，从1923年开始发行

CLD 劳动国防委员会

CLI 中央劳动学院（Central Labor Institute）

CPR(B) 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CPSU(B)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EC（一个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

Elektrobank 资助电气化的银行

Glavk 行政长官（通常由一个人民委员部（People’s Commissariat）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领导）

Goselro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

Gosbank 国家银行

Gosplan 国家计划委员会

GPU 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警察）

Khozraschet 财务自主权（字面意思是“企业会计（business accounting）”）

Kolkhoz 集体农庄（通常组织为artel）

Kommuna 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比artel更深入，并根据成员的需要分享收益

Komsomol 共青团

Kontraktatsiya 农民与国家收购机构之间的合同制度

Kulak 富农

Mir 村社

Narkomfin 财政人民委员部

Narkomtrud 人民劳动委员会（原书这里有误——译注）

NEP 新经济政策

NOT “工作的科学组织”

OGPU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Orgraspred 党干部的组织和分配部

Osvok 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下属的负责恢复固定资产的特别委员会（参与经济规划）

PB 政治局

Perekachka 字面意思是“抽水”；用于将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相当于向农业征收“贡品”的概念。

RSDLP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

RSDLP(B)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Proletkult “无产阶级文化”；致力于推广这一概念的组织的名称

Prombank 工业融资银行

Promfinplan 工业和金融计划

Rabkrin 工农检查院

RKK 劳动纠纷解决委员会

RSFSR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Serednyak 中农

Skhod 村社大会

Sokha 木犁

Sovkhoz 国营农场

Sovnarkom 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国内通译“苏联人民委员会”，不能很好的表达“人民委员的会议”的意思）

Sovznak “结算票据”；战时共产主义下发行的货币

Splochnaya 某一地区的“完全”集体化

Supryaga 农民之间的传统互助形式

Toz 初级形式的集体农场（“共同耕种土地的协会”）

Tsekombank 负责资助市政事务的银行

TsGAOR 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

TsIK 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Uchraspred 党干部的登记和分配部（由Orgraspred取代）

Udarnik 生产突击队员

VLKSM 全联盟列宁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或称共青团

VSNKh 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ВСНХ）

VTsIK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WPI 工农检查院

# 前言

我在本卷中的目的是继续分析1923-1930年苏联社会转型的过程，确定这一时期成功与失败交错的方式，从而为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随后经历的胜利与失败做准备。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有必要确定将生产要素纳入其中的社会关系是什么，并尽可能清楚地重现（reconstruction）所考虑时期的基本阶级斗争。1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群众以及党员和领导人对实际社会关系的各种看法。最后，我们必须确定发生过的一系列冲突所围绕的理论概念和政治纲领的意义和社会影响。

因此，这种分析必须处理在几个不同层次上发展的复杂的客观过程，这必然导致变化，这些变化都以自己的速度进行，尽管所有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这迫使我们放弃任何一种理想化的方法，即声称要把苏联的历史“阐述”成某些“思想”的“实现”——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斯大林的思想。

换句话说，只有对苏联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的转变过程进行唯物主义的处理，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这一过程并从中吸取教训。

这样的处理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系列的著作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意，主要是受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启发，把苏联的历史表述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成果”。此外，这种理想主义方法是另一方法的“对等物”，尽管有着不同的“目的”，但相似地，这主要表现在道歉性质的著作中，这些著作将苏联的历史描述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国家决定的“结果”，并进一步假定，一般地说（也就是说，除了一些被认为已经或多或少迅速纠正了的“错误”之外），这些决定是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支配的，是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分析的结果。

对苏维埃形态（the Soviet formation）之历史的这些唯心主义处理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客观矛盾的运动、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以及看待现实的方式所起的作用（这些方式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且影响了群众的愿望和领导人的观点）贬低成背景（如果它们还没有纯粹或干脆地忽略它们）。要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苏维埃形态的转变过程，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2

唯物主义分析还要求我们拒绝将苏联的历史与任何理想的“模型”相比较，认为它在某一时刻“偏离”了这个模式，所以**从那一刻起**，一切都“走错了方向”。

因此，分析苏联社会形态的独特性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理解它所经历的巨大动荡的独特性质。考虑到苏联历史的特殊性，并不妨碍我们（恰恰相反）从它那里吸取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教训，因为这段历史在其独特性中具有普遍性，原因很简单，即除了以特殊性的形式存在之外，普遍性并不存在。

下面几页不会按时间顺序“介绍”1923-1930年期间矛盾的发展。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这些矛盾交汇的时刻，即1928-1930年，产生的一个危机，“新经济政策的总危机”。此外，我们还将看到，这场危机的一些重要方面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方式有关，也与逐步放弃新经济政策所表现的模糊形式有关。论如何，分析这场危机将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系列的矛盾，因为它们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并追踪它们在过去几年中的发展和交织的方式，从而使我们能够了解导致了1920-1930年危机的条件以及这场危机的阶级后果。

本卷所分析的矛盾首先涉及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阶级的生产条件（即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特征）是如何改变的，而且还必须描述工业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分配关系以及工人的组织方式所采取的形式。我们特别关注工人（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包括旧的资产阶级和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机器”（”machinery”）中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而通过这些“机器”，工人阶级可以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或者发现自己的活动被导向了某个方向。在这几年中取得的成功，与遭受的挫折一样，对1928-1930年危机的形式及其结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卷中还分析了农民及其各阶层与苏维埃政府结合的社会关系。

所分析的矛盾往往以经济矛盾表现自己。因此，应该让人们了解以价格、工资和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和隐藏起来的社会关系，以及工业和农业产品价格运动的阶级意义，这些运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工农联盟的命运。

我们的分析从根本上涉及到政治矛盾，但这些矛盾不能（像人们经常试图的那样）仅仅归结为各种反对派与政治局中的多数派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这些矛盾也是党的领导层制定的政治路线的内部矛盾，这条路线包括了矛盾的因素，这些因素在1928-1930年危机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这条政治路线经常与党和国家干部的实际做法相矛盾，而这种做法的后果迟早会对政治路线产生影响，导致其转变。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布尔什维克将其许多决定付诸实施的手段是有限的。这种限制是历史的产物。它与党在农民（构成苏联人民的绝大多数）中的存在不足有关，与国家机器的许多部分几乎不具备无产阶级性质有关，3也与国家机器的这些部分与劳动人民之间建立的关系之类型有关。

然而，限制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以及群众主动之可能性的不仅是由于政治因素，而且也是由一定数量的意识形态关系的发展所决定。因此，我们必须相当仔细地分析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的构成及其转变（ideological forma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s）（这些转变本身与整个社会形态中发生的转变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将看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一些观念，以及在群众中出现的一些观念，常常导致一些正在发展的矛盾之存在被掩盖起来，导致对那些被承认存在的矛盾的不正确理解（interpretation）4，或导致多少不太适当的决议被通过，即它们没有达到目的，削弱了苏维埃无产阶级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形成（Bolshevik ideological formation）的特点首先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无产阶级当时可以借鉴的有限经验。它们还与十月前和1917-1923年期间党内形成的冲突有关，因此也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中的矛盾有关。最后，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由意识形态构成在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时经历的变化和苏维埃形态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所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变化过程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导致了对苏维埃政府必须解决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更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特别是由于党与农民群众的联系薄弱，它促成了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偏离的观念之加强。还应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概念可以通过对马克思本人使用的某些表述的机械化理解，而被赋予虚幻的“合法头衔”。我们将看到，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在其1846年著作中所使用表述的运用，在这些表述中，“社会”作为一个“表现的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阿尔都塞用语——译者）出现，其中社会关系的总体似乎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这发生在那句著名的话上：“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这句话可以在狭义的经济主义-技术主义（economist-technicist）意义上进行解释。

本卷末尾用较多篇幅介绍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对它们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苏联社会形态中发展起来的某些矛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没有得到完美的把握，至于它们得到的不恰当处理导致了一系列未曾想到的后果，这些后果越来越难以控制。

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以最直接的方式暗含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中存在的一些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概念，在1930年代成为“既定的真理”，影响了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些政党。因此，这些政党在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诱导犯了与布尔什维克党类似的错误。6

对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矛盾和转变的分析，仍然与今天的关注点有关。即使是现在，一些有理由自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所采用的某些提法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这些提法在苏联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消极作用，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布尔什维克党所接受的、但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一些提法或论点密切的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继续以另一种方式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因此，布尔什维克党所说的，特别是从192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意义和关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的决定性作用，今天被苏联修正主义者重复了。通过重申这些公式，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其他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采用类似的说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论点所产生的结果，以拒绝苏维埃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拒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因为没有这些学说，就不可能将社会主义的斗争推向胜利。

因此，下面分析的核心是影响苏联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与影响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变化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只能在这里开始讨论。也许我的文章可以作为一个“摆正”这个问题的起点，这个问题被错误的表达为“个人崇拜”。它真正的意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因此只有在我的下一卷中才能分析。不过，对这个问题直接提出一些方法论上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价值的。

首先，必须指出，为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严格处理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分析苏联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及其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的联系。斯大林的问题，如果不放在这个双重过程中，就不能被正确地提出。从历史上看，斯大林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作者”。当然，他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但他的行为和决定所遵循的路线既不能脱离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也不能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手段，也不能脱离党内和群众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只有严格考虑所有这些客观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才能分析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以及斯大林的活动，并理解这种活动如何有助于维持十月的一些征服成果（conquests），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通过允许一些做法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它们的发展会大大削弱苏联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破坏掉了其中的一些征服成果，并深刻地动摇了工农联盟。但是，只有对苏联社会形态所经历的变化的具体形式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我们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的具体分析也表明，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是在多大程度上系统地集中了党的领导层的观点和一部分苏联群众的一些愿望。这些观点和愿望的性质在苏维埃形态的历史上并非都是一致的，因此，“斯大林问题”只有通过“划分时期”才能正确解决。

无论如何，在下面几页中，我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对它们的处理必然附属于对苏维埃形态所经历的变化过程的初步分析。

注释

1.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些斗争的了解只能是非常不完整的。当然，最重要的因素可以通过参考公布的文件，通过解释苏维埃领导人的讲话和党所通过的决定来掌握。但是，对群众的斗争和思想状况，特别是对构成群众的不同阶层的更透彻的了解，要等到以后，当目前对研究人员关闭的档案向他们开放时，最重要的是，当通过关心了解自己过去强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人民自己参与重现自己的历史时，才能实现。与此同时，我们只能看到最突出的发展——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2.在让·艾伦斯坦（J.Elleinstein）的《斯大林现象史》（*Histoire du phénomène stalinien*）一书中，我们发现理想主义的方法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相互交融。苏联所经历的发展被证明是某种社会主义概念“适应”俄罗斯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适应该国革命开始时生产力的低水平，适应其群众的最初状况。艾伦斯坦写道：“一个衣衫褴褛、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英译本，第32页），以及“沙皇传统和东正教礼仪”的负担（Ibid.，第56页）。正是在这种“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地形”上，发展了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类型”(法文版，第247页；英译本未收录)。因此，“起源神话”对分析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是有责任的。当然，拒绝这个神话并不意味着否认一些没有得到控制的矛盾对苏联社会形态产生的影响效果（这些影响是普遍的，因此可以在苏联以外的其他地方出现）确实采取了具体的俄罗斯形式。然而，当我们试图从苏联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时，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所经历的变化中找到有普遍意义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它们的具体形式中把握它们（这些形式将与具体的俄罗斯“地形”“有关联”），但也要超越这些形式的特殊性。

3.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全》43卷）关于这一点，见本作第一卷。由于缺乏使这种“机器”革命化的群众行动，它的特点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4.最能说明错误理解的例子是，有人试图把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歪曲”完全归咎于小生产的主导地位，以此来解释这些歪曲。事实上，这些歪曲也与集权主义政治关系的发展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在1930年代，当小规模的农民生产趋于消亡时，这些歪曲却变得更加严重了），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打击这种发展，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集中形式符合社会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支配要求。

5.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一卷

6.当然，如果某个共产党受到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一些错误论调的影响，那就必须在这个党的社会实践中，在它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中，在它的内部结构中，在它产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或多或少的能力中寻找原因，总结我们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

# 对“第二时期”的简介

本卷的目的是展示导致1928年初开始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矛盾的运动，并在1929年底达到高潮，彻底放弃了1921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1这一放弃对应着政治路线的彻底更改。这种改变的决定性时刻被斯大林本人称为“大转变”或“巨变”（“great turn” or “great change”）。2

下面的分析涉及到导致这种放弃的矛盾冲突、新经济政策本身以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真正结束的“伟大变革”。

只有对1923年至1929年期间苏维埃的形态所特有矛盾的交织和转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能使我们了解苏联在1930年进入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新时期，即五年计划的具体条件。这一新时期将在下一卷中加以研究。

## 1. 新经济政策作为工农联盟的政策

人们在讨论新经济政策时，往往认为它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政策”。它的名称（“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暗示了这样一种理解（interpretation），而最初为实施它而采取的措施似乎主要是为了恢复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并让农民拥有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更大的主动性。

1922年初，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还在说：“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3

然而，除了眼前的表象（这也是现实），以及“新经济政策”这一词汇所造成的混乱之外，新经济政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政策”。4它也远远超出了对农民和一些俄国和外国资本家的“让步”政策。

实际上，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一种“退却”**，即最初用来定义它的比喻。它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积极联盟**：这种联盟被列宁越来越明确地定义为不仅要确保“恢复经济”，而且要通过无产阶级带给农民群众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援助，使**带领他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成为可能。5

新经济政策作为农民和无产阶级执政的积极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与1920年代苏维埃俄国的具体条件相适应。

新经济政策所要建立的阶级联盟的特点，不应使我们忘记，这个联盟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的。马克思反对拉萨尔，对拉萨尔来说，相对于工人阶级，其他社会阶级构成了“反动的一帮”。列宁在1919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在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很久之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工人阶级对一般群众的专政，而是阶级之间的联盟。他宣称：“谁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6。

在回顾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之后，列宁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7[斜体强调——夏尔·贝特兰]

因此，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既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也不是单纯的“退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需要尊重一定数量的政治倾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和基本原则。在苏维埃俄国的条件下，**这一形式的必要性**是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中得出的教训之一。这一经验表明，必须以**阵地战**取代1918-1920年的“正面进攻”的企图。这场“战争”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前提是只要执政党清楚地认识到，它一开始所处的地形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现实社会关系，并且只要它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如果要控制和改变这些关系，就得通过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这场新的斗争中，来帮助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是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在1922年4月2日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列宁对这一点说得特别清楚。一方面，他表明，最初作为新经济政策特点的“退却”阶段（在1921年初开始）已经结束，必须停止这种“退却”，尽管不是停止新经济政策本身。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两个原则：首先，新的推进必须是谨慎的（符合阵地战的要求），其次，特别是，这种推进必须**与农民一起**进行。

下面这句话特别有意义：“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8

这一表述中的两个关键表述是（1）“前进”，这表明在1922年，正如列宁所见，新经济政策必须使**前进**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恢复生产力”）；（2）“（只有）同农民一道”（“只有”在此处补译，贝特兰书中原文为“only together with the peasantry“，与《列全》中文版有差异——译注），这意味着前进（向社会主义迈进）必须**与农民群众一起**来实现，党必须“学会帮助他们”。

1923年1月，列宁具体说明了就农民而言，这种向社会主义的推进应该采取的形式之一：“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在同一段话中，列宁再次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的普遍发展可以导致社会主义，只要它不是经济和政治胁迫的结果，而是农民群众自己的意愿，这就是这句话的原因：“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9

所引用的这句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在这个特定的段落中，“文化革命”这一表述的内容仍然相当模糊。

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发展方式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对所宣布的原则的号召支持（rallying）。重要的是这种“号召支持”的具体内容，它所决定的干预阶级斗争的方式，以及党将其决定的措施付诸实施的实际能力。这一切构成了新经济政策期间所遵循政策的现实，并对1923年至1928年期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过程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以及在 1928 年和 1929 年的总危机中达到高潮。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对新经济政策的要求和局限性所作的分析远不是稳定和一致的。它因时而异，对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来说也不尽相同。

每一种理解都是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的两种基本倾向结合的结果。在不同的时刻，其中一种倾向或多或少地占了上风；这既适用于党的多数派本身，也适用于党的同一个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

其中一种倾向导致新经济政策沦为一种单纯的“经济政策”，一种“撤退”，人们不得不暂时认命，直到形势使人们有可能“把新经济政策抛开”10并恢复进攻。这种倾向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在放弃新经济政策之前，不可能采取**真正的攻势**。

另一种倾向——更符合列宁自己的思想路线的倾向11——宣称，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且这种形式是可以修改的，特别是为了响应号召农民群众支持合作社和集体生产。这种态度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并不认为必需在不久的将来“抛开”新经济政策，而仅仅是**转变**（*transform*）它。

这两种倾向中的第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如果把它走到极致，就意味着把新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旦条件允许，就必须抛弃它。

相反，如果第二种倾向占主导地位，则意味着认为只要党采取适当措施，新经济政策就能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这种解释并没有把追求新经济政策和向社会主义迈进说成是相互不可调和的。然而，它并不否认这种进步可能包括处于附属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影响必须逐渐地受到阶级斗争的控制，然后加以改变。

在所有的犹豫和暂时的起伏之上，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解方式是受到历史发展制约的。在第一个历史时期（直到1925年）盛行的解释认为，新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相对持久的阶级联盟政策。然而，它倾向于将这一联盟的内主要容归于经济方面。我们必须强调，这只是一种倾向，并不排除采取直接改变布尔什维克党和农民之间政治关系的措施，如“活跃”农村苏维埃的政策。

在第二阶段，即从1925年底开始，当宣布“恢复期”已经结束（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认为新经济基本上是临时性质的这一想法发展到了越来越大的程度。在实践中，这一观点表现在，对**原则的声明**肯定了基本立场不变，而**具体采用的措施**与其**差距越来越大**。实际上，这些措施**在政治实践层面上**越来越多地违反了新经济政策的一些要求，特别是在与农民群众关系的方面。因此，正在进行的是**逐步放弃NEP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积极联盟所主张的所有政策**。因而，在1928-1929年出现的“新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由于不实行新经济而造成的危机——工农联盟的危机。

影响布尔什维克党对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解的变化，使我们能够理解党在1923-1929年期间作出的某些决定的性质，但它们远不能对这些决定作出充分的解释。一方面，相当多的决定是在眼前困难的压力下作出的（特别是从1928年开始）。这些决定或多或少都是临时作出的，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方式之后进行过修改，更多的是为了对已经作出的决定提供回顾性的理由，而不是作为决定这些决策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特别是对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解的这些变化，其本身需要得到解释。只有通过分析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中发生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它们的物质基础联系起来，才能找到这种解释；政策的成败，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以及或多或少受到控制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普遍运动。

## 2. 作为“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及其截至1927年的结果

新经济政策最直接的目的是把国家从饥荒和经济混乱中解救出来，在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内战和外国干涉，国家已经陷入了这种混乱。开始时，这些经济任务也是直接的政治任务。

对苏联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基本的生产部门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然后考虑到十月革命产生的新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还要超越这些水平。苏联政府实现了这一目标，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它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将国家从内战结束时陷入的巨大困境中拯救了出来。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尤其是由于工人和农民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劳动，取得了特别巨大的成果。

### （a）农业生产

1926-1927年，农业生产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按战前价格计算，其价值达到111.7亿卢布，这意味着比1921-1922年增长了100%以上，比1913年增长了6%，而在前一年，1925-1926年的增长率为5%。121926-1927年，粮食总产量比1922-1923年高出25%以上：约为7640万吨，而1925-1926年为7450万吨。13然而，在那个时候，战前的粮食收成水平（8260万吨是1909年至1913年的平均水平）14还没有完全达到；但农业生产的其他一些部门正在取得进展，尽管大多数农场的现有设备是供应不足和过时的。

因此，在1921-1922年和1926-1927年期间，农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农业部门之间是非常不平衡的。此外，1925-1926年之后，农业生产趋于停滞。这种放缓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

### （b）工业生产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工业生产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26-1927年的生产量是1921-1922年的三倍。然而，所取得的进步主要是弥补了以前的下降；1926-1927年的工业生产只比战前增加了4%，而比前一年增加了15.6%。15

如果我们仅就加工业而言，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常巨大的。1927年，这个生产部门的指数（以1913年为100）为114.5。此外，这种进步在随后的两年中还在继续。1929年，这个部门的指数为181.4，这**使苏联在制造业生产的增长方面，与战前相比，处于欧洲所有国家的首位**。16

如果我们比较不同工业部门（制造业和采掘业）所取得的进步，我们会发现进步的速度非常不平衡。1926-1927年，煤和石油的产量显著地超过了战前水平。铁和钢落则落在后面。棉纺织品的产量比战前高出70%。17

消费品工业生产的进展并没有像农业生产那样出现明显的放缓迹象。当我们把它与人口增长相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从整体上看，它的发展速度更快：在1913年至1926年期间，人口增长了7%，达到1.47亿，其中1800万生活在城镇；而消费品工业生产指数在1928年达到120（100是指1914年）。18

### （c）交换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之一是迅速发展城乡之间的交流（这种发展构成了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这个目标不仅要通过增加生产来实现，而且要通过建立令农民满意的经济关系来实现——在“战时共产主义”下，他们向城镇提供物资，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产品的回报。

事实上，新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广泛发展了商品交换，恢复了货币的作用，存在了一个巨大的“自由市场”，以及价格变动对商品供求的影响和对一些投资方向的影响。然而，从1921年开始的几年里，一批国家机关的活动也在发展，它们的活动旨在通过**计划**、集中财政收入和实行**投资计划**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保障扩大再生产，使其不受商品关系的**直接影响**。

现有的数字并不能使我们准确地估计与1913年相比，交换的演变情况。然而，可以肯定的是，1926年农民为了获得支付税款所需的钱而向城镇和城市贸易供给的农产品数量要比1913年少得多。此后，农民的大部分出售是为了**支付他们用于购买工业品的费用**。

从整体上看，1926-1927年的贸易额是1923-1924年的2.5倍。即使我们考虑到在此期间价格上涨了约50%的事实，总的交易量在三年内也增加了60%以上。此外，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农民在城市市场上的销售额的大幅增长，这些销售额在1922-1923年和1924-1925年之间增加了3.3倍（按现行价格计算），在后来占到零售业营业额的三分之一以上。19

另一个证明交易量大幅增长的证据是铁路运输吨位的迅速增长，在1922年至1927年期间，吨位增加了三倍多，这一年的吨位比1913年的水平高出5%。

这几个指标有助于证明1922年至1927年期间经济复苏的程度。而且，在1927年以后，生产和交换的大多数部门都在继续进步，因此，这种进步与粮食“收购（procurement）”领域所经历的危机之间的对比就更加突出了。

为了解释这一危机及其发展的方式，我们需要研究工农联盟所表现的矛盾形态。由于这些矛盾的重要性和作用常常被低估，因此这项研究更有必要了。

## 3. 1923-1929年工农联盟的巩固和苏维埃社会形态中的矛盾

1923年至1927年工农联盟的巩固，主要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建设性工作的基础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项工作主要是在生产和交换领域进行的，但其范围要比生产和交换广泛得多。

在教育领域，上学的人数空前增加。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按整数计算，从1914-1915年的790万人增加到1927-1928年的1150万人。20与1922-1923年相比，城镇学生人数增加了140万，农村学生增加了280万。21的确——我将回到这一点上来——所给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与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东西，以及工人和农民在这个任务中所应扮演的角色，都远远不符合。但是，数量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建立了与生产中的实际工作相联系的教育体系。

在群众的阅读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1927年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数量，在城镇为4350万册（1913年为470万册），在乡村地区为2570万册（1913年为420万册）。22这一进步更加重要，因为总的来说，十月革命后出版的东西都带有新的革命精神，而且因为这一时期的争论范围很广，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思想趋向，所以基本上避免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和千篇一律的风格。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1926年的人口普查中，9岁至49岁的居民中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能够读写。

在卫生领域，医生人数从1913年的2万人增加到1928年的6万3千人，尽管1918年至1923年期间有大量医生移民国外。23农村地区的医疗从业人数迅速增加，但按居民人数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城镇。物质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使死亡率从1924年的21.7%下降到1923年的18.8%。

苏维埃政权和工农联盟的巩固，当然有其**政治基础**——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问题的特别关注（尽管由于党在农村群众中的存在感不强，对其活动造成了严重的限制）。这种巩固与工人阶级（主要是工会）和农民阶级（主要是农村苏维埃和农业合作社）的群众组织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24

苏维埃政权和工农联盟的巩固，不可避免地是在矛盾的条件下进行的。正是这些矛盾的发展、相互联系和处理方式，解释了什么是新经济政策，它是如何转变的，以及为什么它最终以一场表示放弃的“危机”告终。

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私营部门与国家和合作部门之间的矛盾，因为后者主要是由苏维埃国家领导的，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1928年，这个部门贡献了国民收入的44%，工业生产总价值的82.4%，占零售业企业营业额的76.4%。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总值中只有3.3%来自这个部门。25我们将看到，私营部门在农业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私营贸易所起的相当大的作用（加上自1926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党所奉行的政策中日益增长的矛盾），部分地解释了1928年和1929年的危机，以及那场危机的显著特征。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以其他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些我们必须加以分析——特别是那些将工人阶级与“私营”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立起来的矛盾，特别是当后者阻碍工人的主动性时。这种矛盾在1928年下半年变得尖锐。

在1923-1929年期间，这一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将农民与苏维埃政府对立了起来。1929年，由于对这个矛盾的处理方式，这个矛盾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矛盾。它与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主要是使农民成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分为*Kulaki*（富农）、*bednyaki*（贫农）和*serednyaki*（中农）。

向城镇供应粮食的重要意义意味着，这些矛盾的发展对“粮食收购”26影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反过来说，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可能巩固或破坏工农联盟的措施。在我们必须分析的条件下，1928年以来所采取的措施逐步导致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完全放弃。

## 4. 粮食收购、其波动和工农联盟的状况

“收购”一词是指由国家经济机关和经官方承认的合作社网络**为购买农产品而进行的活动。**

收购的正常运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政治上，它的顺利开展是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之一得到了巩固的外在标志。在经济上，这一顺利进展确保了城镇和工业所需的供给。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价格稳定，并有助于对外贸易的国际收支平衡。在上述最后一点上，粮食收购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粮食出口是为进口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对那些能够帮助工业发展的进口。

在新经济政策中，收购是在与“私营部门”购买活动的竞争中展开的。原则上——从工农联盟的角度来看，这也是NEP的一个重要方面——收购必须以**农民愿意出售的价格为基础**，而且必须只涉及**农民准备交付的数量**。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意味着，收购必须是一种市场买卖（marketing）的形式，而不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征收或征税形式。事实上，直到1927年底，收购都是这样运作的。

收购对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保证了他们的产品有稳定的销路。它也是**经济计划的基础之一**，因为经济计划的正确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产品收购业务的恰当运作。

原则上，收购机构足够大规模的干预使这些机构能够**全面控制**这些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这也意味着控制“私人”贸易中普遍存在的价格。因此，如果在适当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干预，就构成了一种**执行符合工农联盟需求的价格政策的工具**。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苏维埃政府试图实行这种价格政策。然而，它并不总是成功的，原因我们还得再讲一遍。

最后，应该补充的是，收购的发展不仅被认为是确保增加对市场控制的工具，而且也是逐步赶走私人贸易的手段。驱逐私人贸易的斗争是新经济政策期间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它旨在加强将农民与苏维埃政府联合起来的**直接经济联系**。

在1922年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强调，为了加强工农联盟，被任命为中央国家与合作社贸易机关负责人的共产党人必须**在自己的地盘上击败资本家**：“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这些人到农民那里，并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27

列宁解释说，苏维埃政府的工商业机关的任务是**通过证明它能比私人资本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确保与农民的经济联系**。他还说：“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28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这些原则，基本上一直坚持到了1927年。因此，国家和合作部门在一般贸易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证明了它的活力，证明了它在真正意义上进行收购的能力越来越强。通过展示**它在整个商业运作中所占的份额**，读者必须了解这个部门的总体发展。这里有一些数据。

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危机前夕（1926-1927年），批发贸易已经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合作部门。国家机关负责50.2%的批发贸易，而私人贸易只占5.1%；其余44.7%由合作社贸易负责，而合作社贸易本身也要接受国家机关的指示。29

1927年后，批发贸易在苏维埃政府的直接控制下继续发展，但它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归功于（工商业的）监管（regulatory）措施的应用，但这并不足以阻止贸易领域中一系列矛盾的发展。

在**零售业**中，国家和合作机构的地位不如在批发业中那么明显，但在1926-1927年，它们也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在当时的零售业营业额中，他们分别占13.3%和49.8%，民间交易者占36.9%。1928年和1929年，后者所占份额下降到22.5%，然后又下降到13.5%。30

尽管国营和合作社贸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并没有成功地实现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赋予它的所有目标，特别是在价格和购买或销售的预期数量方面。当我们研究新经济政策的最后危机是如何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地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暂时注意一下，在价格问题上，私人贸易与国营和合作社贸易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矛盾。私人商贩的转售价格高于国家和合作机构的价格，因此能够为农民的产品提供更好的价格；这对国家在稳定价格的基础上努力进行的收购活动产生了有害影响。这种矛盾刺激了针对私人贸易的行政措施，但这种措施在农民看来往往是他们亏损或者是被剥夺了赚取更多金钱的机会的原因。

无论如何，在1926-1927年，国家贸易和合作社贸易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主导地位，而迄此都没有诉诸过（无论如何，在任何大规模的情况下）禁止措施。

根据党在1927年底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规定的指令，31国营和合作社贸易必须遵循党决定的“价格政策”，以使苏维埃国家能够在农产品的买卖中执行积极的政策，并使**商业服从于计划的目标**。

实际上，国家和合作社贸易在当时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成功地获得对商业运作的控制。这一点在粮食收购这一关键领域变得尤为明显。困难在这里以最显著的方式出现，并产生了最严重的后果——我们现在必须着手研究这种情况。

### （a）收购的进展，然后是危机

1927-1928年开始的“收购危机”首先涉及的是粮食——这类产品在当时的城镇居民饮食和苏联出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粮食收购**的演变。

首先可以看到，1926-1927年的收购量为1059万吨。与该年的收成一样，它比前一年的收成（841万吨）32大得多，而且进行起来有一定难度。

1927-1928年的收成不如前一年，为7360万吨，33即比1926-1927年少280万，比1925-1926年少90万。收购规模略小于1925-1926年是可以预料的：实际上，裁减的幅度很大，而且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一开始有适度减少：1927年7月至10月，收购量为374万吨，而前一年同期收购396万吨，减少了5.4%——如果考虑到收成的减少，数值就会减少。然后，**在11月和12月之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月里，收购量不超过139万吨，这意味着**比1926-1927年的相应时期减少了近55%**。34

实际上，考虑到收成的萎缩，这种减少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这种收购上的短缺危及到了对城镇的粮食供应**。它还危及了收购计划目标的实现——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同样重要，收购计划本身又与**出口计划**相关。**尽管收成减少，但收购目标却比前一年的数字增加了170万吨**。35因此，党被迫迅速做出反应。

### （b）“非常措施”及其直接后果

党和政府对粮食收购量严重下降的反应方式，是由于对形势的分析比较简单——或者说是由于分析过于简单，而只考虑到了农村矛盾发展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我们将看到）实际上并不是首要的方面。

一般说来，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收购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富农扣留粮食，由于某种“富农破坏”。36党的领导在这样分析了形势之后，在1928年初认为，必须以限制和征用来回答这种“破坏”。这就是所谓的“非常”或“非常措施”，这些术语旨在强调所采取措施的临时性质。

“非常措施”本身并不需要从根本上违反NEP的原则（这意味着不应求助于征用），因为它们应该只适用于犯有非法囤积和投机行为的富农。它们的“法律依据”是1926年通过的《刑法》第107条。这些措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正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目的是“限制农村资产阶级的剥削倾向”。37

如果非常措施实际上仅仅适用于可以从富农的农场没收的粮食数量，收购机构就无法实现其目标计划，而这些计划的目标非常高。

因此，在实践中，**非常措施变成了与反对富农投机的斗争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构成了一种“经济政策”的手段，旨在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向国家粮仓输送尽可能接近收购计划规定的粮食数量。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家机关和地方党员干部都得到了非常严格的指示。如果收购量不足，干部们就会受到惩罚。迫于压力，地方官员征收的粮食数量远远超过富农农场的粮食数量。因此，应急措施不仅打击了富农，而且首先打击了中农，甚至打击了部分贫农。38米高扬负责管理委托收购的行政机构（贸易人民委员部；译注：米高扬同时担任了对外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他实际上指出，**大部分小麦“剩余”由中农持有**，从他们那里没收的小麦是通过被官方谴责为“**有害、非法和不可接受的**”39措施取得的。然而，布尔什维克党的地方机关坚持认为，如果要实现收购目标，就必须没收属于中农的粮食。在北高加索地区（边疆区）发布的一份党内通知给出了以下指导方针：

在继续榨取富农家庭的剩余粮食，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鼓励他们把剩余粮食卖给国家的同时，我们必须牢记，粮食储备的主要部分还是在中农手中。由于这个原因，2月份的收购将主要以村庄里的**中农**为代价，也就是说，它们将被少量地收集起来。40

这些做法在许多地区引起了危机，并激起了广大农民阶层的不满，他们认为正在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

党的总秘书处收到了关于实施非常措施的方式以及它们在农民中引起的反应的令人不安的报告。1928年2月13日，斯大林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通知，通报了导致采取非常措施的情况，承认党包括党中央委员会以前都犯过错误。41就收购的粮食数量而言，他对非常措施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但谴责了在农村所犯下的“歪曲和过火行为”，这些行为可能“造成新的困难”。斯大林列举了这些过火行为的例子：“强行摊派农业公债，建立类似巡查队的组织以及任意捕人、非法没收余粮”，结论是“所有这些现象必须坚决消灭”。42

这些警告导致3月份的粮食收购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然而，4月初的党中央委员会（CC）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必须迅速恢复符合NEP要求的收购程序。43

农民的压力进一步减轻了，但这种减轻很快就伴随着收购的急剧下降。4月份的收购量最多到24.6万吨，而1928年前三个月的月平均收购量为144.6万吨，1927年4月的收购量为43.8万吨。44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认为这种下降是过度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非常措施被重新实施，而且比以前更加严厉。这些措施甚至对贫农的影响越来越大。党试图组织这些贫农与富农进行斗争，同时要求他们交出自己的粮食储备，以便树立榜样，否则也会对他们实施制裁。

1928年春天，组织贫农和batraki（农业劳工）的尝试没有结果。冬天开始时，一部分贫农和工人帮助完成了向富农征收的任务，但后来他们得到了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和自我组织起来的激励：征收的产品的25%分配给了他们。春天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收购组织要把所有的粮食集中起来，以便更好地实现给他们的目标。

在这种新情况下，人们发现，富农对农民其他阶层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45从狭隘的经济和统计学的直接观点来看，实施非常措施所取得的结果还是可以被视为“有利的”。农业运动（1927年7月1日至1928年6月30日）结束时，尽管收获量明显减少，但收购总量接近1926-1927年的1038万吨，而不是1059万吨。然而，这一直接的“统计”结果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收购危机的中期和长期后果，以及非常措施的应用。

在1928年，情况已经很明显，其中包括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严重不利方面：整个城乡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特别是工农联盟受到破坏，因为事实证明，不可能只对犯有投机罪的富农采取非常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党越来越难以不采用非常措施了。了不采取这些措施，党必须彻底分析正在进行的发展，包括那些与当时正在启动中的工业化进程的形式有关的发展。它还需要具备能恢复与农民的信任关系的政治资源，以及制定和推行**一种不同形式的工业化**所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源。46

但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党不但没有放弃非常措施，反而在1928-1929年重新开始使用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以更严重的形式再次出现。这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1929年，局势紧张到仅仅是继续采取非常措施就会使事态走向死胡同。一种情况的发展导致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完全放弃**，47即1929年底的**“大转变”**。这使苏维埃的形态进入了一个充满激烈矛盾的新时代。

在1930年代，工业化进程加快，无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许多工人在政治、经济和行政领域担任有权力和责任的职位。然而，与此同时，工农联盟破裂的后果也显现出来。它的破裂是由于“从上而下”的集体化造成的，其特点是，除了少数人以外，农民步入**集体农庄**（*kolkhoz*）制度并没有表现出对集体农场的热情转变。

工农联盟的破裂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它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的衰落，等级关系和专制的领导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粮食生产和畜牧业大幅下降，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

## 5. 对新经济政策的放弃过程

完全放弃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反映出（如具体分析所示）对任何预先设想“计划”的实施。这种放弃也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或“经济危机”的要求而发生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危机，那也只是**一场政治危机、一场阶级关系危机**的结果。

1929年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基本上是阶级斗争与不受控制的矛盾两者的**客观过程**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做出的一些“决定”是这个过程的特征，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只是些**附属因素**。它们没有能力真正指引这个过程所采取的发展方向（course），而且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效应（effects）”，一般来说，与预期的效果大不相同。

只有厘清构成这一历史进程的动力的矛盾和冲突，我们才能理解它的发展方向和特点，并**从中吸取教训**。这种澄清要求分析作为NEP特点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其行动导致这些关系转变的社会力量。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尝试进行这种分析。它首先论述了再生产的一般条件，然后论述了在农村和城镇发展的社会矛盾的运动。这一运动主要是**参与到阶级斗争中的群众之活动**的结果，但它是基于**现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它的方向是由不同阶级看待自己的利益和作用的方式决定的。各阶级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下，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研究党内的辩论和党的决定，并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构成及其所经历的变化进行分析。但是，如果我们只分析社会结构上层建筑中的发展，就无法解释这些辩论的结果、党所做决定的性质和后果以及党的意识形态的变化。相反，真正的解释需要将上层建筑中发生的事情**与阶级斗争的总体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的过程联系起来**。

必须考虑的关系和力量是相当复杂的，这些关系和力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形式也很复杂。因此，下面的分析集中在看似重要的方面。它的目的只是阐明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方面，而**这一进程的意义仍然是最重要的**。

注释

1 关于NEP的正式开展，见第一卷。

2 《斯全》12卷，《大转变的一年》

3 《列全》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4 “经济政策”这一表述是模棱两可的：任何影响生产和交换条件的政策都会影响阶级关系，因此都是对阶级斗争的一种干预。

5 见第一卷

6 《列全》36卷，“《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7 同上

8 同上（我的斜体强调——夏尔·贝特兰；《列全》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译注）

9 《列全》43卷，《论合作社》

10 “把新经济政策抛开”的说法是斯大林在1929年底，12月27日对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话中使用的。在这段话中，斯大林并没有说必须立即放弃新经济政策。他说这是在一个他还不确定的未来发生的。同时，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并解释说这不意味着任何退缩，“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斯全》，12卷，《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1929-1930年冬季采取的措施标志着对NEP的抛弃。

11 即使在1929-1930年，当NEP在实践中被放弃的时候，这个概念仍然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理论上所坚持的概念。因此，自相矛盾的是，直到1931年，当新经济政策所剩无几的时候，党还在宣称它没有被放弃，而是在继续推行。（见下的文，第四篇，2.6.f，注20）

12 根据E. Zaleski在*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oviet Union, 1918–1932*书中计算的数字。扎列斯基的数字取自各种苏联资料。当然，它们只是相当近似的估计。

13 这些数字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统计资料中都有：特别见S.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et paysanne en URSS（1921-1928）: Le Problème du blé,* 113页。

1927-1928年，产量下降到7360万吨（来源同上，338页）

14 V. G. Groman, *Энциклопедиа русского экспорта*，第一卷，第175页。1913年的收成由G. M. Krzhizhanovsky估计为9670万吨，*Десять лет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ССР 1917-1927*，第34页，由Grosskopf引用，第113页。

15 见Gosplan SSSR, *Pyatiletny Plan*, vol. I, 15页。这些指数与整个工业有关，是根据战前价格计算的。

16 1929年，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危机前几年的顶峰，法国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为142.7，德国117.3，英国100.3 （*Industrialisation and Foreign Trade*, p. 134）

17.见S. N. Prokopovicz,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URSS*, p. 282

18.Narodnoye khozyaistvo SSSR v 1961 g., pp. 7, 169

19. 见 Prokopovicz, *Histoire économique*, pp. 459-460, and B.Kerblay*, Les Marchés paysans en URSS*, p. 112

20. 见*Narodnoye khozyaistvo 1958* g., p. 806

21. 同上，p. 814

22. 同上，p. 851

23. 同上，p. 880

24. 这些发展将在这本书中进行分析

25. *Narodnoye khozyaistvo 1958* g., p. 57

26. 关于“采购”，见下文（第二篇，1.2.a）

27. 《列全》，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28. 同上

29. See *Kontrolnye tsifry na 1927–1928* gg., pp. 77–88

30. *Sotsialisticheskoye Stroitelstvo SSSR* (1935), pp. 552–553.

31. 见 *K.P.S.S. v rezolyutsiyakh i resheniyakh*, vol. 2, p. 342.

32. 见 A. Mendelson, ed., *Pokazateli konyunkturi*, p. 51.

33. 见 Table 199 on p. 338 of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34. 按注32所述工作数字计算的百分比。

35. 1928年1月1日，1927-1928年的农村采购计划只完成了39.3%，而在一年前的同一天，它已经完成了63.7%。（见 M. T.Chernov, “Opyt khlebozagotovok 1929–1930 g.,” in *Ekonomicheskoye Obozreniye*, no. 1 [1930], p. 30,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34）。

36. 在1925-1926年的冬天，尽管收成很好，但采购却暂时减少，人们对这一现象也倾向于做出同样的解释：然而，当时它并没有导致采取与1927-1928年相同的措施，采购量最初下降的影响很快就被克服了。

37.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p. 250–255.

38.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36.

39. Mikoyan，《真理报》, February 10, 1928.

40.来自北高加索边疆区党的办公室的通告，来自党中央的档案。见G. A. Konyukhov, *KPSS v borbe skhlebnymi zatrudneniyami v strane* *(1928–1929)*, p. 152, quoted in M.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p. 222.

41. 《斯全》，11卷，《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42. 同上

43. 见*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p. 372 ff.

44.诚然，在1926年第一季度，采购只带来了84.1万吨（根据注31中引用的作品中的数字计算）。

45.早在2月，米高扬就已经提到了贫农的“犹豫”。几个月后，人们承认其中许多人甚至转向了富农。（见 Bauman’s article, “Uroki khlebozagotovok,” in *Bolshevik*, nos.3–14 [1928], p. 74）。

46.这意味着一种不那么集中、不那么“现代”的工业化，呼吁更少的财政资源和更少的进口，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当地资源和工农群众的主动性。

47. 这一点见下文（第二篇,1.5）

# 第一部分 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

分析新经济政策这一先繁荣后以危机结束的阶段，要求我们在整个这一时期考虑到两类社会关系的发展：一方面是商品和货币关系，另一方面是由改变了商品和货币关系再生产条件的经济计划所产生出的政治关系。

后一类关系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并没有“消失”：使它们存在的基本条件仍然存在，因为社会生产并没有停止成为“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因此，尽管对商品交换发出了各种“禁令”，社会生产的产品仍然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1

更一般地说，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就像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样，直接劳动时间的长短仍然是社会财富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仍然以价值为基础，财富的增加取决于剩余劳动：因此，生产者还没有占有“本身的一般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下册中所说的。2

列宁在号召布尔什维克党采用新经济政策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现实。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至1923年期间所做的是**承认商品、货币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3并为这些关系的再生产自己创造条件，从而清楚的揭示它们；因为这些关系的转变和破坏必然要经过这个阶段。

因此，一系列的决定付诸实施，其中首要的决定是在工业和贸易中恢复有限的私人部门，4最重要的是，努力重建开放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这使得以货币形式进行核算成为可能，并要求存在一种应尽可能稳定的货币。5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还致力于为这些商品、货币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转变**以及最终的**消失**创造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条件。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初步阶段是建立一个计划机构，该机构应发挥职能，**使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再生产受制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施加的条件和政治关系**。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二节，这一点在本作品第一卷已经说过。

2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表明，从生产自动化开始的生产力体系的转变，带来了“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也带来了“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人更多的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存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种转变中，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而这又是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如果是这样，“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就结束了交换价值和剩余劳动所发挥的作用。”（译注：《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ｂ）资本作为生产的统治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解体”）

我们显然必须警惕一种认为后者必然结束的“技术主义”理解，他并没有说这种作用会自行结束。马克思所阐述的变革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作为社会体”对它的掌握，而这种理解和掌握是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革命的方式进行的，这种革命决定了人和他们的劳动之间的不同关系，这种关系把这种劳动看作是它的本质，即直接是社会劳动。因此，当工人掌握了政治权力后，共产主义劳动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是占有和分配形式的转变方式之一。（见本作品第一卷中引用的列宁关于这一点的评论）

3 关于这一点，见《列全》43卷以及本作第一卷。

4 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运作的工业和贸易的私人部门，包括个别手工业和贸易企业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虽然各种手工业者的活动没有被正式禁止，但由于缺乏原材料和运输工具，他们的活动经常处于瘫痪状态。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采纳使经济总体状况得到改善，手工业活动得以恢复。农村手工业的复兴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那些活动被正式中止的手工业企业，在1921年夏秋之际采取了法律措施，使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生产。1921年7月7日的一项法令允许“自由从事”手工业职业，并允许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情况下开办雇用不超过20名工人的小企业，如果使用机械动力，则雇用不超过10名工人。1921年12月10日的一项法令将一些被国有化但实际上没有经营的小企业归还给它们之前的所有者。1922年5月22日的一项法令扩大了建立私营商业和工业企业的权利。这项权利被授予给任何人，无论是单独还是协作行动，作为公司还是合作社，“以便发展生产力”（第4条）——条件是这项权利不得“以违反指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方式使用”（第1条）。除此之外，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就规定，某些国有企业可以出租给私人资本家，或者作为特许权授予外国资本，如果它们的生产可能因此而更快地增加。（见E.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2, pp. 299 ff., and Prokopovicz, *Histoire économique*, pp. 274 ff.）

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里（广义上说，直到1925年12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止），主流思想是，私营企业最终一定会“自己”消失，也就是说，通过国有企业的竞争，一旦它们组织良好，就会比私营企业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商品。

1925年初，人们仍然认为扩大私营企业的发展可能性是可以接受的。5月，一项法令授权官方在某些条件下允许私营部门在每个企业雇用多达100名的工资劳动者，而租赁企业可以雇用几百人：一个例子是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劳动”（“Proletarian Labor”）工厂，这是一家生产金属制品的私人公司，1925年10月雇用了650多人。（见Y. S. Rozenfeld, *Promyshlennaya Politika SSSR*, p. 494,以及Planovoye Khozyaistvo的副刊, no. 12 [1925], p. 7, quoted by E. H.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vol. 1, p. 35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私人资本部门在工业中的经济作用总体上仍然相当有限，但在贸易，特别是零售贸易和手工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见下文，第三篇开头）。

5 这种努力也适用于国营部门的生产单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那里引入了“企业会计”或“财务自主权”（khozraschet）（见下文，第三篇，4.1）。

## 1. 重建货币和财政体系

在“战时共产主义”下，货币只发挥了相对次要的作用。1在这一时期，生产者未消费的那些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被政治当局直接分配给了特定用途。这既适用于工厂生产的东西，也适用于被征收的个别农场的那部分产品。然而，许多买卖都是秘密进行的，要么是以物易物，要么是通过将商品交换为货币代币。国家本身并没有停止发行新的纸币，尽管它们的购买力逐月下降。

内战结束后，农民群众不再接受“战时共产主义”的约束。他们要求停止征收，建立稳定的财政制度，实现贸易自由，重新引入用货币交换的方式，这与当时普遍的农业生产形式相对应。苏联政府对这些要求的接受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面之一。

最初（1921年初），征收被粮食实物税所取代，实物税的数额是预先制定的（这与征收的数额不同），因此，农民生产得越多，他们可支配的产品就越多。这种实物税的总收入应能满足军队的需要和部分国家机器的费用。至于工业和外贸所需的农产品，主要是通过农民和国家机构之间的产品交换来提供。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这些交换受欢迎的形式仍然是物物交换，只有没被自己消费、没被税收吸收、也没被与国家机构进行“产品交换”而吸收的那部分农民的产品，才可以在当地市场自由**出售**。

很快就可以看出，国家机构和农民之间的易货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1921年10月，前者被允许购买农产品，也就是用**钱**来支付农产品。同时，苏维埃政府通过引入新的税收来增加其现金收入，**这些税收也可以用货币支付**。最后，在1923年，农业税本身从粮食税改为货币税。2从此，**商品和货币关系**构成了农业和国家之间、农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工业生产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基本联系，甚至这些单位属于国家。

因此，**重建商品生产**的过程就一定会涉及**重建货币流通**的平行过程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是“在交换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3。只要社会生产是以私人形式进行的，所产生的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会在货币中具体表现（incarnated）出来。4

### 1.1 重建苏联货币体系的过程

对苏联货币体系重建的过程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揭示了这一过程服从于当时的整个社会条件，服从于阶级斗争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它还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支配着货币体系后来演变的矛盾。我们在这只会提到最重要的事实。

在新经济政策开始之前，流通中的货币代币是由国家直接发行的，由财政人民委员部（Narkomfin）。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幻想要求它们不是“流通券”而是“结算票据”。这些纸币的俗名是“sovznak”，被大量发行（一些人认为通货膨胀是“废除”货币的一种手段）。1921年，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购买力迅速下降的sovznak显然不能履行从现在起必须具有的货币功能。

1921年11月3日，苏联政府决定用新纸币代替旧纸币——新纸币被视为“流通券”。货币的存在因此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尽管苏联公民继续用svoznaks来谈论它。

由于缺乏足够的预算收入，国家继续发行大量纸币（1922年，60%的预算收入来自发行新纸币），新卢布的购买力急剧下降，以致在1922年3月，需要20万卢布来购买（平均而言）在1921年10月只需6万卢布就能买到的东西（大致相当于战前的1卢布）。5

1921-1922年的预算是用“货物卢布（goods-rouble）”来制定的，“货物卢布”是一种计算单位，它代表了固定的购买力（与战前的价格相比）。财政人民委员部每月都会计算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货物卢布的购买力。债务人必须支付的货币单位数量（例如，企业应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根据由此记录的货币贬值情况进行重新估价**（对工资劳动者来说，这一措施意味着建立一个**浮动的工资标准**）。

国营企业采用货币支付的发展，意味着必须向后者提供其经营所需的货币资源。为此，全俄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10月12日的一项决议决定，1920年1月关闭的国家银行（Gosbank）应该重新开放。6新的国家银行于1921年11月16日开始运作。7它是在khozraschet，即财务自主权8的基础上运作的，因此必须以收抵支。它的资本由国家提供，其主席由财政人民委员部任命。该银行的资源起初很有限：当时只有2000亿卢布。它只能提供非常短期的贷款，而且贷款的利率很高（每月8%到12%之间）。

随着货币继续贬值，Gosbank的专家们（其中有一些前银行家、金融家和工业家）准备了一份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符合“正统金融”准则的建议。这份报告呼吁扩大“自由市场”，优先向轻工业（最能促进国内贸易快速发展的部门）提供财政援助，审查外贸垄断管理的运作方式之条件，尝试从国外获得贷款，并恢复金本位。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苏联经济很快就会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作为某些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生产者，占据一个附属地位。9

这些建议被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一次代表会议（1921年12月）否决了，但会议强调，为了加强工农联盟，需要通过**稳定的货币**来发展工农业之间的交流。会议关于重建国民经济的决议指出，有必要“恢复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坚决执行一项旨在限制纸币发行的计划。”10

1922年3月，苏联放弃了以货物卢布进行计算。11此后，国家的收入和支出都以**金卢布**计算。当然，实际支付是用纸币进行的，但与一定数额的黄金卢布相对应的纸币数量是参照Gosbank在市场上购买黄金的汇率来评估的。12

事实上，虽然1922年预算赤字相对下降，但货币问题造成的预算赤字仍然相当可观，旧货币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直到1924年这一货币被撤销。然后，一个有黄金支持的新货币单位被定为法定货币，并从1923年初开始由Gosbank发行，即**切尔文**卢布（chervonets rouble）。

**切尔文**卢布在数年内都享有极大的稳定性。当时，苏维埃俄国是**欧洲第一个在参加一战后成功恢复相对稳定的货币的国家**，这一成就显然不仅仅是由于技术原因。

### 1.2 货币改革

切尔文（相当于10个金卢布，或7.7423克精炼黄金）起初与旧的纸币卢布一起流通，后者继续迅速贬值。实际上，切尔文成为了主要的支付媒介。1924年1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三次会议指出，流通中的货币有五分之四是切尔文卢布。13

进行货币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1924年2月4日——列宁去世后两周，一项法令决定进行货币改革。

#### 1924年2月的法令

根据这项法令，Gosbank对货币的发行拥有最高控制权，从那时起，该货币将成为法定货币，并以Gosbank持有的黄金作为担保。原有的*sovznak*按1个新金卢布兑换5万个1923年的*sovznak*的比率从流通中收回。到那时为止，为弥补预算赤字而发行纸币的国库失去了这一发行权，从此只能发行小面额的纸币，数额不超过Gosbank发行的切尔文的一半。14

1924年，新货币得到了农民的信任，至少在当时的交易中是这样。然而，苏维埃政府试图在农村地区筹集的贷款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15

#### 1924年建立的货币制度的阶级后果

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路线的影响的角度来看，1924年货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货币与黄金的有效联系。

这种联系意味着**Gosbank必须干预市场，以官方平价维持卢布兑黄金和外汇的汇率**，这带来了一系列后果。

因此，Gosbank需要拥有足够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便能够在市场上有效地采取行动。这就规定了一项**出口政策**，**旨在将黄金储备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并倾向于加强富农的地位，他们被认为是最能生产出口粮食的人。另一方面，工业化的努力必须受到相对的限制，因为工业发展不能迅速提供可出口的货物，相反，必须进口设备。因此，富农的利益往往比一般农民的利益、工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更受青睐。在国际层面上，苏联倾向于扮演农产品供应国的角色。

保持卢布对黄金与外币的官方平价汇率，也决定了在信贷和预算支出方面采取限制性政策。因此，金融和信贷政策不能首先适应经济的内部需求，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对这些需要进行了定义。经济、财政和预算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世界市场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通过金本位制度运作的“要求”来实现的。

1924年的货币改革符合政治的取向，即Gosbank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方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显然没有把握住这种政治取向的全部含义。他们中的一些甚至认为，苏联融入欧洲市场是有可能的。当时的财政委员索科利尼科夫（Grigori Sokolnikov）的情况就是如此。他说:“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尽管我们的政治地位很特殊，尽管这里执政的阶级很不同，但我们已经融入了欧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机制。”16

#### 货币制度的后续变化

从1925年开始，前一年决定的货币改革的具体意义开始变得明显。Gosbank现在不得不向市场投放大量的黄金和外汇，以保持汇率稳定。17这种情况是由于金本位制度运行的“要求”与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要求”之间矛盾的不断发展而造成的。1925年初，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确实采取了措施，旨在**剥夺Gosbank和Narkomfin对预算政策的最高控制权**。为此，成立了一个负责苏联预算的委员会，由古比雪夫（Kuibyshev）18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奉行旨在促进工业发展的预算与信贷扩张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施很快就与对卢布汇率的“支持”不相容了。1926年3月，**决定Gosbank必须停止出售黄金和外国货币**，以保持卢布的平价。19政府没有说出来，就这样打破了1924年的货币改革，该改革实际上是将卢布与黄金挂钩。1926年7月，苏联货币被禁止出口，1928年3月也禁止进口。此后，卢布是一种**纯粹的国内货币**，汇率由政府委员会确定。1924年开始用切尔文卢布报价的少数金融中心现在已经停止这样做了。20

卢布起到了真正的纸币的作用。它仍然是所生产财富的社会性质的体现。这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可能存在的“劳动券”，因为这种凭证的特点是“它们不流通”。后来，这种货币将在与新经济政策时期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完全社会化的生产还没有形成。21

#### 放弃金本位和恢复纸币的政治影响

放弃以黄金为担保的货币，恢复纸币，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这意味着金融和信贷政策，以及进出口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工业化融资的问题现在有可能得到更积极的解决。

此外，金本位制的放弃使得货币的稳定性在本质上取决于政治权威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演变。实际上，这种稳定性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措施”（即根据生产和分配的要求调整货币的数量和流通速度），而且还取决于持有货币的人与发行货币的政治当局之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这种关系的形式是“对货币的信心”。我们知道，**价值符号**（token）所发挥的货币作用，“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时候，”才能得以维持。22在纸币的情况下，这种“公认”在建立“强制通用的效力（legal rate of exchange）”中获得其“法定存在（legal conventional existence）”。“强制通用的效力”之存在丝毫不足以保证货币的稳定性；为了使这种稳定性不受挑战，必须维持持有货币和商品的人的“公认”。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里，只有当掌权的阶级坚定地发挥其领导作用时，这种“认可”才能得到维护。当它对这一作用的发挥出现偏差时，“强制通用的效力”就不能使货币免于贬值，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不能防止出现以法币以外的手段进行的交换。

恰恰是在新经济政策末期，经济和货币措施缺乏一致性，加上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特别是在苏维埃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扰乱了货币体系的运作。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并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他们认为，在苏联获得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构成了货币稳定性的持久而有力的“保障”；事实并非如此，价格和交换的演变尤其证明了这一点。23

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政府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通过经济和行政手段控制生产、交换和价格的能力抱有幻想，这反映了对经济和社会矛盾，以及对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阶级斗争之决定性作用的估计不足。从1928年开始，现实与这些幻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这些幻想注定要以新的形式重现。

### 1.3 预算制度

恢复基本平衡的预算制度，是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经济重建过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恢复是有物质基础的，即工农业生产的显著繁荣。也存在政治基础即工人和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信心。这种信心表现在农业税的缴纳方式上——以最低限度的强制手段。（无论如何，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行政部门在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代表。）预算制度的恢复也有经济和司法基础，即对庞大的国有工商业部门的巩固，这些部门在预算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预算在1923-1924年是平衡的，24这是货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1924-1925年出现了预算盈余，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几年里也出现了，在此期间，预算收入和支出增长非常迅速。25在1924-1925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对预算收入和支出的预测被多次向上修正。预算收入继续迅速增加，在1927-1928年达到超过45.8亿卢布（不包括运输和邮政部门的收入），而支出为43.8亿卢布。这比1925-1926年的收入数字高出75%。26在同一时期，用于工业和电气化的预算支出增长地更快，达173%。27此外，这些金额只占对上述两个部门资本投资总额的一小部分，在1927-1928 年两部门的总投资达到近 20 亿卢布。28

### 1.4 银行系统

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商业交易的发展，预算和投资同样迅速的扩大，这些都伴随着银行系统的恢复。这有助于挖掘和重新分配货币资源、确保企业的资金供应、向他们提供信贷，并管理相当一部分的投资资金。

#### 建立一个新的银行系统

这样建立起来的银行体系（即使在新经济政策被五年计划政策取代后，它的活动仍在继续和发展）除了负责发行货币和管理国有企业的活期银行账户的Gosbank之外，还有一系列专门的银行：Prombank（工业银行）、Elektrobank（负责资助电气化的银行）、Tsekombank（资助市政企业的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网络和储蓄银行完善了这个系统。它与财政委员会的服务紧密相连。它与财政委员部的服务紧密相连。它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公职人员和专家，这些人通常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些专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止一次地体现出来：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没有准备好应对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29虽然预算政策是严格的，但与信贷和货币发行有关的政策并不总是如此。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迅速增加，这主要与银行向经济提供的信贷规模有关。这些信贷的一部分与经济活动的增加相对应，因此满足了对流通资金的实际需要；但另一部分，特别是在1925年以后，则用于支付那些只有在中期或长期才有成效的投资。支付的资金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和收入，并最终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情况产生了矛盾，从1927年秋天开始，这种矛盾就特别尖锐。30

#### 与银行系统运作有关的幻想

在恢复货币体系所产生的幻想之外，很快又出现了与强大的银行体系的存在有关的类似幻想，而这个体系应该在指导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人们认为银行体系是为了对信贷分配实施更有效的控制。因此，CC在1924年4月底通过的一项决议宣布：“必须组织一个银行委员会，其任务应该是组织银行信贷和避免重复、对信贷指导计划进行初步审查、协调贴现率的确定，以及在不同地区和行业部门之间的适当分配银行机构。”31

决议中倡导的银行委员会于1924年6月成立。它包括当时苏联主要银行的代表。32Gosplan也参与了该委员会，负责起草信贷计划提交政府审批。在几年内，银行网络包括了数千个分支机构，管理着数十亿卢布的信贷。

于是，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想法：信贷计划将使制定真正的经济计划成为可能。Gosplan的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Gleb Krzhizhanovsky）在1925年初说：“信贷和计划是单一的社会化系统中的亲兄弟。”至于加米涅夫，他为对经济的“新的指挥高度（new commanding height）”欢呼，他在其中看到了“调节经济的决定性因素”。33

只要生产结构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公式似乎是正确的。一旦投资的规模使人们必需特别关注流动资产和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情况，这些说法就会成为严重的幻想的来源。然而，1927年，CC认为，国家银行系统的存在与国有工业（提供大部分工业生产）以及与强大的国家与合作社商业网络有联系，它使真正的经济计划成为可能。

这些幻想在1927年2月7日至12日召开的CC全体会议上得到了体现，在听取了米高扬和古比雪夫联合提出的报告后，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宣布，作为解决发展工农业、增加积累和实际工资、逐步加强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限制私人资本家作用等问题前提的条件现在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决议强调，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围绕着价格问题**。因此，价格问题似乎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基本因素，34而忽略了阶级斗争的其他方面。

在1927年2月的党的官方杂志《布尔什维克》上，米高扬提出了新经济已经达到新阶段的论点：他认为，在决定价格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是市场，而是“有组织的部门（organised sector）”。35

1927年5月，同一份杂志表示，“所谓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重要。36这些说法在一个专门讨论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文章称：“苏维埃国家已经控制了粮食市场，今后任何意外事件或计算错误都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建设计划。”37

因此，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党的思想被一种幻想所支配，即自1924年以来建立的制度将有可能控制最复杂的经济发展，包括那些直接与阶级矛盾有关的发展。这种幻觉更加引人注意，因为它宣称的控制是建立在那些与群众距离最远的经济机构的工作之上的。此外，即使是对他们有直接影响的措施，如国家规定的价格，群众也是一无所知。这些价格只告诉行政和商业机构以及商人；它们没有被公开。

1927年底，随着国家粮食采购危机的爆发，这种关于凭借行政和银行系统的正常运作来控制经济发展——甚至阶级之间矛盾——的幻想受到了第一次打击。38当时，对群众有直接影响的决策进行的保密，被指责为对“以党的苏维埃、工会和其他组织的形式，以及在新闻界”行使“有组织的公众舆论压力”造成了阻碍。39然而，这些对经济和行政机构“过度保密”的批评既没有结束这种保密，也没有结束对这种国家机关所拥有权力的幻想。

实际上，这些幻想反映了一种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已经成熟并在党内深深扎根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国家经济机构的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并片面地强调工业发展主要是基于这些机构直接控制的投资。这种观念与列宁在其最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回顾苏维埃政权头五年经验教训时提出的构想完全不同。

我们知道，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条可以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条件是党把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放在首位，从而正确地解决矛盾。40为了做到这一点，党必须帮助劳动群众通过意识到社会主义的要求来改变经济关系，并发展经济和政治实践，而这将使他们能够建立集体的生产和分配形式，并对国家机构实行更彻底和有效的控制（这些机关最终将被群众组织替代）。

从1925年开始逐渐确立起的新经济政策的观念与这一观点是矛盾的。它实际上假定，可以主要通过经济和行政机关对经济的“良好管理”（必要时可能会受到来自下面一定程度的“压力”）来实现社会主义。这里有一系列的幻想，构成了R. Linhart所说的“理想的N.E.P.”的一个方面。41

这些幻想与实践对新经济政策所要求的，以及首先，对工农联盟所要求的之间的偏差越来越远有关，是阶级斗争和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构成内部的主导权之转移的结果，42并被当时普遍存在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加强。这些关系本质上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主义关系，决定了隐藏和颠倒真实关系的形式，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形式。43

苏联经济当时的运作方式强化了这种幻想——国有企业在形式上隶属于政治当局，而事实上这种隶属关系极为有限，这正是因为群众对经济运作的控制程度很低。所有这些都使经济现实特别“不透明”。44

上述幻想的存在使1928年开始的危机爆发变得更加“出乎意料”，这也是1929年突然出现的政治转向和对当时的变化缺乏真正准备的原因。

### 1.5 对货币和金融系统薄弱的控制程度

直到1925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对货币和银行系统的控制还比较薄弱。将卢布纳入欧洲金融体系，45对货币政策以及信贷、投资和外贸政策施加了若干限制。

废除金本位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外部限制，但它们又被其他制约因素所取代。其中包括需要加强群众对苏维埃货币的信心，这种信心特别取决于苏维埃经济对劳动人民的运作结果。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形成中发生的变化，以及与这些变化有关的做法，起到了非常消极的作用。

到1925年为止，满足包括农民在内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是相对优先的，这就保证了对人民群众或多或少的正常商品供应和相对稳定的零售价格。

在1924年1月1日至1925年1月1日期间，劳动统计局维持的价格指数显示，从当时的条件来看，涨幅相对较小：约8%。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所记录的上涨只有6.6%。46在1926年1月1日和1928年1月1日之间，零售价格指数甚至有一点下降（两年内下降了5.8%），因为私营部门的零售价格上涨（6.8%）被国家和合作社部门的下降（8%）所抵消。47

然而，从1927年7月开始，价格控制有所松动。一方面，一些商店不再定期供应货物（位于乡村地区的商店尤其如此，它们发现自己收到的工业品越来越少），出现了所谓的“商品荒”，因此，对实际上买不到的货物所报的价格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作为这一发展的结果，私人贸易的零售价格开始上升。如果把1927年7月的水平看作是100，那么1928年7月的价格是115.3，1929年7月的价格是150.7。48价格上涨尤其影响到一般消费农产品：因此，在1926-1927年和1928-1929年之间，黑麦的市场价格上涨了220%，土豆上涨了222%，牛奶上涨了68%，等等。49在这个领域，频繁的短缺也增加了消费者遭遇的困难。

1927年中期以后，货币体系和价格体系越来越不受控制。归根结底，这种控制力的丧失与对阶级斗争之发展的控制力的松懈是一致的。控制力的丧失（其形式将在以下各章中分析）特别表现为货币收入的增加，而没有消费品生产的增加与之对应，因此，信托流通迅速增加，从1928年1月1日的16.68亿，上升到1930年1月1日的27.73亿，增加了66%。50

物价上涨，向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提供的商品减少，通货膨胀的重现，等等，这些都表明正在形成的做法意味着**在事实上（de facto）放弃了新经济政策**，而这些做法的持续最终导致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彻底放弃**。在这些做法中，有一种投资的积累和分配政策，它导致了持久的不平衡，使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一条新的政治路线正在逐步确立，并在当时正在制定的经济计划中得到表现。我们现在必须考虑与此有关的计划机构，但不要忘记，计划的内容，最终是**政策**的结果，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注释

1. 见第一卷, pp. 388, 461.
2. See M.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pp. 125–139.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4. 见《资本论》第三卷
5. See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2, p. 348. 6. 同上，pp. 346–347.
6. 同上，pp. 346–347.
7. 这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银行；两年后，它变成了苏联国家银行 (见 *Sobranie Uzakonenii*, no. 81 [1923], art. 786).
8. 见下文，第三篇，4.1。
9. See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2, p. 350.
10.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I, p. 589.
11. 见上文，第一章，1.1节
12. See *Sobranie Uzakonenii*, no. 26 (1922), art. 310; and no. 31, art. 377; see also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2, p. 355.
13.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I, p. 795.
14. See *Sobranie Uzakonenii*, no. 32 (1924), art. 288; no. 34, art. 308; no. 45 art. 433; E. H. Carr, *The Interregnum*, p. 133, and *Socialism*, vol. I, pp. 475–476.
15. 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使得利率有可能大幅度降低。1924年给予农民的长期贷款的利率是每年8%，1925年降到6%。国家筹集的贷款的利息为5%或6%。这些贷款的债务人主要是富裕的或生活富有的农民 (see Carr, *Socialism*, vol. I, pp. 469-474).
16. *Sotsialisticheskoye Khozyaistvo*, no. 5 (1924), p. 6.
17. See Carr, *Socialism*, vol. I, p. 481.
18. See V. Dyachenko, *Sovetskie finansy v pervoy faze razvitiya sovetskogo gosudarstva*, vol. 1, p. 426; *Sobranie Zakonov*, no. 17 (1925), arts. 127, 128; no. 38, art. 282; no. 71, art. 520.
19. See Carr, *Socialism*, vol. 1, p. 487.
20. See A. 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p. 102–103.
21.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八章中，马克思想象了一个生产已经“社会化”了的社会，并写道，既然如此，

“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可以看到，这里提到的“社会化”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国家所有权。它意味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彻底转变，让社会范围内的生产者能够使生产服从于**真正是他们共同活动之结果的计划**（而不是脱离他们并把它自己决定的任务强加给他们的行政机构）。

1. 马克思，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ｃ）铸币。价值符号”
2. 例子见上文，第一篇，1.5小节及下文第二篇，2.4.b开头前的一页。
3. 直到1930年，财政年度都是从前年10月1日到9月30日。此后，财政年度和普通年度保持一致。
4. On these questions see Carr, *Socialism*, vol. I, pp. 456 ff., and E. H. Carr and R. W.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 (*1926–1929*), vol. I, pt. 2, pp. 974–975.
5.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 I, pt. 2, p. 975.
6. See 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95.
7.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t. 2, p. 979.
8. 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资产阶级出身的专家能够影响货币和银行系统的运行，那是因为他们被**整合到结构中**，从而有可能使那些以他们为“载体”的关系和实践得到**再生产**。因此，金融和货币机构中出现无产阶级出身的“专家”并不能防止资产阶级关系和做法的继续再生产，因为正在实施的政治路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机构的结构。
9. 从1924年1月1日到1928年1月1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了5倍，从3.22亿卢布增加到16.68亿卢布。(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104) 在1925-1926年和1927-1928年之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了约42%，而国民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只增加了约14%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art 2, pp. 976, 977)。这促成了本章末尾将写到的价格上涨。
10. Quoted from Carr, *Socialism*, vol. I, p. 473.
11. See A. Z. Arnold Banks, *Credit and Money in Soviet Russia*, pp. 266, 284–285.
12. *Planovoye Khozyaistvo*, no. 1 (1925), pp. 19, 30–31.
13. See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p. 224–227, especially p.225.
14. *Bolshevik*, February 15, 1927, pp. 18–27.
15. 同上，May 1, 1927, p. 9.
16. *Bednota*, May 13, 1927.
17. 见上文*，*简介第四节“粮食收购、其波动和工农联盟的状况”。
18. *Voprosy Torgovli*, nos. 2–3 (November-December 1927), p. 67, quoted in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t. 2, p. 679, n. 2.
19. 见本书第一卷。
20. R. Linhart, “La NEP, quelqu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transition soviétique,”in *Etudes de planification socialiste*, pp. 156 ff., especially pp. 185–186.
21. 见本卷第四篇。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同见C. Bettelhei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Forms of Property* (London), pp. 51–57.
23. 对于这一点，也可参见R. Linhart在“La NEP”中的评论，第195-196页。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工业领域，“生产会议”被认为是为了确保更好地认识现实，但这些会议召开的实际条件严重限制了其实践效果。
24. 见上文，第一篇1.2小节
25. 计算的数字来自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96.
26. 计算的数字来自A. Mendelson, ed., *Pokazateli konyunktury*, 引自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t. 2, pp. 964–965.
27. 同上。在私营部门销售的农产品方面，上升的幅度更大，两年内指数从100上升到204.5。
28. 同上
29. 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104.

## 2. 经济计划机制与程序的发展

我们知道，新经济政策的特点不仅仅是开放发展商品关系，给予个人和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在一定限度内)活动的可能性，以及国有企业的“财务自主权”。除了这些方向和措施之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旨在消除沿着“普通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发展的危险。为此，成立了协调经济活动的不同部门和制定计划的机构。

这些机构的存在和运作根本不足以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这些危险只能通过适当的**政治路线**来消除，但它们确实在新经济政策框架内为苏联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创造了一些初步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列宁非常重视它们的建立。

计划机关的主要职能是政治方面的。它们为对生产的**物质与社会**条件的再生产和改造过程中进行**政府干预**配合、做准备。这些机构是一种特殊政的治实践形式，即计划的支点。在一个像新经济政策（及其后的政策）那样的存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计划具有阶级内容**。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并影响这些斗争的进行方式。由计划决定的干预具有**司法政治**性（juridico-political）。它们在社会再生产的矛盾中发生。它们以一种集中的方式调动了统治权力（ruling power）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以便将**生产过程**引向某个发展方向，改变生产过程的特点，从而**改变占有和分配过程的形式**。

要进行“计划”，就必须使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干预产生实际效果，并**就其指导原则方面对其加以协调**。这样的协调是**目的所在**，但远未能达到。**在缺乏充分实际协调的情况下**，实际给予生产、再生产的社会过程的方向可能与政治领导层“期望”的不同。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起决定性的是**实际存在的过程**，而不是想象中的东西。

与计划有关的政治干预并不直接改变直接生产关系的性质，而只是为它们的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生产要素（agents of production）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只是被计划**间接地改变**——例如，当计划有利于某种特定**生产形式**的扩大（某些生产资料被优先分配给它），却使另一种形式瘫痪，它切断了其再生产所需要的某些或全部物质生产资料（甚至是劳动力）。然而，生产要素相对地位的真正动荡总是来自阶级斗争，来自生产者的活动，以及实际生产条件的变化。

与计划有关的、影响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政治干预，可以要么**直接**，或者**间接**地进行。**间接干预**的形式之一（它是新经济政策的典型，但并没有随着它的消失而消失）是对货币和价格领域进行干预。例如，“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经济术语，指不同商品价格的比值——译注）”的演变对农业不利（通过其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导致**价值转移**到工业和国有部门，从而加速了这个部门所支配的生产资料的扩大再生产，以及这个部门所特有的**生产关系**。

即使苏维埃政府在计划的背景下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进行干预，这些干预的事实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展：这完全取决于干预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类型。与人们经常说的相反，**所有的计划并非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原句确实如此：all planning is not…——译注）：它可以而且经常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计划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取决于**统治权力的阶级性质**，但也取决于计划的内容，即它们所表达的为**加强劳动人民对社会再生产的控制**而创造条件的意图。

计划机关（planning organs）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建立的。在1920年代后半期，它们的活动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当时苏联经济运行的实际条件。这些条件在工业恢复期（继承设备的恢复）接近结尾和重建期的开始阶段（1925年底）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

事实上，从那一刻起，**积累资本的分配**问题就以尖锐的形式出现了。这种分配将决定哪些产业要被优先发展，以及它们将采用的**工艺**。因此，它对**劳动分工**产生了影响。

当资本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自由”流动时，经济发展所呈现的“优先权”与“技术”形式的问题，就通过阶级斗争对工资水平与差别的整体与差异作用，通过对最大利润率的追求，通过在不同部门之间平衡这一利润率的趋势，以及通过各种工业和金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来“解决”。在这些力量的压力下，积累的资本以被选定的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分配，并根据资本家可利用的资本和他们对未来前景的估计，投资于同样被选定的技术。在当时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这些估计得不到实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决定了经济危机所要呈现的形式。

国有工业部门的存在对这种资本分配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再生产构成了相当大的障碍，但它不是绝对的障碍。组成国有部门的各个行业可以“自由”地从一家或多家投资银行或“金融市场”借款。1此外，它们可以确定自己的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融资或偿还贷款的能力。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几年，这种类型的积累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工业和银行企业的财务自主权（khozraschet）为它提供了便利。

然而，在1920年代，工业部门的集中化、现有主要企业（甚至更多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希望发展的企业）的巨大规模，以及恐惧（害怕“市场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卷土重来）构成了这种积累方式的主要障碍。

最重要的是，苏维埃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意愿**与一种积累形式是不可调和的，而这种积累形式意味着各种产业的“自主”发展和资本主义管理形式的再生产。因此，国有工业部门的存在，加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图，决定了计划机关的建立（把分配积累资金作为其任务之一）和这些机关活动的扩大。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2苏维埃政府曾试图根据内战所决定的优先事项来指导生产。当时，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VSNKh）主要作为负责集中指导**当前业务**的机关而发挥作用。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即Gosplan，它主要负责制定**长期和中期计划**。此外，在新经济政策期间，一些其他机关也被赋予了进行计划的任务。

### 2.1 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VSNKh）3

尽管VSNKh主要关注“战时共产主义”下的现行业务计划，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的一项决议委托它制定“整个苏维埃俄国和与俄国结盟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单一生产计划”。这个计划将涵盖“下一个历史时期”。4

在新经济方案开始时，VSNKh的作用趋于减弱，部分原因是建立了Gosplan5，以及企业的财务自主权发展，和Gosbank和Narkomfin的作用。

从1925年起，工业化问题变得更加尖锐，VSNKh的作用再次增加。这个机关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了各种计划的制定，并建立了一个旨在为整个经济（包括农业和运输）制定计划的行政架构（administrative structure）。事实上，由于它与工业领导人的密切联系，VSNKh也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发展他们管理内的工业部门。因此，VSNKh对“计划”活动的扩大被认为与1925年以来工业领导层往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关。这一扩大引起了与Gosplan的冲突，使有关工业化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混乱。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 2.2 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

原则上，Gosplan是负责制定计划的机关。它成立于1921年2月22日，接替了曾制定电气化计划的Goselro。6与VSNKh一样，它的任务仅仅是准备提交给**政府机关**的**草案**，而**只有政府机关才有权做出决定并将其付诸实施**。这种情况表现在Gosplan从属于Sovnarkom和劳动国防委员会（CLD）。

在NEP时期，Gosplan的活动路线经常与VSNKh的路线矛盾。后者与工业界的领导层有密切的联系，而Gosplan的专家更关心解决农业和全面经济平衡的困难，这意味着他们更关心金融机构——Gosbank和Narkomfin。

一开始，Gosplan只有大约40名成员，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其中七八个是党员；其余的是资产阶级专家。71927年初，Gosplan的工作人员有500人，其中许多人是前孟什维克，但决定性的责任掌握在党员手中，特别是曾领导Goselro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8

在1925年下半年，Gosplan制定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年度计划。这个计划没有约束力，正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控制指标（control figures）”。它涵盖了1925-1926年，实际上是一份约100页的小文件，它涵盖了1925-1926年，实际上是一份约100页的小文件，旨在指导各人民委员会制定自己的业务计划。Gosplan主席团自己也强调了它所制定的文件的近似性质：它起草时，缺乏大量所需的信息。1926-1927年的控制指标已经比第一套指标更有依据，但和以前一样，它们不是强制性的。然而，这一次，当CLD（对经济决策有最高监督权）批准控制指标时，它宣布，如果一个行政机关的业务计划符合控制指标中给出的预测，就不需要获得CLD对这些计划的批准。

1927-1928年的控制指标构成了一份500页的详细文件。它们是在与部门计划组织和地区计划组织的密切协作下制定的。1927年6月8日的一项法令在原则上加强了Gosplan在制定计划中的主导作用，1927年8月CC的一项决议规定，从此以后，控制指标一旦被批准，将**构成**（constitute）**制定业务计划和国家预算的实际指令**。9从那时起，业务计划就与控制指标一起得到制定了。10

这些事实表明，NEP虽然涉及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国有企业财务自主权的增加，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为确保经济的集中和计划指导而作出的努力。相反，新经济政策记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了计划机关，原则上可以更好地协调不同经济部门的发展。

布尔什维克党在1925年底决定的政治路线的不确定性——就在关于工业化进程应涵盖的范围和采用的形式的问题被提上议程的时候——促成了这些机关的数量扩张。他们起草的“计划草案”具有深刻的矛盾性——实际上是对当时正在分裂党的不同社会力量和政治倾向的“支持”。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在Gosplan内部有一个工业部门，它在1926年制定了一个特别慷慨的投资计划；在VSNKh内部设立了一个特别机关Osvok（VSNKh下属负责恢复固定资产的特别委员会），它实际上独立于VSNKh，并在某一时期内是“联合反对派（united opposition）”的支持者。11

### 2.3 Osvok

Osvok（особ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основ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恢复固定资产特别委员会”）于1925年3月由VSNKh主席团创建。它立即着手准备自己版本的**五年计划**，并为此目的成立了一些部门和委员会。在皮达可夫（G. L. Pyatakov，“联合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但在流放几个月后被重新接纳）的主持下，Osvok的行动完全独立于VSNKh，有许多前孟什维克经济学家以及非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为其工作。12

但是，由于群众没有有效地参与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坚定的政治路线（这一时期的经济争论所涉及的范围以及**党领导机关通过的决议，其内容之快速而有差异的变化**都表明了这一点），来自Gosplan、VSNKh以及其他负责制定计划的机关的文件所制定的目标是不现实的，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些文件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普遍存在的日益矛盾和分析不当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所制定的经济计划并不能对矛盾进行更有效的控制：相反，由于其错误的方向和不连贯性，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实施”这些计划的做法只会加剧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1927-1928年开启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是不充分和不一致的结果，而这些不充分和不一致本身就是极复杂阶级斗争的结果。这种情况特别反映在工业计划的频繁“修正”上，这种“修正”显然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党看待这种变化的方式有关。对1926-1927年工业投资的预测和党在这方面决定的考察，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3

这些“修正”加剧了经济的不平衡，使由此产生的短缺越来越严重地落在农民身上。这是自1926年起越来越多地放弃NEP所需的要求而在实践中所呈现的形式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总体危机”是由这种放弃和由此产生的严重矛盾造成的。

这种放弃和它所表现的形式需要解释。为了得出这样的解释，我们需要分析192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鉴于农民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种分析必须从农村的状况开始。

注释

1. 这个市场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构成的，这些企业有能力相互提供贷款，或者认购一家或多家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在NEP期间，国有企业是可以这么做的。

2. 见本著作第一卷，第152页及以下。

3. Friedrich Pollock的书*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于1929年首次出版，1971年在法兰克福重新出版，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计划机关和它们的工作做了很好的说明。

4. 同上，第233-234页。

5. 见本著作第一卷，第153页。

6. 见本著作第一卷。

7. Pollock,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p. 236.

8. *Planovoye Khozvaistvo*, no. 10 (1925), p. 9; *Plenum Byudzhetnoy Komissii Ts.I.K. SSSR*, p. 400; and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 vol. I, p. 2, pp.

9. 这些年的控制指标见*Planovoye Khozyaistvo*, no. 11 (1929), pp. 167-168; *Sobranie Zakonov*, no. 37 (1927), art. 373;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p. 252 ff.

10. 从1931年起，以这种方式制定的文件一旦被批准，就成为所谓的“年度计划”（见Dobb，*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第324页）。

11. 见下文，本卷第四部分。

12.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 2, pp. 844–845.

13. 见下文，第四部分，第一章，第四节b）。

# 第二部分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乡村。分化和阶级斗争。农业政策和农业社会关系的转变

以下几页的分析涉及到新经济政策结束时苏联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些分析的目的是阐明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与农业政策相结合的条件，并说明这些关系和斗争是如何导致最终的新经济政策危机的。

正是阶级斗争与农业政策的结合，决定了苏联农村在1924年至1929年间所经历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被看作是一个“自主的过程”而完全由某些不可避免的“内在必然性”支配。它们不能脱离对农民及其各阶层采取的政策。反过来，这一政策也需要与城市部门内部的矛盾发展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式联系起来——些问题将在后面讨论。

## 1. 新经济政策时期直接生产的社会条件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1大部分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于农民在自己的个体农场工作的活动。这些生产部分是为了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部分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换农民的产品。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从事集体形式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数在1924年只占总数的1.3%，1928年占2.9%。2

粮食的商品生产（这一生产部门对城乡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并与1927年底开始的危机有关）主要由个体农民农场贡献：1927年他们提供了92.4%，而苏维埃政府只提供了5.7%，集体农庄提供了1.9%。3

### 1.1 关于农民社会分化的评论

“个体农民农场”构成了一个成分混杂的“社会范畴”。这种表达背后隐藏着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生产关系的复杂性。与这种复杂性相对应的是苏联农民的社会分化和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

#### 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分化的具体特点

在新经济政策末期，苏联农民的社会分化仍然比较有限。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而实现的土地分配（在某些情况下直到1923-1924年还在进行），使土地的分配更加平等。另一方面，在NEP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化过程，具有一些经常被指出的特殊性。这一过程导致贫农在农民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中农比例上升，而富农的经济重要性只是略有增加。

苏联农民结构的缓慢转变主要是建立在**影响贫农的双重过程**上，贫农的一部分加入了无产阶级，另一部分人进入了中农，并巩固了这个阶层。4

从1925年开始，这种分化的具体特征被工农检查院（Rabkrin）、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其他行政机构的调查所证明。5这些调查驳斥了左翼反对派的说法，即苏联农业正在经历一个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分化过程，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是农村资产阶级在加强。

提交给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论点明确承认这些鲜明的特点：

这种分化的特殊性是社会条件改变的结果。这些特点包括：与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方式——表现为中农被削弱，而两个极端（贫农和富农）的增长——相反，在我国，情况正好反过来了。在加强中农群体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富农从较富裕的中农中获得了一定的增长，而贫农群体减少的部分，其中一些成为无产阶级，而另一些——其中的大部分——正逐渐向中农群体转移。6

然而，这种陈述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提到了一般的“社会条件”，并导致读者认为这些条件**足以**说明所指出的分化类型，而事实并非如此。

的确，所指出的分化类型是在苏维埃政权的一般条件下发生的，1922年的《土地法》给土地国有化和村社（mir）的运转赋予了新生命。7

然而，在这些一般条件下，苏维埃农民的分化所表现的形式是由于所遵循的政治路线（特别是以贫农和中农享受减税为特征），同时，也特别是由于**贫农和中农自己**为更好地改善自己的装备和组织自己而进行**的斗争**。8

#### 说明1927年苏维埃农民阶级分化的统计数据

关于苏联农民的阶级分化，已经有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这里我将使用S. G. Strumilin计算出来的数据。这位苏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试图按照**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标准**对农民农场进行分类。9根据这些标准，贫农是指那些只能从农场获得生活必需的东西，或者为了生存甚至需要从事额外的有偿劳动的人。中农是那些有少量剩余的人，当收成好的时候，他们能够积累一点。富裕的农民是那些剩余足够多和固定的人，这使他们能够进行积累，并通过采用雇佣劳动力、实行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其他农村阶层。

Strumilin和中央统计局采用的这些规定，如下表10给出了1926-1927年苏维埃农民的社会分化情况：

社会分化 百分比

贫农 29.4

中农 67.5

富农 3.1

这些数字必然只是近似值。11然而，富农的人数显然是很少的，特别是他们在农村外销售农产品的份额很小，这一点已被统计数字所证明，尽管来源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 市场的粮食供应和农民的阶级分化

根据Grosskopf引用的统计数字，1925年进入市场的粮食主要是由贫农和中农提供的——超过88%，而富农提供的是11.8%。12

贫农和中农出售粮食的重要性（尽管**按人均**计算的收获量相对较小），是由于他们**被强迫出售粮食**（因为缺乏流动资产），以支付债务和税款（秋季到期），并购买不可或缺的工业制成品，包括他们农场所缺乏的设备，而购买这些设备可以使他们减少对富农的依赖性。**贫农和中农在供应城镇的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出售的粮食大部分是在夏末秋初运到城镇的，而富农在一年中把一部分剩余的粮食卖到了农村市场。13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加米涅夫从1925年开始提出的关于“富农破坏”这一过于简化的论点是错误的，这一论点是为了解释1925-1926年的收购困难。14当时，加米涅夫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这些数字不是基于**农民的收入**，而是基于**拥有的土地面积**）15宣布，富农农场占所有农民农场的12%，并拥有61%的“粮食剩余”。16从这些数字中，加米涅夫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即富农从农村获得了大部分的收入，并且是在农村购买消费品和工业制成生产资料的主要买家。这一论点**倾向于支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他声称，固定工业产品的高价格和农产品的低价格不会伤害广大农民**——因为贫农和中农被认为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商业交易——而这将使国家通过向最富有的农民征收“贡赋”来实现更高的积累率。

与这些说法相反，当时送往城镇的粮食约有四分之三来自贫农和中农的农场，他们购买了80%以上在乡村出售的制成品，17特别是为了给他们的农场提供更好的设备，而这些农场严重缺乏生产工具。

斯大林在1928年5月28日对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演讲中提到的数字，证实了上述关于市场上粮食来源的比例。他指出，在1926-1927年，富农提供了这些粮食的20%，而贫农和中农提供了74%，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提供了6%。18

#### 富农的社会和政治作用

当然，如果从这些事实中推断出富农在当时发挥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可以忽略不计，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它的重要性不在于生产领域，而在于其他方面：在**流通**领域，在于富农与贫农、中农之间的商业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个人富裕所提出的幻想，使一些中农屈服于这种幻想，从而放弃了集体的生产形式；在政治领域，特别是通过富农在村社大会（skhod）上的影响力。19

富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根植于NEP下得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性质：雇佣劳动、土地租赁、农具出租和资本主义贸易。这些关系使富农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与他们的农场数量或产量占比完全不成比例。正是在这些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富农对贫农、中农的支配权日益加强的斗争。

然而，承认这些事实是一回事，但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认为富农在生产和向城镇供应物资方面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影响，则是另一回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就错误地得出了这个结论。20尽管反对派最终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其分析的基本内容仍以几乎没有改动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出现在党的领导层于1928年和1929年对收购危机的解释中（当时他们试图用“富农破坏”来解释这一危机），出现在他们试图“处理”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个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矛盾的方式中。

现在，我们必须依次考察农民的不同阶层在1927-1928收购危机中的作用，以及这些阶层在未来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增长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 1.2 1927-1928年收购危机的阶级基础

为了揭示1927-1928年收购危机的阶级基础，有必要研究这一危机的发生方式。我将在下面几页中努力做到这一点，并再次依靠S. Grosskopf的分析，他在这个问题上拆穿了许多“公认的观点”。

#### 收购的第一阶段和富农的销售情况

在1927-1928年农业运动的第一季度（7月至9月），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采购的粮食数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1比在1926-1927年的丰年所采购的粮食数量还要多。由于1927年的**收成**比前一年要**少**，22而且粮食生产的分布也很不利：受产量下降影响最大的地区是那些被称为“有盈余（having a surplus）”的地区，因为他们的生产通常是用来满足一些不那么有利的地区（那些被描述为“有亏损（having a deficit）”）的地区的粮食需求。

分析表明，1927年7 - 9月采购增加的来源主要是富农。一方面，他们在生产和运输工具方面有优先权，因为这些工具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急于在10月份之前出售，而10月份是贫农和中农通常把粮食运到市场的时候，这降低了可获得的价格。此外，由于苏维埃当局在1926-1927年采取的政策使粮食价格在1927年春天没有上涨，富农对1928年春天的价格上涨不抱希望，这使他们更有动力迅速卖掉自己的农产品，因此1927年7月至9月粮食采购增加了。23

当然，富农在1927年夏季加速运送粮食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囤积一定数量的粮食。然而，这确实表明，在1927年秋季，农村所拥有的大部分“储备”并没有集中在他们的手中。24

#### 收购的第二阶段以及贫农和中农的斗争

因此，从秋天开始，采购的粮食通常是贫农和中农提供的。而在1927年秋，这些补给没能实现。

发生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1927年下半年，对农村地区的工业制成品供应下降。贫农和中农出售粮食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获得他们购买制成品所需的现金，特别是他们缺乏的小型生产工具。在1927年秋季，由于这些产品的供应也出现了下降，所以粮食的销售额也下降了。给予贫农和中农的减税也意味着，施加给他们的财政义务带给他们的“销售限制”现在不那么严重了。

从1927年秋季开始，采购量下降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在某种程度上的疏忽，它们在1927年表现得特别被动。这是由于官方机构现在不再害怕来自私营贸易商的竞争，因为私商比以前受到了更严厉的限制。它们的被动也源于中央对官方采购机构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指示：虽然Gosplan号召他们积**极鼓励农民出售**他们的农作物，但同时党和政府的指令又警告它们不要在农民之间进行可能的竞争。苏联当局确实担心采购机构之间的这种竞争带来粮食价格的上涨。这些指示的后果之一是，**大多数代表采购机关的买主等待农民主动来向他们提供粮食**，而农民并没有这样做。25

然而，农村工业品的短缺、税收的减少和采购机关的更加被动，并不能对粮食销售的下降提供更多的解释。为了完成这个解释，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贫农和中农**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了大部分的粮食销售**。

从上面的事实（人均可获得粮食最少的农场，出售粮食的比例却很高）已经可以看出，在广义上讲，粮食销售与农民所持有的“过剩”粮食的存在状况并不相符。这样的“过剩”意味着贫农和中农对粮食的基本需求（用于自己的食物，喂养牲畜，以及建立足够的储备，使他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等待下一次收获）已基本被他们的生产所满足。事实远非如此。

实际上，在1927-1928年，当天气状况普遍不佳时，大部分农民由于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只收获了少的可怜的作物。当然，这些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出售了大量的粮食，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支付他们的税收或购买工业产品，如果做这些是必须的。26当这种限制或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时，他们就尽量少卖粮食，因为对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来说，卖粮食会带来严重的困难。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提高个人消费水平，以及他们营养不足的牲畜的消费水平，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至少保持最低限度的储备储备。对农民来说，拥有这样的储备意味着他们可以减少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到来之前被迫向富农购买粮食的风险，而且，由于这些粮食通常都是赊购的，因此他们会越来越依赖富农。

在1926-1927年这个丰收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即使在所谓的过剩地区，农业本身的需求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涉及到大多数农民的个人消费、牲畜的饲养以及保持玉米种子和储备物资的供应**。27这一点在1927年更加适用，当时的收成要小得多。而就在这时，对农村地区的工业品供应急剧减少，税收也随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贫农和中农向采购机构提供与前一年相同数量的粮食，就必须有政治上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在当时是不存在的，而且从党与农民群众关系的历史来看，也几乎是没有准备的。28

### 1.3 新经济政策时期贫农和中农斗争的形式

收购危机问题与广大农民生活水平低下29、生产资料不足，以及**中农、贫农为避免日益依赖富农而进行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 争取生产资料的斗争

对贫农和中农来说，他们出售农产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增加生产所需的资料，从而**减少对富农的依赖，而富农拥有大部分的耕作和运输资料**。

在土地分配（指颁布《土地法》——译注）的第二天，由于没有对其他生产资料进行分配，30贫农和中农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处境更差了。因此，他们**在农业劳动工具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受害最深**。1927年，**苏维埃农业所拥有的机器和工具总数只有战前的三分之二**。所拥有的机器和设备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富农占有，他们以高价将这些机器和设备出租给贫农和中农。

1924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到1927年，情况没怎么改变过，**镰刀供应不足，大多数农民只能用镰刀收割。铁犁也很缺乏。**工业供应很少，就像它供应很少的钢铁给村里的工匠一样。大多数农民不得不使用sokha（一种木制的摆动犁）来耕地。**种植所需的其他工具，如斧子和锯子，也基本上得不到**。31至于收割机和脱粒机，大多属于富农。

贫农和中农的劳动工具供给不足，是农民群众对富农的特**殊依赖形式**和富农对劳动农民的特殊剥削形式发展的根本因素。这种不足解释了**贫农和中农经济的极端脆弱性**，**以及向农村地区提供生产资料与贫农、中农有能力和意愿提供的收购农产品数量之间的密切依赖性**。从这个角度看，发生在1925-1926农业年度的事情极富启发性，因为它是**1927-1928年危机的某种“彩排”，不过导致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1925-1926年是一个丰收年。在农业年度的第一季度（7月至9月），农民在农村外的销售量比前一年大得多，但随后，正如1927-1928年再次发生的那样，这些销售量在第二季度（10-12月）急剧下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米涅夫谈到了“富农破坏”。现在，不仅对当年不同阶段出售粮食的农场的分析表明，而且最重要的是，**后来的销售情况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少数农民的“破坏”问题，而是一种群众现象，主要与农村地区对贫农和中农购买的工业制成品供应的状况不良有关。**这一危机的直接根源在于苏维埃政府对农民群众政策的错误。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组合措施得到迅速纠正，即改善对农村地区制成品的供应。最终，政府的粮食收购计划在1925-1926年实现了97%，不需要诉诸“非常措施”。

由此可见，除非收成很差，否则**粮食“过剩”和采购的水平主要由苏维埃国家本身的政策决定**——它的价格政策、粮食采购的组织以及对农民群众的制成品供应。32

此外，向贫农和中农提供生产工具（1927-1928年严重不足），33不仅是收购方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在苏维埃政府支持农民群众抵抗富农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斗争方面也是如此。

贫农和中农所遭受的设备匮乏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部分（有时是全部）土地租给富农，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他们，或者从他们那里租用劳动工具（包括役畜）。因此，在1926年，超过72%的土地出租案例是由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完成的。同样，超过52%的农业雇工是贫农，甚至中农，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工具而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贫农和中农也常常被迫“雇用”马匹或犁具的所有者，**这些[工具的主]人（补译以使含义清晰）更愿意**扮演“农业工人”的角色。**34

工农检察院1927年的一份报告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少关注因农用物品的借贷行为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然而，这些社会关系对贫农和中农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正是为了摆脱这些关系，这些农民为了购买农具，竟然出售他们所需的部分粮食，以求能养活自己并建立储备。同时，市场上可用的农具短缺导致这些农民减少出售，同时也加剧了他们对富农的依赖。同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主张的高价工业制品的政策，也会降低贫农、中农的装备能力，从而增加他们对富农的依赖，加强后者。

有两个事实足以说明农业设备供应不足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影响。一方面，根据1924-1925年在奔萨省进行的调查，这种不足意味着**中农只能播种他们拥有的可播种土地的29% 至 37% 来种植粮食作物——在贫农中，这一比例只有 18% 或 19%，而在富农中，这一比例接近 40%。**此外，由于耕种得不够好（特别是由于没有适时耕种和收割），**那些“雇用”马匹、犁具的所有者来耕地的人，土地产量比平均水平还要低18%以上，而拥有铁犁的农民的土地产量则比平均水平高23%。**35

另一方面，贫农和中农往往不得不支付相当于其作物价值**近五分之一的费用，以租用农具和耕畜。**36

因此，贫农和中农为充分装备自己的农场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摆脱富农的统治和剥削而进行的斗争，而贫农和中农向收购机构交付粮食的情况，是与这种斗争以及与苏维埃政府为贫农、中农的斗争提供物质支持的能力有密切关系的。一般说来，这种支持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在1927年，它基本上没有了。**收购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

对贫农和中农装备农场的努力支持不足，这种忽视正中富农下怀，影响了收获和收购的扩大，这一点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列宁经常提醒党注意这一问题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例如，在内战期间，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主要是供给中农城市工业品，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资……”37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列宁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他强调，苏维埃政府必须给自己定下任务，**向贫农提供比资本家以前向他们提供的更多的工业品**，必须“不仅给工作者及其家庭提供必需的纺织品，而且给农民提供他们所迫切需要的机器和工具，哪怕是最简单的机器和工具。”38

这些段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表明，早在1921年，**列宁就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想法，其物质基础是向农村的劳苦农民提供劳动资料**（“哪怕是最简单的那种”）。这是一个“以钢铁为基础”而不仅仅是以纺织业为基础的联盟。

然而，多年来实际遵循的政策并非如此：只有在1926-1927年，对农村地区目前的工具供应才略高于战前的水平。

#### 贫农和中农为加强能巩固其摆脱富农的独立性的组织形式而进行的斗争

贫农和中农为组织起来以巩固他们对富农的独立性而进行的斗争，需要特别注意。**我们在这里发现，列宁的分析得到了证实，他曾指出，通过在NEP的框架内把工农组织起来，存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39这种证实更加引人注目，因为正如莫洛托夫所承认的那样，这种发展没有得到过布尔什维克党系统而持久的支持。40（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自我组织的发生与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社会主义思想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渗透到了劳苦农民的中间。）

贫农和中农组织起来的形式之一是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的协会。一般来说，这些协会只把少数农场聚集在一起，通常不到十个。它们在粮食种植区、大草原、乌克兰、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对播种机和脱粒机的使用尤其重要。在乌拉尔地区，有32.9%和28.2%的机器通常以这种方式得到使用，而在西伯利亚，相应的比例分别为29.8%和32.3。按这种方式得到使用的拖拉机甚至是100%。41

贫农和中农还求助于传统的互助形式，如supryaga，通过这种形式，五到七个农场共同利用劳动力、耕畜和工具，并组织起来获得贷款。这种情况发展了真正的**集体劳动**，使许多贫农和中农能够耕种他们所拥有的部分土地，这些土地是土地革命的结果。这一运动还产生了数以万计的“简单”生产者合作社，它们不享有集体农庄的地位，通常也没有正式登记。各种调查显示了这场运动的规模。42但是，在前面提到的报告中，莫洛托夫没有注意到这些简单的形式：他表扬的是“大型生产单位”、“大型企业”的优势。43

在乌克兰，这种形式的贫农斗争特别发达。它与内战期间出现的“贫苦农民委员会”（Komnezamy，或KNS）的活动有关。即使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些委员会仍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存在，并在NEP时期得到发展。1925年，乌克兰超过14%的农民属于这些KNS，这意味着贫农的比例非常高。研究表明，大多数KNS组织稳固，为提高生产和成员的生活水平做出了有效贡献。他们不仅安排后者之间的互助，并开始引进新的耕作方法（通过修改作物轮作制度），而且还帮助其他农民、参与组建合作社和其他形式的联合工作。

其他事实也证明了建立农民组织联合使用土地的“自发”倾向的重要性。有“开辟边远地区土地的社区”得到建立。当他们采用这种联合形式时，参与的农民决定采用集体耕作的形式（poselki和vyselki），而不是个人持有。特别在某些地区（如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和奥列省）建立了集体耕作制度，这些地区的大量土地离老村庄太远，无法由这些村庄的农民正常耕作。重要的是，这一运动主要是由贫农发起的，他们没有组成新的传统类型的“土地组合（land association）”，而是采用了集体耕作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确保几年内轮流耕作，避免以前的村社（mir）造成的分裂。44

的确，从苏联农业的总体结构来看，贫农和中农各种组织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个体农民耕作的巨大优势地位。然而，它们的存在，由于它们所采取的形式之多样性和它们表现出来的倾向之活力与深度（尽管没有苏联政府的系统援助且面临富农的敌意），表明了向社会主义农业组织过渡的可能性是多么大。45

### 1.4 农业政策和1927-1928年的收购危机

上述事实表明，1927-1928年的采购危机主要不是“富农破坏”造成的，而是苏联政府在贫农和中农问题上犯下的一些错误所导致的更为复杂过程的结果。由于这些错误，这些农民的主动性和独立的阶级行动受到了限制。随后，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非常措施”，既打击中农，也打击富农，这甚至导致了阶级力量的调整，使富农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农民的一个重要部分增加了影响力。在这方面，农民群众对1928年以来苏联政府所采取措施的抵抗，不仅是他们对侵犯其物质利益的直接反应，而且也反映了富农当时对他们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富农威胁”在1928-1929年出现了。46

为了了解这个过程以及它是如何与苏联政府的农民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某些事实。

#### 1924-1927年农业政策的弊端

1924年至1927年期间农业政策的缺陷，首先是由于对农村地区生产工具供应的不足，那里最需要这些工具的是贫穷和中农。47

必须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向农业提供机器和工具的“成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达到可以认为是苏联经济无法承受的负担的程度。在1926-1927年，这些供给涉及的金额达到战前的1.221亿卢布，或国民收入的0.8%。48此外，由农民购买的农业设备的供应，原则上不**向国家预算收取任何“费用”**。至于贷款供应，只需要有限的垫款，这些垫款可以通过生产和货币收入的增长迅速收回。

提供的设备数量少，对贫农和中农特别不利。实际上，他们在接受这些设备方面还不享有优先权，而且信贷系统的运作方式使他们也不是贷款的主要受益者。49此外，向农村地区提供传统的生产工具或这些工具的**改进版**（贫农和中农最容易获得）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因此，莫洛托夫在提交给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轻蔑地把向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称为“可悲的‘进步’”。50

经济上不努力优先援助贫农和中农，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从政治角度看，这种优先援助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贫下中农对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从经济角度看也是如此，因为贫下中农的农场具有最大的增产潜力，因为他们装备不足——他们的大部分土地甚至没得到耕种，由于他们没有自己的工具，所耕种土地的产量比其他地方低，所以最容易迅速增加。

#### 对贫农和中农农场潜力的估计不足

总体说来，1924-1927年农业政策的缺陷与对贫农和中农农场的潜力估计不足有关。511928年和1929年，即使在新经济政策制定期间，只要农民得到适当的劳动工具，并帮助他们扩大耕作面积和增加产量，并更有效地组织起来，苏联农业的潜力仍然很大。

苏联农民“墨守成规”、“懒惰”的“形象”是错误的。要相信这一点，只需注意到1925-1926年**农业总产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尽管农村的生产资料比以前还要少。**52

农业设备不足是由于旧设备磨损和新设备供应不足造成的。这根本不是由于农民的任何所谓冷漠或“懒惰”造成的。相反，统计数据显示，1927年用于购买设备的支出比战前增加了70%。53

经济学家奥加诺夫斯基（Н. Огановский）指出，这一时期的农业潜力比革命前大得多。他写道：“无论是经济和社会事实，还是干部和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作用，都没有可比性。如果背景是不可比较的，那么在当时得到的结果和现在得到的结果之间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正如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的那样。”54

当时所作的一些估计，至少是部分地考虑到了新经济政策农业的潜力，特别是为了预测农业生产和“净余额”。55因此，Osvok估计，1931年的粮食产量为8780万吨，比1926年增加了14.9%，这应该提供了1460万吨的“净余额”，比1926年多56%，这意味着净市场供应量为18.7%。

这一估计实际上是基于对1931年将收获产量的极低估计。它假设这一产量将与1928年相同，因此只有种植面积会变得更大。在1926年，每公顷的产量已经高于战前的平均水平，56尽管苏联农业仍然受到设备不足的影响，但这无疑是低估了。如果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继续保持与1925年相同的速度，那么，粮食收成预期约为9200万吨是合理的，这将使“净余额”为1700万吨。57

20世纪20年代末，新经济政策农业的实际潜力更大，因为**当时的贫农和中农准备一步一步地走上合作**、集体劳动和生产的道路（只要他们真正得到苏维埃政府的帮助，而不是受到那些伤害他们和动摇工农联盟基础的措施的影响）。这些劳动和生产形式意味着——如果农民自愿加入——收成增加的可能性是巨大的。它们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土地面积，使用机械，以最少的时间损失进行耕种工作。这一点已被这一时期的经验所证实。

但是，党的领导层往往低估了新经济政策农业的可能性，没有考虑到沿着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的实际要求。

#### 对发展集体耕作与合作的援助额很小

从新经济政策开始到十五大（1927年底），贫农和中农为进行**各种形式的集体劳动或生产**所作的努力仍然没有得到系统性支持。莫洛托夫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他没有从中得出任何实际的结论，他声称：“现在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的……我们落后了，没有跟上现在乡村里新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步伐。我们现在缺乏的是刺激村庄集体化的勇气和毅力，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它了解不够。”58

那时，莫洛托夫并没有从这一观察中得出结论，即确实有可能大幅度加速集体农业的发展。相反，他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个体企业是一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从个体农业向集体农业转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59

这种对集体农业可能性的低估，伴随着对合作社运动的不充分支持。我们知道列宁认为合作是一种导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形式。60然而到了1927年，尽管合作有了不可否认的发展，但布尔什维克党却没有给予它一切必要的帮助，在这一点上，它受到了合作主要为富农利益服务这一思想的影响——而经验表明，它对贫农和中农是多么重要。在引用了列宁关于合作的观点后，他说：“列宁的这段话还没有被我们充分理解。不管怎么说，它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61

然而，党的一些决议已经提请注意发展合作社应该发挥的作用。我可以特别提到1922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其中强调了农业信贷的重要性，以及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的一项决议，其中指出，发展合作贸易可以使贫农增加生产和销售，同时限制富农的权力。621925年4月，党的第十五次会议重申了组织农业信贷的必要性。它呼吁合作社接管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以及向农民群众提供生产资料的工作。这项决议还呼吁合作社鼓励发展一切可能的土地集体劳动形式。

事实上，尽管有这些决议和列宁关于合作社要发挥的作用的声明（特别是在）63，合作社的发展并没有得到苏维埃国家的全力支持。合作社没有被牢牢地引向一个方向，即在短时间内加强由贫农和中农耕作的农场，从而同时确保粮食采购的增长和规律性。

在1927年10月1日，将近40%的苏联农民是国家合作社的成员，然而，国家合作社更关心从农民那里购买农产品而不是向农民出售生产资料，这就意味着贫农和中农对国家合作社的兴趣相对较低。64至于信用合作社，它们的活动使不到20%的农民受益，它收取的利息比较高，而且从1925年起，它只发放数额比较大的贷款，超出了贫农的需要和能力。因此，后者几乎没有从这些合作社的存在中得到好处，而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者。65

新经济政策结束时出现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对贫、中农的需求重视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合作社制度的基层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腐败和失职造成的。国家交给合作社支配用于向贫农提供贷款的资金，实际上没有得到使用。地方合作社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些资金得到利用。此外，它们的活动与农民的生活条件相距太远，而且常常受限于地区苏维埃实行的官僚主义控制。66当然，这种状况与党在农村的根基薄弱有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将在后面讲到。

### 1.5 1928年和1929年，矛盾通过农民与农业政策进一步加剧。

根据前面提到的事实，1927-1928年的采购危机似乎根本不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的结果，而是**政治错误**的结果。这是由于党的根基在农村的薄弱，也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使得党在实践中（即使认识到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低估了本应给予农民群众的援助，而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工业上。与1925-1926年的危机不同，1927-1928年的采购危机，并没有导致对农业政策的纠正。对大规模工业化的日益重视阻碍了向农村供应制成品的任何认真和迅速的改善。同时，完成工业化计划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采购维持在一个足够高的水平。直接的后果是，1928年初实施了“非常措施”，而且尽管党作了种种努力，也没能放弃这些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延续并没有帮助改善农业的状况——恰恰相反。但更糟的是，大部分农民认为非常措施的恢复放弃了此前存在的工农联盟，而农村经济状况的恶化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决定了乡村中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并增加了富农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影响力。工农联盟的危机由此产生，并在1929年期间使党（由于它分析形势的方式）突然完全放弃了新经济政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一放弃是在不利于集体农庄运作的情况下发生的，特别的，随之而来的是1930年代前半期非常严重的农业生产危机。在1928年和1929年，非常措施继续得到执行，这意味着这些措施不能再被视为仅仅是“紧急”措施，正如在1928年初对它们的描述那样。相反，它们变成了“普通”措施。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是**向一种不同于NEP的政策进行的过渡**，这种过渡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

#### 收购危机和“非常措施”的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主要经济影响

收购危机和非常措施的长期实施**对粮食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进而对整个农业生产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这些后果来自两种类型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是技术经济方面：当征收使一些农民得不到**甚至是播种所需的谷物**时，这直接导致了随后的生产下降。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当农民认为他们可以支配的粮食数量不取决于他们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行政当局的决定时，他们就不愿意增加生产。反过来，产量下降和实施非常措施的经济后果又产生了政治影响。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变成了政治（economics turned into politics）”，正如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最后阶段的农民起义时指出的那样。这种从经济到政治的转变是实行和延长“非常措施”带来的最严重的结果。

##### 1928年粮食产量再次下降，1928-1929年非常措施的恢复，以及收购量的下降

1928年非常措施的实施和实施的方式在农村地区引发的所有紧张局势，**对粮食生产产生了消极影响**。与1927年的产量相比，1928年的产量再次下降，只有7330万吨。67与1926年相比，产量下降了310万吨。

产量的下降导致了采购量的下降趋势。正如我们所知，苏联政府在处理这一局势时继续采用非常措施。但是，在收成下降和农民储备耗尽的双重作用下，现在粮食采购量遭遇了真正的崩溃。它不到830万吨，约占1926-1927年没有采取非常措施时采购量的78.4%。68这对整个苏联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民储备库存耗尽的一个特别明显的迹象是，1929年上半年的采购量急剧下降。在这6个月中，采购的粮食数量不超过260万吨（不到1928年上半年采购量的一半）。69同时，私人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达到了新的高峰**。70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非常措施对农民的冲击，使他们的**生产能力再次下降了**。这样，1929年的粮食收成又一次下降。它不超过7170万吨。71与1926年相比，减少了470万吨。这种下降更具有灾难性，因为它发生在工业化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刻，如果要在不使整个经济过度紧张的情况下将其继续进行，就需要增加农产品的供应，主要是粮食。

因此，非常措施**并没有真正帮助克服最初的困难**。相反，它们**破坏了新经济政策的运作**（事实上，它们**终结了新经济政策**），并打破了苏联农业在1926-1927年之前所显示的活力。

正是1928年和1929年的收成和粮食采购的崩溃（也就是长期执行非常措施的后果之一），促使布尔什维克党在1929年底大规模地转入集体化。这么“转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阻止采购的下降。这种“转向”发生的条件是，不再能够依靠以前取得的农业成就，或依靠对农民的说服和他们的热情。1929年秋开始的大规模集体化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措施“自上而下”进行的。它确实使强加给各集体农庄**相对较高的交付配额**成为可能，即使是在多年来收成不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从1931年开始实行集体化后，粮食产量**经常比1926年下降12%或14%**。此后，维持和增加对粮食产量的征收是以农民自己的消费为代价的——但这些事实已经属于另一个阶段，那就是所谓自上而下革命的阶段。72

我们可以看到，1928年和1929年采取的措施对整个农业生产的影响并没有像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那样严重。原因是非常措施几乎不直接影响除谷物以外的任何其他作物。73

布尔什维克党对收购问题的原初重视，是由于农业的“粮食净余额”在供应城镇人口和维持出口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粮食余额的问题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数字是农业的“粮食净余额（net grain balance）”，即**在农村外明确销售粮食的净额**。74即使在1926-1927年（即在实施非常措施之前），这一净额也不超过1050万吨，而1913年约为1900万吨。75虽然农民的粮食消费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农村人口增加），但与战前相比，粮食净余额的收缩幅度**大于产量的下降**。76

但是，总的来说，1926-1927年广大农民的粮食消费已经达到了明显高于革命前几年的水平。农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大大改善，而且对富含蛋白质产品（肉、蛋、奶）的人均摄入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77

然而，总的来说，1926-1927年的粮食与战前相比，农业的粮食净余额的下降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虽然在1909-1913年和1926-1927年之间，这一余额下降了大约44%，78但在1913年和1927年之间，**城镇和工业的粮食消费量上升了约28%**。79采取非常措施并没有使这方面的情况得到改善，因为农业的粮食余额在1927-1928年有所下降。当时净额只有833万吨。1928-1929年，尽管收成下降，但非常措施使粮食余额保持在与1927-1928年相同的水平上，80但这一结果只是通过**减少乡村的消费**来保证的，因为乡村不得不承担粮食产量下降的全部后果。

因此，通过非常措施，农民被迫减少了粮食消费。早在1928年，这些措施的实施已经剥夺了农民群众**一些赖以生存的和用于下一季播种的粮食**。斯大林在1928年7月13日提交给CC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事实证明，不得不“加强”某些地区的粮食收购工作，并“触动了农民的防荒粮”。81

在受这种强征影响的地区，许多农民试图从城镇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粮食。82城镇中的粮食分配因此被打乱了。城市居民担心自己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试图囤积粮食，这使得在某些城镇实行配给制成为必要。83这样做的结果是阻止了农民从商店中获取供应。在某些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甚至不得不把收购的部分粮食卖给农民。

总之，1927年以后，城乡的粮食供应都在恶化，可供出口的粮食数量急剧下降，以至于在对外贸易领域也出现了危机的症状。

##### 收购危机和对外贸易

布尔什维克党采取非常措施的突然，首先是由于党在农民中的代表不多，而且它对农民和农业问题的具体认识非常不足。但是，在实施这些措施时表现出的僵硬，也是由于这种收购下降对苏联对外贸易的严重影响。

这些数字是不言自明的：1926年至1927年，粮食出口量达到216万吨（仅占1913年的22.4%），84而1928年则下降到8.9万吨。85需要补充的是，这是出口总额的数字。仅是通过动用国家储备才实现了这些出口，国家储备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以至于苏联不得不在1928年夏天进口粮食，来恢复其紧急储备——数额达到25万吨。86

因此，1928年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来弥补粮食出口的下降。这一努力的结果是积极的：尽管出了各种情况，出口总值还是增长了约3.8%，达到7.995亿卢布。87这一增长是通过大幅提高油料、黄油、鸡蛋、木材、毛皮等的出口实现的。88只有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出口的集中管理才使这种努力可能：它是由**国内市场上出现新的短缺**作为代价实现的。

然而，工业化计划的启动（计划的基础是**依赖从国外广泛进口工业品**）由于**出口进展缓慢**而遇到了困难。后者不足以保证所需的日益增长的进口量。苏联在1926-1927年的外贸顺差，但在1928年却出现了1.531亿的逆差。如果在1929年延长非常措施，这也是为了纠正外贸状况。事实上，苏联决定**增加粮食出口**，而不顾及收购量的下降：粮食短缺的情况因此更加严重。

**因此，收购危机与工业计划的要求发生了激烈的矛盾。**这就是1920年代末危机的主要经济方面。这是一个与当时制定的**工业化政策的形式**密不可分的方面。收购危机以及危机应对措施的政治后果与“经济”后果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它们互相制约。这一政治后果对于工农联盟的未来，以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们处于这一时期整个阶级斗争过程的中心。

我们现在必须研究的就是这些后果。

#### 收购危机和长期实施紧急状态所造成的情况对农村阶级关系的主要影响

当然，1928年1月后发展起来的局势对工农联盟的政治后果是复杂而矛盾的。党的领导人当时发表的声明和报刊上出现的内容都反映了这些矛盾。在某些时候，人们强调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增加了，这应该是非常措施实施的结果。而在另一些时候，则提到了这些措施的负面影响，据说这些措施使富农能够把广大农民团结在他们周围。斯大林的著作也显示了不同的评价，既反映了客观形势中的矛盾，也反映了党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影响。

##### 斯大林关于1928年上半年实施非常措施的后果的一些设想

在1928年4月的全会上，斯大林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这应该是实施非常措施的结果。在宣称这些措施“使我们能够结束收购危机”（这很快就被证明是不真实的），并通过清除“那些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的显然已经腐化的分子”而使地方党组织或多或少地健全起来之后，他又说：“我们改进了农村工作，孤立了富农，稍微得罪了富裕的中农上层，使贫农更加靠近我们，使绝大多数中农跟着我们走。”89

然而，我们知道，在实践中，非常措施远没有只影响富农。事实上，早在1928年2月，斯大林就发出通知，警告党的地方组织不要采取“过火行为”，影响富农以外的农民阶层，因为这可能会对这些其他阶层“造成新的困难”。90

1928年夏初，斯大林虽然仍然赞成非常措施——他认为不可能放弃这些措施——但从阶级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角度出发，他对农村的形势发展采取了更为悲观的看法。这在他1928年7月的讲话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他向列宁格勒党组织提交的关于月初举行的全会结果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斯大林承认，采购危机并没有在3月份结束，在4月至6月，有必要将非常措施扩大到从农民持有的**紧急储备**中提取粮食，结果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在描述了这些措施及其采取的形式后，斯大林又说，这些措施“使国家的政治状况恶化，给（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贝特兰补注）结合造成了威胁”91。在处理同一问题时，1928年7月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农民中的某些阶层对一些地区采取的专横的行政措施表示不满，并举行了示威游行。”929个月后，在1929年4月的全会上，93当斯大林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面前攻击布哈林时，他再次提到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性，声称这些措施“依靠中农和贫农群众共同赞助”94。这种说法并没有被随后几个月里实施收购的实际方式所证实。

因此，斯大林对非常措施造成的阶级后果的评价各不相同。它们不能使我们找到真正问题的答案：这些措施的相互矛盾的影响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农村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 1928年农村形势的总体情况

当我们从这个总体上看，可以清楚地发现，1928年期间苏维埃政府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恶化构成了形势的主要方面这一恶化涉及很大一部分中农，甚至包括一些贫农（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到非常措施影响的农民）。

这一恶化形势的症状是不可否认的：例如，播种面积和牛的数量缩减。后者不仅是由于饲料的短缺（由于非常措施的程度）而且是由于一些中农害怕被当成富农。95更广泛地说，许多农民对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信心动摇了：他们不再相信有一个安全的未来，而且由于生产资料的供应越来越不充足，他们也处于客观困难的地位。在农民中形成的不确定气氛也与**成千上万的小规模企业被行政手段关闭有关，而以前由这些企业提供的生产和分配却没有被国家与合作社的工业与贸易所取代。**

牲畜数量的减少，导致了牛奶、黄油和肉类的供应危机，加剧了粮食危机。96

特别是在1928-1929年的农忙季节，苏维埃政府与广大农民阶层的关系恶化了。在1928年初采取的措施之外，又多了其他带有财政性质的措施。从此，对一部分农民的征税不再是根据事先确定的标准（根据新经济政策开始时所采用的原则），而是根据税务局人员估计的“个别基础（individual bases）”。从理论上讲，以这种方式征收的税款只影响最富有的农民。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农，原因有很多：没有严格界定哪些农民以这种方式征税；税务部门不熟悉农村的实际情况；（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富农有机会隐藏自己，使税收的负担落在不应该被如此征税的农民身上；等等。

1928年11月以后，斯大林提到了在实施“个别税”适用上的错误。他说，应该只有2%到3%的农户受到了影响，而在一些地区，“征收面扩大到百分之十或十二，甚至更多，因此触犯了中农”。97

随着一波来自农村人口的抗议浪潮，一些被错误征税的农民拿回了他们的钱。尽管如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农之间的关系还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此后，部分富农倾向于与富农站在一起，共同抵制行政决定。此外，**中农经济的削弱增加了他们对富农的依赖。**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年底，苏维埃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TsIK）通过了一项关于“占有和分配土地的一般原则”的重要决定。98这个立法文本对1922年的《土地法》进行了重大修改，99从两个角度看都很重要：它促进了向农业劳动生产的集体形式的过渡，并限制了富农攫取土地的可能性。

然而，法律中对乡村的村社大会（skhod）的安排表明，苏维埃政府有义务削减这个大会的权力，并将其置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此后，中农占多数的skhod作出的决定可以被农村苏维埃废除，而这些农民在农村苏维埃中越来越沦为少数。

在政治上，这一措施意味着与NEP的决裂，NEP将中农视为苏联农村的中心人物。它表明，中农和政府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因为它从这些农民手中夺走了迄今为止允许他们在skhod框架内进行自主决策的权力。这一方向上的改变意味着NEP着手在苏联政府和中农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严重恶化了。这表明，后者（在某种程度上被推入了富农阵营）和前者的取向之间存在分歧。而且，不论苏维埃政府的某些新方向怎样合理，引入限制性手段来使广大农民的意志屈服，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让我们回想一下，就在通过令skhod接受国家指导的决定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一决定将成为所谓“自上而下革命”的工具之一，即不是由农民群众自己决定的集体化——斯大林提到列宁说：“要完成革命，只有党的正确路线是不够的......要完成革命，还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使群众即广大的工人群众**根据本身经验**相信党的路线的正确性。” 100

正如列宁六年前预测的那样，101引发了与 1928 年类似的情况，工农联盟的削弱使党越来越分裂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哪怕农民不满意也要“继续前进”，另一种则试图防止工农联盟破裂。

以斯大林为首的第一种倾向的支持者深信，只有快速工业化和集体化，才能为工农联盟提供新的物质基础（一种“钢铁”，即拖拉机的基础），并通过将机械引入农业来统一生产的技术条件，从而克服困难。

当然，另一个倾向的代表（被称为“右派”，由布哈林领导）最关注的是削弱工农联盟，以及如何把反对富农的斗争转变为反对中农的斗争。102然而，第一种倾向的代表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富农对中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中农也表现出不满情绪。卡冈诺维奇也是如此，尽管他主张把“强硬”路线作为确保苏联工业化的唯一途径。他在1928年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农有时会受到富农的影响，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受到了]相当重的税收，以及我们目前无法为他的谷物提供与制成品相称的价格。”他承认，在对富农采取行动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惩罚了”中农。103

1928-1929年的收购运动开始的很不顺。从10月开始，收购机关的压力又在很广的范围内产生了。1928年12月2日的《真理报》谴责了对中农和贫农施加的压力和采取的严厉措施。组织这两个阶级的尝试没有取得什么成功，这两个阶级在农村并不能构成党在农村可以真正依靠的力量。同时，由于国家支付的价格（尽管1928年7月后价格稍有提高）和自由市场上的价格（现在是原先的三到四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农也越来越不满。104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民没有坚实的组织，也没有足够高的政治意识，**部分收成在官方渠道之外得到销售，不仅是富农，贫农和中农也这么干了（通过这些销售，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对富农的经济实力）。**虽然“自由市场”上的销售通常没有被禁止，但地方当局经常对其进行惩罚，以促进他们自己的收购计划。这些惩罚既影响了中农和贫农，也影响了富农，他们的不满情绪因此而增加。

##### 1929年农民的反抗和强制措施的发展

在1929年初，有许多迹象表明，农民对正在实施的越来越严厉的收购措施的抵抗正在发展。从1929年1月开始，苏联媒体越来越多地提到作为苏联政权的敌人“类别”的农民。媒体提到了“小富农”（kulachniki），他们“跟着富农的节奏跳舞”，还有“次富农（podkulachniki, sub-kulaks），他们代表富农进行破坏活动”。105这些说法与社会经济范畴无关，而与意识形态范畴有关。它们的出现反映了一个现实：**富农对**直接利益受到损害的**贫农和中农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还反映了**党内普遍存在的对农民的不信任态度**。106

这种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态度，与地方当局理解他们从中央收到的指令的方式是一致的。无论如何，它进一步削弱了工农联盟，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富农的思想和政治影响。

支持维持和扩大非常措施或其他类似措施的RSFSR的Sovnarkom主席塞尔佐夫（Syrtsov）在党的第十六次大会（1929年4月底）上的讲话中，描述了农村的力量关系是如何演变的：“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事情是怎样形成的，富农是如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的，他们自己的阶级需求是如何被提出的。”107

**富农之所以能够发动反攻，显然只是因为他们成功地**（由于1928年初以后的形势发展）**吸引了足够多的农民支持他们。**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之一，虽然不承认工农联盟受到了严重的动摇，但还是提出了维持这一联盟的问题：“农民群众是忠实于与工人阶级的联盟，还是让资产阶级把他们从联盟中分离出来，取决于农业的发展路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与此相一致的是，**谁将指导经济的发展道路——富农还是社会主义国家。**”108

重要的是，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以在农民中开展群众路线，即旨在说服农民相信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来表现的：它不是用政治术语（党和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而是以“经济”术语，以“国家”对经济的指导来表现的。实际上，这种“国家对经济的指导”被认为主要取决于工业的加速发展。党的十六大通过了提交给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数字。**这一计划在未来的工业成果，似乎是**通过扩大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来**转变土地关系的必要条件**，因此，第十六次会议仍然非常谨慎地对待这类农业的推广；109但是，加强工农联盟的**直接性的政治**要求却被忽视了，因为**工业化在事实上被视为加强工农联盟的条件。**

**当时，不惜一切代价优先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被认为是当前的基本任务。**这是由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将在后面得到研究。中包括工业品的短缺（被解释为工业“滞后”于农业的症状）和失业的增加，而快速工业化似乎是唯一的答案。在政治方面，加速工业化被认为是通过增加工人阶级数量以及加强国家的军事潜力（这是工业发展带来的可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

片面地重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导致很少考虑到推迟（直到工业“充分发展”之后）解决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在当时对基本任务的流行的解释框架内，农村情况的恶化非但没有促使党纠正造成这种情况的政治路线，反而导致了**新的强制措施，在实践中，这用在了全体农民身上**；这些措施被认为是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

农村形势恶化的最严重迹象是1929年上半年粮食采购的急剧下降。110

面对这种下降，党和政府试图采取一种新的措施，以便尽可能少地求助于《刑法》第107条，111因为他们在1928年的许多抗议和示威之后曾向农民承诺这么做。其中一项措施采取了“自愿承诺（voluntary undertaking）”的形式，一种由skhod自己“自行制定”要收购的粮食数量的方式。

实际上，skhod（而且它经常被要求做出承诺，而不考虑是否达到法定的出席人数）面临着批准国家机关规定的采购数字的义务。1929年7月，中央委员会做出的一项决定清楚地表明，skhod由此“承诺”交付的数量超出了它们的能力，必须减少。这就暴露了所谓自行制定粮食采购量的虚伪性。事实证明，使用这种方法是农民（包括被这些措施所针对的贫农）不满情绪的新来源，此外，政府还认为这些贫农经过“贫农委员会（poor peasants' committees，注意与komnezamy区分——译注）”协商过了，但这些委员会实际上并不存在，成立后往往就消失了。112

然而，让很大一部分农民和苏联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的最严重的根源是针对农民采取的措施，这些农民没有向采购机关提供规定数量的粮食。这些农民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惩罚。其中一项惩罚是**从合作社中开除，这意味着被开除者不得不在私人市场上购买东西，而那里的价格比合作社商店的高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迫使这些农民也在私人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从而有可能被当作投机分子而受到起诉。**另一种处罚是对没有交付规定粮食数量的农民处以**相当于未交付量五倍的处罚额**，即所谓pyatikratka。原则上，处罚应由skhod决定，但鉴于skhod经常拒绝这样做，处罚实施权被赋予了农村苏维埃——实际上这意味着，把权力给了一个由官员控制、农民没什么影响力的机构。

1929年6月，RSFSR决定，进一步扩大《刑法》第61条的适用性。从今以后，“拒绝履行自愿承诺、一群农户集体拒绝、抵制建立粮食储备计划实施的，将按照本款第三部分[处置]。”

第61条的这一部分规定了最高两年的监禁、没收财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流放的处罚。这样，早已开始作为惩罚手段的流放和监禁就合法了。在1929-1930年的运动中，这些措施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113“硬性税收（hard tax）”也是如此得到使用，它意味着对富农或被视为富农的农民征收粮食税，要求在24小时内缴纳。由于征收的税率经常超过农民的支付能力，他们可能会因为不履行义务而被流放。第61条的实施并不只影响富农，还经常打击到中农。1929年7月，CC做出决定，**禁止国家商店向没有交付规定数量粮食的农民出售“短缺商品”**（火柴、灯油、钉子、纺织品等）。114在地方一级已经实行的一项措施，起初被谴责为不正当的，现在被赋予了法律效力。

地方当局应区别实施各种惩罚措施，也就是说，除特殊情况外，要避免伤害贫农、中农利益。实际上，正如CC谴责地方当局滥用权力的许多决议所表明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党的领导层试图在他们所重申的正确路线和他们承认经常出错的路线的应用之间做出区分。原则上说，如果路线的制定和对地方当局的要求没有导致后者做出许多决定，而这些决定因其阶级后果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这些决定在事后受到谴责），那么这种区分就是合理的。这类决定在1928年和1929年期间变得越来越频繁，以致情况越来越像列宁在1919年3月所描述和谴责的那样，当时他说：“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115

1929年期间，农民对各种强制措施和惩罚措施的抵抗有了发展，并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消极抵抗”的问题（表现为减少播种面积和宰杀一些牛），而是这样或那样的“进攻性”反应。其中一种形式的抵抗意味着集体行动，被称为volynka：某些村庄干脆拒绝向采购机关提供任何东西。这些volynka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据报道，1929年一些地区发生了农民起义（但似乎并没有广泛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发生在格鲁吉亚的山区（在Adzharia）和普斯科夫地区。还发生了富农或受富农影响的农民对采购员的攻击。116

1929年7月初，党的领导层对1928-1929年的收购运动制定了粮食平衡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到那时为止采取的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城镇供应问题，也没有集中起来足够数量的粮食用于出口。从那时起，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总书记办公室，重新提出了集体化的问题。

此前，这个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在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下才能完成的任务。此后，集体化往往被认为是“解决”收购困难和粮产量下降所造成问题的直接手段。

如我们将看到的，117党随后致力于加速集体化的政策，而党和农民群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一政策的实施，证明了工农联盟严重破裂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和畜牧业）出现空前危机的起点。只有通过进一步减少农民的消费才能保证对城镇的食品供应。

注释

1. 请允许我提醒读者，“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一表述是指1921年至1929年这段时间。我已经指出，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实际执行的政策越来越相当于对NEP的原则的否定。因此，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危机（final crisis）”或“总体危机”的说法，其实并不真正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危机，而是1928年和1929年特有的矛盾的发展。
2. *Narodnoye khozyaistvo 1961 g*., p. 27.
3. *Sdvigi v selskom khozyaistve SSSR*, p. 14.
4. 对于这一发展的数字可见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Table 185, p. 310.
5. Ibid., p. 311.
6. *Report of the 15th Congress of the CPSU*.,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28, p. 362.
7. See volume I of the present book, pp. 235 ff.
8. See above, p. 92.
9. 《列全》39卷，《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10. S. G. Strumilin, “Rassloeniye sovyetskoy derevni,” in Planovoye Khozyaistvo, no. 3 (1928), p. 56,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Grosskopf’s book, 对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的详细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应该查阅这本书。 Strumilin’s article is available in French 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no. 85 (no. 4 of 1975), pp. 120 ff.
11. 说这些数字是近似的主要是由于为这些统计数字提供依据的大多数调查人员本身并不是农民，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准确掌握不同形式的真实情况。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来源的资料对农民的社会分类与Strumilin的非常相似，而这些资料来源采用了与他相同的分类标准(see Strumilin’s article 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no. 85 [no. 4 of 1975], p. 149, and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tables on pp. 309–310). 还应注意的是，不能被指责为“亲富农”的Strumilin认为，富农的农场比其他农场受到了更严格的检查，因此他们的收入也更清楚(*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p. 130).
12.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142–144.
13. [See above, pp. 95](#_bookmark49) ff.
14. 正如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全》，3卷）中所表明的那样，并不能根据农场所包含土地面积的数字对农民的财富得出任何结论。在革命之前是正确的东西，在NEP下更正确了。当时，由于缺乏工具、机器和马匹，贫农和中农所拥有的土地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被他们耕种（一些数字见上文）。
15. L. Kamenev, *Nashi dostizheniya, trudnosti i perspektivy*, p. 9. See also L. Kamenev, *Stati i rechi*, vol. XII (Moscow, 1926), pp. 347–371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138– 140).
16. Ya. A. Yakovlev, *Oboshibkakh khlebofurazhnogo balansa TsSU i ego istolkovatelei*,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142.
17. Ya. A. Yakovlev, *Oboshibkakh khlebofurazhnogo balansa TsSU i ego istolkovatelei*,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142.
18. 《斯全》11卷，“在粮食战线上”。百分数由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涅姆契诺夫（Nemchinov）提供。
19. 富农在skhod中的特殊影响及其对“土地公社（land commune）”的依附受到了质疑：see D. J. Male, *Russian Peasant Organisation Before Collectivization*, pp. 162 ff.
20.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137 ff.
21. 见“粮食收购、其波动和工农联盟的状况”与“收购的进展，然后是危机”之间的部分
22. 同上
23. G. Pistrak, “Zernovoye khozyaistovo i khlebniy rynok S.S.S.R. vosstanovitelnogo perioda,” in *Sotsialistichestoye Khozyaistvo*, no. 5-6 (1927), p. 256. Also Ya. A. Yakovlev, ed., *K Doprosu o sotsialisticheskom pereustroistve selskogo khozyaistva*, pp. 98–103, 153–155,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331 ff.
24. 这一点从后来实施非常措施的方式得到了证实。**他们只有通过从中农，有时是贫农的储备中进行大规模征收，才有可能获得所需的粮食数量。**党的领导层不止一次地承认了这一事实——见上文，“非常措施”及其直接后果”。
25. V. Milyutin, “Uroki khlebozagotovok,” in *Na Agrarnom Fronte*, no. 4 (1928), p. vi, and A. Lvov, “Itogi khlebozagotovitelnoy kampanii 1927–1928 g.,” in ibid., no. 9 (1928), pp. 65–66;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33.
26. 在这方面，虽然在NEP下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列宁在1921年5月（《列全》41卷）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说的那句话对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有效：在没有足够的工业产品供应给农民的情况下，只有征粮食税才能确保粮食的供应足以满足城镇、工业和出口的需要。大多数农民都太穷了，他们自身对粮食的消费需求都难以满足，更没有能力出售农产品来囤积，或投资，比如通过贷款。（这里应该说的是《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内容——译注）
27.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32.
28. 应当记得，在1918年夏秋之交，布尔什维克党从原则上支持了贫农的运动和组织（见第一卷）。无论这场运动（在内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有什么弱点，重要的是，在1921-1927年期间，党没有对贫农的各种主动性给予系统的支持。
29. 1926-1927年，贫农的人均年收入（即每个家庭成员）估计为78.6卢布，中农为113.3卢布，富农为239.9卢布。农业工人的收入估计为108.2卢布，工业工人的收入为334.6卢布（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211）。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只是估计，卢布的“购买力”在不同的地点、地区有很大差异。
30. See volume I of the present work, p. 239.
31.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239–246
32. Ibid., p. 177.
33. [See below, p. 142.](#_bookmark79)
34. Yakovlev, ed., *K voprosu*, p. 59,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08.
35. N. Rosnitsky, *Litso derevni*, pp. 28–29,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308–309.
36. Yakovlev, ed., *K voprosu*, pp. 56–57.
37. 《列全》36卷，《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1919.3
38. 《列全》41卷，《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1921.4.9
39. 同上
40. Report of the 15th Congress, p. 376.
41. Grosskopf 引用了许多关于这些形式的协会和互助的发展的事实 (*L’Alliance ouvrière*, pp. 311–315).
42. Ibid., pp. 311–312
43. Report of the 15th Congress, pp. 368-369.
44. On these points see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390–395.
45. Ibid., pp. 311 ff., 415 ff.
46. [See above, pp. 121 ff.](#_bookmark57)
47. [See above., p. 97.](#_bookmark50)
48.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art 2, p. 977, and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Table 141, p. 244.
49. [See above, pp. 106–107.](#_bookmark54)
50. Report of the 15th Congress, p. 368.
51. 这里提到的问题需要给予很大的重视。事实上，正是由于低估了贫农和中农的农场在过去几年里所拥有的潜力，才促使苏维埃政府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集体化，并把这种集体化看作是摆脱所谓不诉诸土地结构的临时革命而在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仍然增长——这一可能性已经耗尽的情况的唯一途径。应该指出，在1928年的条件下，“农业增长的可能性已经耗尽”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明确的肯定（见1928年7月10日CC全会通过的决议，载于*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第2卷，第391页及以下），而且苏联现在仍在为它辩护。Chapters IX and X of V. Yakovtsevsky, *Agrarnye otnosheniya v periode stroitelstva sotsializma*. A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se chapters appeared 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no. 85 (no. 4 of 1975), pp. 55 ff. On the theses of the “exhaustion” of NEP agriculture and the urgent “economic necessity” of collectivization, see pp. 56–59.
52.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238 ff., 377.
53. I. B. Messner, “Predposylki planovogo razvitiya mekhanizatsii selskogo khozyaistva,” in *Planovoye Khozyaistvo*, no. 8 (1927), p. 54.
54. M. P. Oganovsky, “Maksimalny variant perspektivnogo plana rekonstruktsii selskogo khozyaistva,” in *Planovoye Khozyaistvo*, no. 7 (1927), p. 37,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77.
55. 下文将解释“净余额”的概念。
56.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113, 122.
57. Osvok的预测引自同上，第351页。耕地面积、产量和市场销售占有率都是根据同一来源计算的。实际上，产量的增加通常伴随着市场占有率的增加。
58. Report of the 15th Congress, p. 376.
59. Ibid., p. 365.
60. 见本书第一卷, p. 487 ff., especially p. 488. 关于这点也可见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156– 159.
61. Report of the 15th Congress, p. 372.
62.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I, pp. 666–667, 851.
63. 见《列全》41卷，《论粮食税》（1921.4.21）
64. Yakovlev, ed., *K voprosu*, pp. 175, 184, 255, 284.
65. Ibid., pp. 212–213, 222–224, 236, 256, and the remarks of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292–295.
66. Yakovlev, ed., *K voprosu*, pp. 59, 236–237; Rosnitsky, *Litso derevni*, pp. 70–74; N. Baryshev, “Novye zavoyenvaniya derevenskoy bednoty,” in *Na Agrarnom Fronte*, no. 9 (1928), p. 75.
67.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p. 186.
68. A. Mendelson, ed., *Pokazateli konyunkturi narodnogo khozyaistva SSSR za 1923–1924–1928–1929 gg*., p. 51.
69. Ibid.
70. *Planovoye Khozyaistvo*, no. 5 (1929), pp. 61-65; and no. 10, p. 94.
71. A. Nove, *Economic History*, p. 186.
72. M. Lewin, “Taking Grain: Soviet Policies of Agricultural Procurement before the War,” in C. Abramsky and Beryl G. Williams, eds., *Essays in Honour of E. H. Carr*.
73. 根据Gosplan在1929年和1931年发表的估计，农业生产指数（1927-1928年为100）在1926-1927年达到最高点（按当年价格计算为101.1），1930年下降到90.3（Zaleski, *Planning*, p. 387）。根据*Narodnoye Khozyaistvo 1958 g*., p. 350，农业生产在1933年触底（当时比1928年低18.5%）。然而，发表在*Sotsialisticheskoye stroitelstvo SSSR* (1936) 第232-233页上的Gosplan估计，以及Zaleski的计算(*Planning*) ，显示农业生产的最低水平是在1932年达到的，比1926-1927年低15.6%。NEP的农业生产水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才被经常性的超越（对于畜牧业产品，直到1953年才被超越）。见*Narodnoye Khozyaistvo 1958 g.*, p. 350.
74. 这个净余额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低于采购量，特别是当采购的部分粮食必须返还给粮食不足的村庄或农业地区时。不能把它与粮食收获后的销售总额混为一谈，因为这个数字包括在村子里的销售。关于农业净“剩余”的问题将在后面讨论（见下文第157页）。
75. See the figures given in *Materialy osobogo soveshchaniya po vosproizvodstvu osnovnogo kapitala pri prezidiume V.S.N.Kh., seriya III, vypusk II: perspektivy razvitiya selskogo khozyaistva*, p. 86,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46.
76. 1913年至1926-1927年间，农村人口从1.146亿增加到1.207亿，增长了5.3% (*Narodnoye Khozyaistvo 1958 g.*, p. 9).
77. A. E. Lositsky, “Perspektivy potrebleniya prodovolstvennykh produktov v Soyuze,” in *Planovoye Khozyaistvo*, no. 4 (1927), pp. 89–90,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170, 174.
78. 根据注15中的来源计算。
79. 根据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 p. 351中的数字计算。
80. *Kontrolnye tsifry 1929–1930 gg*., p. 538.
81. 《斯全》11卷，《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
82. K. Bryukhanov, “Itogi khlebnoy kampanii 1928–1929g.,” in *Ekonomicheskoye Obozreniye*, XI, p. 134,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37.
83. Ibid. See also O. Narkiewicz, “Sovie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rain Crisis of 1927–1928,” in *Soviet Studies* (October 1968), pp. 237 ff.
84. 与战前相比，出口的减少是由于群众的消费水平提高了。
85. *Narodnoye Khozyaistvo* (1932), p. xlviii.
86. Mikoyan, in *Bolshevik*, no. 15 (1928), p. 16.
87. 按现行价格计算的价值
88. P. G. Timofeyev, *Ekonomicheskaya geograf ya SSSR*, p. 263,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40.
89. 《斯全》11卷，《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Ibid., vol. 11, p. 19 91. Ibid, vol. 11, p. 215.

1. *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vol 2，395页.
2. 《斯全》11卷，《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
3. *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vol 2，395页，（“ПЛЕНУМ ЦК ВКП(б) 4—12 июля 1928 г.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俄语原文：“Эт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вызвали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среди некоторых слоев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выразившееся в выступлениях протеста против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произвола в ряде районов…”——译注）
4. 党内斗争将在第四部分讨论。
5. 《斯全》12卷，《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6. Wolf in Planovoye Khozyaistvo, no. 2 (1929), pp. 99-100; and Vishnesky in *Na Agrarnom Fronte*, no. 10 (1928).
7. 1928年至1929年，牛的数量减少了近170万头，为6800万头，猪的数量减少了近500万头，不到2100万头(Kontrolnye tsifry 1929–1930 gg., pp. 530 531).
8. 《斯全》，12卷，《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9. “Obshchiye nachala zemlepolzovaniya i zemleustroistva,” in *Kollektivizatsiya Sotsialisticheskogo Khozyaistva*, doc. no. 20; quoted in Lewin, *Russian Peasants*, p. 283
10. See volume I of the present work, pp. 235 ff.
11. 《斯全》，8卷，《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12. 列宁写道：“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列全》43卷，《给代表大会的信》，有关这点见本书第一卷）
13. Lewin, *Russian Peasants*, pp. 284, 372 ff.
14. Ibid., pp. 285–286. Lewin quotes from *Bolshevik*, no. 19 (1928), pp. 20, 26.
15. Ibid., p. 287.
16. Pravda, January 26, 1929; Na Agrarnom Fronte, no. 7 (1929). See also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t. 1, pp. 258–259.
17. 这种不信任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在危机发生前的不同时期，斯大林的某些声明中也表达了这一点。
18. *Shestnadtsataya Konferentsiya VKP*(*b*) (1962), p. 320, quoted in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t. 1, pp. 256–257.
19.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p. 456–457.
20. See below, pp. 455 ff.
21. See above, pp. 109 ff.
22. See above, p. 38.
23. A. L. Angarov, *Klassovaya borba v sovetskoy derevne*, pp. 20 ff., and Lewin, Russian Peasants, pp. 390 ff.
24. Lewin, Russian Peasants, pp. 389–390; The Penal Code of the R.S.F.S.R. (text of 1926, with amendments up to December 1, 1932).
25. *Kollektivizatsiya Sotsialistcheskogo Khozyaistva*, doc. no. 49.
26. 《列全》36卷，《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
27. Lewin, *Russian Peasants*, p. 393.
28. See below, p. 458.

## 2. 新经济政策期间制约农业生产关系再生产与转变的经济社会条件

一旦“战时共产主义”被放弃，农业生产的大部分转变为商品，再加上农民需要在市场上购买几乎所有的工具和他们所需的大部分消费品，这就会造成农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品流通的条件。

因此，在新经济政策下，面向市场的生产体系和对农村地区的商品供应，市场生产制度和农村商品供给制度，特别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相对水平，对农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影响了生产结构，带来了一系列**阶级后果**，不同程度地削弱或加强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和各类生产者的地位。面向市场生产的制度、销售制度和采购制度，连同工农业产品价格，构成了社会关系的总体，这一整体的特点和变化受制于整个阶级斗争的总体影响，特别是受制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实施这一路线的方式。这条路线是以“价格政策”和“计划”的形式来实现的。在这些平面上，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各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必须分析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条件，以及向农民供应工业品的条件。

### 2.1 初步评价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在交换条件方面带来的变化，对工农联盟的具体实践和这种实践对不同阶级的差异效应，特别是对贫农、中农、富农之间关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分析交换的社会条件，也意味着揭示交换过程中各种因素（agents）所参与的经济实践的特点，以及它们所受到的限制。这些限制因素本身与阶级关系和实践的整体性相联系。无论它们是“由市场行使（exercised by the market）”的约束，还是“监管（regulatory）”的约束，它们总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维度，而这通常起着主导作用。意识形态关系以一种不总是直接“可见”的方式使交换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影响，包括那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的斗争。

#### 对买卖的“限制”

我们稍后将具体地看到这些不同的限制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说明这意味着什么，也许应该给出一些提示。例如，读者可能记得，NEP的大部分时期里，大多数贫农和中农参与交换的程度，以及他们参与交换的方式，是由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制约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制约因素使他们不得不迅速出售大部分要卖的产品，从而其价格比富农在几个月后能够获得的价格要低很多。这样，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所受的限制——这也构成了“市场价格信息”的因素之一——不仅是由于他们所要缴纳的赋税和负担的债务（偿还从富农那获得的贷款），而且也由于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

一方面，在NEP开始时，没有任何强迫机制能够迫使贫农和中农作为一个整体来缴纳税款和偿还债务，最重要地，使他们尽快这么做。当时农民群众所受的“约束”，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上的；它是由农民所融入的意识形态关系构成的，这些关系使他们把迅速履行纳税和还债义务视为一种责任，并禁止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来逃避债权人与财政当局的紧急情况。另一方面，这些同样的意识形态关系——在这方面与革命前农民大众所受的意识形态关系有着深刻的不同——鼓励他们增产以卖给市场，以便更好地装备其农场，甚至卖掉那部分满足他们“生理需求”的农产品。列宁在1922年秋天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俄国小农占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现在尽心竭力地投身于生产，并且获得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部分原因是他们得到了国家在种子等方面的支援），如果考虑到国内战争、饥荒等等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破坏，那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小农获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因而非常容易地、几乎毫不勉强地就交纳了国家上亿普特的粮食税。1**

农民群众在NEP时期所融入的意识形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参与交换的方式，其性质极为复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NEP开始时，这种意识形态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群众对苏联政府帮助和改善他们命运之意愿的信心。这种信心说明，农民群众虽然贫穷，但却“轻松”地交足了税，而且他们很快就卖掉了自己的部分产品，以履行这种义务。同样的信心，再加上他们对改善自己命运所需的想法，也促使他们卖掉那些对自己的消费来说可能是“必需的”东西，以便能够购买新的生产资料。2事实上，“最穷的农民卖掉……他们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与其说是迫于税收压力，不如说是为了获得工业制成品。”3这是一种“销售限制”，它来自阶级意识形态关系，特别是来自刺激贫农、中农不再继续受命运摆布，而是通过**装备**和在较小程度上的自我**组织**来摆脱富农统治的那些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农业活力的客观基础之一。4这也是农民参与交换的形式之一，这些形式对实际的交换条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和这些价格的波动方面。这些价格也与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关系决定了生产条件（生产什么，以及这种生产的劳动成本）和交换条件。

在NEP的末期，特别是从1928年开始，影响农产品“销售限制”的制度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农村中的强迫机制得到了加强。它以真正的方式进行干预，首先是为了确保税收，然后是为了确保在“计划合同（planned contracts）”（我之后将说明这一点）或“非常措施”制度下所要求的交付量。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经常出现的工业品短缺，使贫农和中农对出售他们的产品变得更加犹豫不决，因为他们不确定能否买到生产资料和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品。因此，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不同阶层的农民当时所处的思想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才能对1928年和1929年的收购危机进行分析。

#### “价格政策”的阶级效应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新经济政策期间，价格部分是“自由”的，部分是“行政管理制定（fixed administratively）”的。实际上，即使是“自由”的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采取的措施——国家的采购和销售规模，以及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水平。因此，影响农业再生产条件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苏维埃政府采取的总体政策的结果。因而，这种政策产生了**阶级效应：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特别地，与这种斗争在国家机器和执政党层面的发展有关。

“价格政策”的**实际**阶级效应可能与党领导层的**预期**大不相同。这一认识对于NEP时期尤其重要，因为期间支配着（governing）交换的社会条件的阶级效应往往与预期或旨在实现的效果不同。对交换的社会条件的分析必须努力发现这些差异的**原因**。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些差异是由执政党与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之间薄弱的联系造成的。它们也是党的理论分析薄弱造成的，它们本身就是**由于意识形态而造成的误解**（*misunderstanding due to ideology*）的结果，因而也是对阶级意识形态关系误解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研究一下城乡关系的发展方式，以及这一发展所助长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在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危机中达到了顶峰。

### 2.2 农产品向货币的转化

对农产品交换的总体演变和这种交换之条件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看到交换条件对阶级关系和NEP的最终危机所产生的影响。

#### 农产品交换的总体演变以及这种交换的经济社会意义

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式相比，农产品交换的发展方式显示了农民农场与市场的联系程度——这些农场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向与苏联、甚至世界市场相联系的经济转变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联系迅速发展。甚至到1923-1924年，这种联系也比革命前时期有所增加。这一事实驳斥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即土地革命通过增加小农场，导致了自给自足农业的增长。

在1923-1924年，农业生产的总销售份额已经比战前增加了25%，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进展还在继续。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粮食方面，1924-1925年的总销售份额达到了36.1%，而1913年为32%。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区，贫农农场生产的粮食的总销量份额高于较富农民或富农的农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特别是粮食价格的波动，以及销售形式对农民中不太富裕的部分是如此重要。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农业生产7的净销售份额比总销售份额增加得更慢。因此，在1924-1925年，农产品的净销售量（相当于所谓的“农业余额（agricultural balance）”）在绝对数字上比战前少46.6%。8**从整体上看，农业余额的增长往往比农业总产量的增长快一点**；但在粮食方面却不是这样（粮食价格的变化对农民不是很有利），这一事实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后果，并促成了NEP的最终危机。9

#### 农产品交换的参与者

如果我们要理解在NEP时期结束时爆发的一些矛盾，就必须对交换的主要直接参与者进行研究。

新经济政策下农产品交换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出售这些产品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贫农和中农，他们不得不在以后（在同一农业年度中）或多或少地购买他们自己以前出售的农产品。**由于他们通常不得不以高于他们出售时的价格进行购买，这些操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实际收入的损失**。由于他们需要在收获后尽快获得资金，以便偿还债务，购买不可或缺的制成品，并支付税款，所以这种操作是被迫的。他们后来购买的产品与他们自己以前出售的产品相似，往往是通过**辅助性活动或承担新债务**获得的资金来实现的。在NEP初期，大约五分之一的小麦是由农民以这种方式销售的，他们后来不得不购买小麦，以满足他们作为消费者的需求。

那些直接购买农产品的人和他们支付的价格也非常不同。一部分购买者是农民自己：一些人购买农产品是为了自己消费，而另一些人（主要是富农）购买农产品是为了以后高价出售。10

农产品的**非农民**购买者是私商、国家与合作社组织，以及到农民市场购买的个人。1924-1925年，这些购买者群体分别吸收了市场产品中这一部分的28%、37.1%和34.9%。11在随后的几年中，私商所占的份额迅速下降。

在整个NEP时期，苏维埃政府努力地发展国家与合作社收购机关的活动，特别是确保尽可能定期地向城镇、军队、工业和外贸提供供应，并减少消费者价格的波动。这些机关的操作主要是根据采购计划进行的，这些计划的实现构成了所谓的农产品“计划采购”（尽管国家与合作社机关的一些采购事实上可能不是“计划”的）。

### 2.3 对农民的工业品供应

向农民提供工业品，在农业生产的物质与社会条件再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农民必须能以一个与出售自己农产品时所得的价格相匹配的价格来获得他们所需的物品，以为其农场提供生产资料，并填补农产品不能满足的那部分消费。这样实现的流通还必须确保现金的起伏之间有一定的平衡。为此，必需使乡村居民的现金净收入，在以现金支付的税款得到清偿和农民愿意储蓄的资金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每年都能兑换成城镇的商品。

在这方面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确保农村工业品的供应令人满意。

在NEP时期，这种供应可能有不同来源。它可以由私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提供，也可以来自城镇或农村本身。事实上，当时农村手工业占了私营工业的很大一部分。它们的存在给国有部门带来了困难。一方面，它们使农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在没有城镇的情况下生存，而城镇没有农村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农村手工业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价格，限制了国有工业销售自己产品的价格上限——除非它设法控制对农村工业的供应，以便将来自后者的竞争控制在严格的范围内。

#### 私人工业和农村手工业

NEP开始时采取的措施使农村手工业的活动有可能得到较大规模的恢复。这些手工业（在1930年代注定要消失）对农民非常重要。它们提供了农民消费的大部分制成品：工具、建筑材料、消费品（纺织品、服装、陶器、鞋类、罐头食品等）。此外，**它们还保证了大量贫农和中农不会对他们的收入感到不满，这些人把一部分时间花在手工业上，并且通过在城镇销售手工业产品，它们是农村部门现金收入的一个来源。**

在NEP末期，“小规模工业”雇用了440万人，约占产业工人总数的60%。这些工人中有近360万人属于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单位，12**其中90%的人也是农民**。1926年，这些农村手工业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被组织在官方承认的合作社中。另有大约十分之一被组织在“非官方”合作社组织中。其余的是“独立的”的手工业者。实际上，那些不为当地客户工作而为远方市场工作的工匠，在这一时期，往往依赖于私商——“耐普曼”。苏联经济学家拉林估计，1927年，手工业者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或多或少地被私人资本所控制，13这些资本要么当场买下手工业者的部分产品，然后在其他地方出售，要么把原材料卖给手艺人。虽然拉林的估计无疑是夸大了，但被归类为农村手工业者的一部分人实际上是依赖私人资本的，这一点仍然是事实。这一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商业机关运作不良的结果**。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原则上是支持农村手工业的，它希望引导农村手工业越来越多地走上合作的道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通过的决议规定了制定五年计划的指令，仍然强调手工业者应发挥的作用。决议指出，必须发展手工业，使其成为**大工业的必要补充，以及消除商品短缺和减少失业的手段**。

这种原则上有利于手工业——特别是农村手工业——的方针一直持续到1929年底。那一年，人们仍然强调，在一些工业部门中，**手工业能产出大量商品，同时需要比大规模工业少得多的投资**。14因此，对于鞋类的生产，获得同样产量的手工业只需要十分之一的投资。实际上，手工业受到了大型国有工业领导人越来越多的敌视：后者看到手工业者在市场、[原料]供应和信贷方面有如此多的竞争对手，他们经常想方设法确保国家商业机关对手工业者的[原料]供应保持在最低水平。

1929年是“大转变之年”，也是手工业和乡村工业衰落的一年。此后，物质和财力被最大限度的集中在大规模工业上，这也耗尽了手工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迅速衰落给乡村生活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影响了商品的供应和乡下人的收入。

然而，直到新经济政策结束时，农村手工业的存在，农村手工业的存在，更广泛地说，小规模私营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支配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个方面与1928年以来的政策越来越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将在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危机中表现出来。15

#### 农村地区工业品的零售贸易

农村地区的工业品不仅由农村手工业者提供，而且还由国家与合作社贸易以及私人贸易提供。直到1926-1927年，私人贸易的营业额相对下降，但按绝对值计算仍在增长。1928年，一些商店和摊位关闭，许多小贩执照被取消，使其绝对值和相对值都有所下降。16在农村地区，这种下降远远没有被国家与合作社部门增长的销售量所抵消。17

总之，1928年，国家与合作社贸易在农村的发展远不如在城镇的好。官方零售贸易网络在农村的营业额不到其总量的34%，尽管80%以上的苏联人口生活在农村。18

因此，在NEP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在这一时期的末期，在更大程度上），农民在获得城市工业品的机会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此外，必需主要从私商那里获得供给也降低了农民的“购买力”。虽然私商有时为他们购买的农产品付出高于“官方”机构支付的价格，但他们出售工业品的价格却比国家与合作社供应商的价格高得多。1927年，私人贸易领域的棉花产品价格比国家机关的价格高出19%以上。盐的差价达到近57%，煤油的差价为14%，钉子的差价为23%。19农民向私商支付如此高的价格，自然是因为国家与合作社网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从1928年起，许多私人商店的关闭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状况，因为工业品日益短缺，而且官方贸易网络没有能力迅速取代被淘汰的私商的位置。1928年11月，一份苏联的经济杂志描述了这种情况，指出工业品的短缺甚至比农产品的短缺还要严重：

排队的人非常多……需求是巨大的，供应量不到20-30%……皮革制品和鞋类的情况也是如此……没有屋顶用的铁瓦……纺织品市场十分紧张。农民们到城里去买东西，排着队……农民们拿出收据，确认交付过50至500普特的粮食；他们每个人都想购买价值100至200卢布的工业品，但他们得到的只值20卢布……20

从1928年开始，贸易网络的混乱和当时被称为“商品荒”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收购危机，进而导致了NEP的最终危机。

### 2.4 制定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条件，以及“剪刀差”问题

在影响农业再生产的变化中，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的相对运动是一个重要因素。

“剪刀差”问题21在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中所发挥的作用，促使我们研究国家在农产品价格的制定过程中，是否进行干预的方式。

#### 制定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条件

在新NEP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原则上是“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农民没有“法律义务”按照苏联政府单方面制定的价格向采购机关交出自己的部分产品。事实上，制定采购机关所支付的采购价格的条件是有很大差别的。

一般说来，**就用于工业加工的主要农产品**（棉花、亚麻、甜菜等）**而言，国家机关几乎是唯一的购买者。**因此，这些机关在购买这些产品方面具有某种垄断地位。22这种情况使他们能够以对其特别有利的价格购买。然而，**当时的农业政策是以发展技术作物为目标的**，因此对技术作物规定了相对较高的收购价格，以鼓励它们的发展，这一程序确实导致了技术作物产量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地区，这被证明主要对富农有利，因为他们最有条件种植这些作物。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官方贸易组织制定价格的条件有很大的不同。起初，他们被授权就购买农产品的价格进行“自由”谈判。然而，这些价格必须在中央贸易机关确定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后者每年都会改变其价格，并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调整。后来，这种制度逐渐被国家机关和农民在“运动”（指收购运动——译注）开始时**谈判的合同制度（kontraktatsiya）**所取代。这些合同成为国家机关采购计划中的要素。它们规定了农民要提供的数量、价格、质量、交货日期等等。作为回报，国家机关承诺给予某些贷款，并确保对某些生产资料的供应。在这些条件下购买的价格被称为“公议价格（convention prices）”，因为它们原则上是农民和国家机关之间“谈判”出来的。但是，后者必须从贸易人民委员部（Narkomtorg）每年为各种产品和地区制定的“基础价格（basic price）”23入手。实际支付的“公议价格”可能比“基础价格”高或低5%至10%。 对于粮食以外的产品，“基础价格”通常被固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以便不影响生产，并防止这些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进入手工业部门（这尤其适用于羊毛和兽皮）。

收购机关不仅要完成它们的数量计划，而且还要以有利于**保持价格尽可能稳定**的方式运作。这一任务在粮食方面尤其重要，因为粮食价格对**生活费用**和**实际工资**水平有很大影响。在NEP的最后几年里，这项任务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优先权，为收购的粮食支付的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24

这种趋势的发展破坏了工农联盟。它的危害性更大，因为首先是贫农和中农受到了收购机关强加的低价的影响：实际上，一般来说，农民中最不富裕的人已经在秋天把他们拿到市场上卖的大部分农产品直接卖给了国家机关。

这种价格政策的总体效果不仅不利于工农联盟的稳固性，而且也不利于粮食生产。再加上工业品对农村地区的供应不足，这就促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危机的爆发。

“农业价格政策”陷入的矛盾反映在国家机关对购买各种产品进行价格制定的条件之频繁变化上，以及对跟收购机关竞争的私商的对待方式上。

对于大多数农产品，国家机关开始时主要制定“公议”25或“谈判”（soglasitelnye）价格，这些价格相当直接地考虑了私营部门的现行价格。后来，他们主要制定“固定（firm）”（tvyordy）价格，这些价格低于私营部门的价格。这些“固定”价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试图降低这些价格，特别是1926-1927年的粮食价格。26

随后，政府决定对采购价格进行部分上调。然而，这些调整是有限的，因此，“市场”价格（增长迅速）和采购价格（此外，它还落后于生产成本的上涨）之间的**差距始终在扩大**。27这是造成收购困难增加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引发NEP最终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法更好地组织收购并减少与之相关的开支，苏维埃政府被迫——为了尽可能地稳定它向城镇供应的价格，并且所掌握的粮食数量不会出现灾难性的萎缩——越来越多地限制所有私人粮食贸易，并最终将其完全取消。伴随着这一举措，合同制度（kontraktatsiya）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粮食收购。

在NEP的最后几年里，苏维埃政府使这些“合同”在实践中具有强制性。这意味着，它们不再只是名义上的“合同”。28事实上，此后，农民必须交付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强迫交付**。NEP，本应让农民自行处理他们不需要用于维持自己生活的，或作为农业税上缴的那部分产量，现在它实际上被放弃了，而且现在的情况正会导致农民想逃避的那些限制措施。因此，这些措施不但没能孤立富农，反而有助于确保越来越多的农民倾向于联合起来，以抵抗被他们认为是征收的措施。

注释

#### 农业和工业价格之间的“剪刀差”

布尔什维克党在农业价格相对于工业价格的演变问题上所遵循的政策原则上旨在降低工业品价格并“合上剪刀”。29如果要巩固工农联盟，如果要在农业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发展农业，这种政策是必要的。审慎地运用这一政策，可以使贫农和中农在党的帮助下，更好地装备自己的农场，并把自己组织起来。下面的数字表明，这一政策在1923年（这一年剪刀大开，有利于工业品价格）30到1928年之间似乎取得了相当积极的成果：

**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零售价格之比**31

1913 100.0

|  |  |  |  |  |
| --- | --- | --- | --- | --- |
| 1923–24 |  | 33.7 | 1927–1928 | 79.0 |
| 1925–1926 |  | 71.8 | 1928–1929 | 90.3 |
| 1926–1927 |  | 71.1 | 1929–1930 | 76.9 |

这些数字激起了以下评论：

1. 1923-1924年，农产品的“购买力”已降至战前的三分之一左右。
2. 1927-1928年农产品的“购买力”大约是1923-1924年的2.3倍。
3. 在 1928-1929 年期间，同样的进展似乎仍在继续，当时的比值只比战前低10%。
4. 1929-1930年形势急剧逆转，指数跌破1927-1928年的水平。对这一情况需要做一些修正：
5. 贫农和中农状况的演变，不能仅从这些数字来判断。由于他们拥有更多的土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享有的状况肯定比战前要好。1923年后，他们通过增加自己拥有的土地比例，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状况。
6. 在粮食生产固然重要的情况下，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特别受到了收购机关（贫农生产的粮食的主要买家）的粮食购买价格与工业品零售价格之间演变的不利影响。这一演变的过程如下：

**国家收购的粮食价格与工业品零售价格之比**32

|  |  |  |  |
| --- | --- | --- | --- |
| 1913 33 | 100.0 |  |  |
| 1923–1924 | 29.1 | 1927–1928 | 65.2 |
| 1925–1926 | 68.7 | 1928–1929 | 76.1 |
| 1926–1927 | 56.6 | 1929–1930 | 76.9 34 |

1. 那些不得不从私商那里购买的农民感受到了工业品价格高涨的严重不利影响，因为后者的价格特别高。如此，1927年12月，在“官方”（国家和合作社）部门，工业品的零售价格比1913年的水平高出88%，但在私人部门则高出140%。35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相对价格水平，下面是1927年农民以收购机关支付100英担（hundredweight）**黑麦**的价格换来的各类产品的数量：36

**1927年获得的数量**

合作社部门 私营部门 1913年

|  |  |  |  |
| --- | --- | --- | --- |
| 纺织品（米） | 12.99 | 10.91 | 23.72 |
| 糖（千克） | 7.65 | 7.45 | 14.60 |
| 煤油（千克） | 44.25 | 38.75 | 41.53 |
| 盐（千克） | 135.5 | 86.5 | 165.8 |
| 钉子（千克） | 16.90 | 13.77 | 24.36 |

1. 从1928年起，仅仅考虑农业和工业价格的演变是不够的。仅仅局限于此，就意味着对农民的状况做了错误的“美化”。事实上，由于当时盛行的“商品荒”，特别是在农村，从那时起，农民的大部分现金收入实际上已经不能用来交换工业产品了。37这种情况在1925-1926年的冬天就已经发生过了，对最贫穷的农民和那些拥有最差设备的农民严重不利，因为他们无法改善自己的设备，所以仍然依赖富农。

总而言之，到1927年为止，合上剪刀差的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此后，出现了与“收购危机”平行的“滑坡”，这也是前者的部分成因。这种“滑坡”是1926-1927年以后在工业政策方向上所犯下错误的结果，涉及到了当时生产和投资的方面。它表明，在当时所处的具体条件下，苏联政府并不拥有它以为自己拥有的“价格控制权”。对这一事实的突然对抗，加上对NEP不利的观念越来越占优势，导致了“非常措施”的发展，加深了危机现象，以及最后完全而毫无准备地放弃了新经济政策。

### 2.5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积累问题和农民消费的演变

前面的分析表明，所谓“完全放弃新经济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在1929年放弃NEP的剩余部分。实际上，在1929年以前，“真正的新经济政策”是由各种相互矛盾的措施组成的，其中一些措施符合列宁的NEP概念，而另一些则不符合——这是一种“NEP”和“非NEP”的结合。实际上，从1925年开始，“非NEP”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到1929年底，它成为了主导。

然而，从1922年到1927年，NEP济的一些基本原则得到了尊重，特别是没有对农民群众施加限制措施、征收以现金支付的固定农业税以及努力“合上剪刀”。

#### 积累的问题和对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日趋放弃

1925年，由于需要大规模地积累以确保经济的重新装备而产生的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对这些问题产生的设想，致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与新经济政策相矛盾的措施，危及到了对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这种改善是是新经济政策作为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之一，旨在帮助缩小工农生活条件之间的差距。

1925年期间采取的某些措施涉及将“NEP的真实情况（as it really was）”转变为某种通往私人资本主义的道路的风险。这些措施是1925年4月23日至30日召开的CC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的结果。38这些措施主要涉及扩大土地租赁权和扩大农业中的工资关系。

关于第一点，决议批准农民更广泛地使用土地租赁权。在某些情况下，租赁合同可达12年。39如此，决议确认了VTsIK主席团于1925年4月21日做出的一项决定，对1922年的《土地法》第二十八条进行了“更加灵活”的修改。此后，批准租赁土地的情况越来越多，以至于这种做法可能变得相对平常，而1922年的法典只允许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40

关于第二点，CC的决议批准了苏维埃政府1925年4月18日通过的一项法令，取消了对农民雇佣雇工劳动的几乎所有限制。41

这些规定在随后的几年中仍然有效，但从1928年开始，这些规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租赁土地或雇用工资工人意味着将自己定义为富农，从而有招致“非常措施”的特殊危险。

不过，在1925年至1928年期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富农和较富裕农民的地位，并增加了他们的积累——此外，这也是目的之一，在通过上述决议的前夕所作的一些声明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1925年4月17日布哈林的演讲中可以找到有关这方面最清楚的一段，他说：

富裕的上层农民——富农和部分中农——**目前害怕积累**。这种担心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我们在农村的实际情况至今仍然如此，即如果一个农民想盖一个铁屋顶，那第二天就会宣布他是富农，于是，他就完蛋了。如果一个农民购买一台机器，那也“不要让共产党看见”。农业的技术改进工作似乎是秘密进行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农村的各阶层，那我们就会看到，富农对我们阻挠他们**积累**表示不满。另一方面，贫农有时埋怨我们**阻挠他们**（贝特兰强调，无此注解的黑体为引用源强调——译注）去给这个富农当雇工。

我们农村政策的发展趋势应当是，**要放宽妨碍富裕农民和富农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有一部分甚至要废除**。应当向农民，向全体农民说：**发财吧！**（贝特兰强调——译注）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为了帮助贫农和中农，应当发展富裕农户的经济。**乍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是离奇的。42

在这次讲话中，布哈林显然是在做准备工作，为了让党接受几天后将采取的措施。他的话表明，当时积累问题是怎样与对农民中较富裕（well-to-do）阶层相对有利的路线联系起来的。根据这条路线，较富裕农民积累的一些储蓄也要由国家通过贷款抽走，并使之为国有工业的积累服务。

如此采取的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富农，但他们对积累增加的“贡献”，特别是对国有部门而言，仍是微不足道的，这就造成了1926年的政策转向**借助信贷扩张、货币通胀和价格演变来促进国有部门积累的增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特别影响了贫农和中农。**

各种数据表明，NEP的实施方式造成了它在一个目标上的失败，即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在工业品的消费方面。

#### 城乡在工业品消费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1923年至1927年期间，农村人口在工业品消费中的所占份额**稳步下降**。43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中期（1925-1926年[1928年的情况更糟]），农村地区的人均消费（几乎涉及所有工业品）**低于战前**，**勉强达到城镇人均消费的1/4**。44

当然，农民中不太富裕阶层的消费水平比**平均**数字所显示的要低得多。

这种状况表现了“NEP的真实情况”的弱点。部分原因是未能合上剪刀差，部分是因为农业产量的**净销售份额**（这一份额使农民能够购买工业品）很小，还有就是农村地区的商品短缺。最后这一点需要澄清，特别是因为，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派对NEP危机的解释，危机是由于农业的“过度需求（excessive demand）”——也就是说，由于形势决定了要优先发展工业，工业“融资”必须由农民负担。让我们看看农民对工业品的总体需求是如何演变的。

#### 农业“剩余”与对工业品的需求。45

根据S. Grosskopf的估算，在扣除税收和其他费用后，农民销售的净余额从1912-1913年的13.47亿卢布，下降到1925-1926年的9.8亿卢布。46以1912-1913年为100，这一余额的指数在1925-1926年为72.7。撇开农民可以从非农业活动中获得的现金收入（我们知道这种收入已经减少了）和现金储蓄（这不会显著影响所考虑的金额），**相关的余额代表了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在1912-1913年和1925-1926年之间，这种需求因此下降了27.3%。47此外，这显示的是以**货币形式**表达的需求，而非需求的**数量**，它受到工业品零售价上涨的影响。

在1925-1926年，工业品的价格是战前的2.2倍。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量成比例地减少，所以我们必须用33替换72.7。

后来几年有了一定的改善。如果我们接受扣除税收和其他费用后的农业净余额与农产品净销售量成比例增长的事实，我们就会得到以下情况：48

**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指数**

(1912–1913 = 100)

1926–1927 75.2 1927–1928 80.2

在这最后两年里，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量显然增加得更快一些，因为工业品价格下降了。事实上，在1928年，正如我们所知，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49

这几个事实足以说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派对新经济政策危机的解释具有形式主义和抽象的特点，50他们把“工业品短缺”归因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工业落后于农业”的情况。实际上，农民的需求丝毫不能说明工业品的短缺。工业生产量和农村地区对工业品的货币需求各自动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以1913年为100，工业生产的指数达到以下水平：51

1925–1926 89.9

1926–1927 103.9

1927–1928 119.6

1925-1926年，如此，工业生产指数超过了农民对工业品需求12.2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差距越来越大，1926-1927年为28.7，1927-1928年为39.4。

如果存在工业品的短缺，那么首先必须在城市部门特有的再生产条件中寻找原因，而不是在农村。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和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薄弱，而且农民本身所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总体上不利于加强工农联盟，因此城市部门所发挥的作用产生了更加消极的后果。

注释

* 1. 《列全》，43卷，“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
  2. 因此，列宁在描述苏维埃农民时经常使用的说法是“勤劳的（“hard-working）”和“热心的（zealous）”。
  3.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169.
  4. See above, pp. 94 ff.
  5. 总销售份额（total marketed share）是指总销售量与总产量之间的比值。这个份额必须与净**销售量**（net *amount marketed*）的份额区分开来，净销售份额是指从总销售量中减掉农民购买的农产品数量，并把这个数字与总产量联系起来而得的。净销售份额并不代表农民农场与市场之间联系的演变，而是代表来自这些农场的对非农业产品的需求。这里的估计值来自L. N. Litoshenko’s article, “Krestyanskoye khozyaistvo i rynok,” in *Ekonomicheskoye Obozreniye*, no. 5 (1925); quoted in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167.
  6.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168.
  7. For some figures, [see above, p. 157.](#_bookmark91)
  8. Calculated from Kontrolnye tsifry, p. 73.
  9. On these points see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67 ff., 347 ff., above, p. 157 ff.
  10. 直到1927-1928年，农民之间的产品交换数量与往农村外销售的数量差不多(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pt. 2, p. 916).
  11. 这些百分比是总营业额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大小受到农产品购买价格的影响，而农民市场上买主开的价格，要比国家采购机构的价格高。例如，1926年，1普特（16.4公斤）黑麦在农民市场上的售价为1.03至1.44卢布，但国家以0.94卢布购买 (see B. Kerblay, *Les Marchés paysans*, pp. 112, 114)。1928年3月，在乌克兰，农民市场上的黑麦价格是采购机关所付价格的126.3%；1929年3月，市场价上升到此价格的369.2%。(See *Ekonomicheskaya Zhizn*, April 26, and May 1, 1929, and *Torgovo-Promyshlennaya Gazeta*, April 6, 1929, quoted in A. 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70.)
  12. 其他的人（约86万）要么是城市手工业者，要么是受雇于小规模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人（不到8万）(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 . pt. 1, pp. 390–391).
  13. Yu. Larin, *Chastnyi Kapital v SSSR*, pp. 119–120.
  14. *Torgovo-Promyshlennaya Gazeta*, July 5, 1929.
  15. See below, p. 205 ff.
  16. See below, p. 203 ff.
  17. 国家贸易和合作社贸易之所以长期不能取代乡村的私人贸易，主要是由于小贩和店主满足于比国家与合作社机关经理、官员所要求的更简单的设施。后者经常坚持要有一个合适的商店和一辆货车，而他们的对手却只用一个棚子和马匹来运输。
  18. 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242.
  19. 同上，p. 67.
  20. *Ekonomicheskaya Zhizn*, November 14, 1928, quoted in 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70. 能够提供上述收据的农民应当会优先得到供应。
  21. “剪刀”一词用来指表示工农业产品价格变动的图表所呈现的画面。有人说，当这些价格互相偏离时，“剪刀正在张开”，而当它们接近时，“剪刀正在合上”。当价格达到1918年的**相对**水平时，剪刀被认为已经“合上”。
  22. 1927-1928年，国家计划的购买量相当于市场产量的以下部分：100%的棉花和甜菜；98%的亚麻和烟草；92%的皮草；80%的兽皮；70%的羊毛(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62).就一些重要的农产品而言，如大麻和亚麻，市场上销售的产量比战前少。(*Ekonomicheskoye Zhizn*, May 3, 1927; see also Richard Lorenz’s thesis, *Das Ende der Neuer Ökonomischer Politik*, p. 28, and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Table 209, p. 352.)
  23. 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63.
  24. 1926-1927年，制定粮食低价采购的趋势特别明显。这一年，粮食的采购价格指数（1911-1914年的价格水平为100）为118.7，而国家采购产品的整体价格指数为133.9，所有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包括个人和私商的购买，为149.3(Kerblay, *Les Marchés paysans*, p. 119). 上文已经提到了1926年、1928年和1929年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其他例子(see note 11 above, p. 159).
  25. See above, p. 148.
  26. 1926-1927年，粮食的采购价格降低了20%，然后小麦和黑麦的价格分别比农民在私人市场上能卖出的价格低25%和50% (Kerblay, *Les Marchés paysans*, p. 118).
  27.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335.
  28. 特别是由于收购机关通常没有成功地向农民提供他们在签订“合同”时承诺提供的大量化肥、精选种子等。这就加剧了农民必须遵守的义务之**单方面性**。
  29. See note 21 above, p. 160.
  30. 当时有关于“剪刀危机（scissors crisis）”的说法。
  31. 这些数字是根据Kerblay, *Les Marchés paysans*第119页的表11的最后一栏计算出来的。该指数显示了由生产者获得的农产品出售价格与制成品零售价格（公营和私营部门的加权指数）之间比率的变化。加权的方式显然会影响到指数的变化，这里的表格没有考虑到公共部门在乡村的份额小于城镇的事实，因此，农民的情况比显示的还要糟糕。关于考虑到这一因素的计算，见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p. 195–196.
  32. 根据第151页上的表格的同一来源计算的。
  33. 对于1913年，记录的价格当然是市场价格。
  34. 只限黑麦。
  35. A. N. Malafeyev, *Istoriya tsenoobrazovaniya SSSR, 1917–1963*, pp. 384-385. Coefficients calculated from indices with 1913–100.
  36. Baykov,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p. 67, quoting *Inland Trade of the U.S.S.R. During Ten Years*, p. 82. 当然，1913年的数字显示的是市场价格。
  37. See above, p. 147.
  38. *K.P.S.S. v rezolyutsiykh*, vol. I, pp. 922–932.
  39. Ibid., p. 927.
  40. 关于1922年的《土地法》，见本书第一卷。关于1925年的改革，见*Sobranie Uzakonenii* (1925), no. 27, art. 191; and Carr, *Socialism*, vol. I, pp. 257–258.
  41. *K.P.S.S. v rezolyutsiykh*, vol. I, p. 927, and Carr, *Socialism*, vol. I, p. 268.
  42. 《真理报》，《我党在农民政策方面的新任务》，1925年4月24日。布哈林的这篇演讲的修订版发表在《布尔什维克》4月30日和6月1日（1925年第8期和第9/10期）。在这个版本中，“富农（kulak）”一词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富裕农民（well-to-do peasant）”取代。尼·布哈林等人的《苏联的农民问题》有一个法语译本（*La Question paysanne en URSS*），pp. 139 ff.
  43. 在1923-1924年和1926-1927年间，它从59.4%下降到53.2%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206).
  44.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分配，1925-1926年农民的人均食品消费比战前要多一些，就不太富裕的部分而言，肯定有所改善。然而，农民家庭的小麦面粉、糖、肉、熏肉、脂肪和鸡蛋的人均消费量**仍然低于体力劳动者和办公室职员的家庭**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Table 92, p. 170, and Table 96, p. 174).
  45. 也见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其他意见，above, pp. 141 ff.
  46. Grosskopf, *L’Alliance ouvrière*, p. 197.
  47. 根据Kerblay, *Les Marchés paysans*, p. 119计算.
  48. 这些数字采用的是所考虑年份的一系列控制数字中所显示的农业净销售量增长的百分比，即假设税率和其他费用保持不变：这引入了一个似乎难以纠正的微小误差。
  49. See above, pp. 146, 152.
  50. 1922年3月，俄共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农村工作的论文，并在讨论了列宁的批评后拒绝了这些论文，列宁指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抽象的形式主义（《列全》43卷，“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同样的形式主义也出现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后来的著作中：见Grosskopf的一些重要引文：*L’Alliance ouvrière*, pp. 188 ff.）
  51. 这一系列数字由Gosplan编制，为整个工业的生产使用 (E. Zaleski, *Planning*, pp. 380–381)

## 3. 农村地区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再生产与转变

本章讨论的问题特别庞大，也特别复杂。关于这些问题的现有信息通常是不充分和不可靠的。因此，我们不会在这里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而仅仅指出轮廓和主要方面，因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这些轮廓和方面已经变得很明显。显然，只有进行意义深远的补充研究（特别地，这需要查阅苏联档案，而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才有可能对我们在这只能触及到的问题进行真正系统的处理。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看，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苏联农村情况的特点是，农民没有很好地融入苏维埃制度，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中间的渗透力很弱。这些情况与党和苏维埃在农村的活动水平低下有关，还与村社（mir）、家庭和教会中所体现的，形式几乎没有改变的旧意识形态关系的再生产有关。

### 3.1 党在农民中间的建设情况

我们知道，在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紧张的。1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之一，正是为了减少这种紧张，从而加强工农联盟。毫无疑问，从1921年到1927年，新经济在加强农民对苏维埃政府的信心方面是成功的。这尤其适用于他们对政府恢复经济的能力的信心。从1923年到1927年，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种进展在1928-1929年由于“盲目”地实施“非常措施”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损害。

然而，农民相信对新政府有能力管理经济，与他们准备积极支持这个政府——甚至更进一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农民入党，就不能在农村产生有效的思想影响，也不能在没有真正了解他们问题的情况下，有效地掌握农民的利益，从而能够形成自身对农民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治中地位的概念。

至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民人数，以及党在农村的工作，情况还很不理想。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农村地区的建设（implantation）状况仍然很弱。斯大林在提交给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到，2农村基层党员人数占农村成年人口的比例，从第十三次党代会时的0.26%上升到第十四次党代会时的0.37%。如此低的比例与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个主要是农村的国家中必须执行的农村任务之重要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组织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去的遗产，但它也反映了党在农民问题上的路线弱点。

在评论所引用的数字时，斯大林说：

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我并不想说党在那里必须一日千里地发展，但是我们农民党员的百分比终究还是很低的。我们党是工人的政党。这个党内总是要工人占多数的……但是下面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同农民联盟，那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的成分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优秀农民……从这方面来看，情形暂时还是不大好的。3

所引用的数字也没有完全暴露出党在农民中的弱点，因为农村基层小组的党员并非都是农民。根据CC在1927年1月的统计，村小组的成员中只有不到一半是真正的农民——其他成员是苏维埃机构的官员、合作社的雇员、教师等等。4在这些成员中，有些可能是农村出身，**但他们不再是农民了**。如果我们要对NEP中期在农民中党的建设状况做出估计，就需要把引用的数字减掉大约一半。

应该补充的是，1927年真正的农民只占党员总数的10%，而这个国家的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5

在整个NEP年代，党在农村地区的扎根状况仍然极其微小：1928年，农村小组中只有18.6万名党员，1929年为24.2万名。6然而，当时国家和党所经历的危机范围之大，以至于为了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1929年4月23日至29日）认为必需“清洗”党员，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小组中。这次会议宣布，只有清洗才能把这些小组“变成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支撑点，加强对党的信心，把最好的共产党员带入党的队伍......并促进农业的集体化。”7

实际上，当苏联进入大规模集体化时期时，清洗已经在进行，而农村的基层还没有被重建。总的来说，**集体化是在党的地方机关无法控制它的发展方式的情况下展开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结束时，党在农村的基层小组的社会构成远不能令人满意：富农和较富裕农民在党组织中的比例实际上高于他们在整个农村人口中的比例。81929年在农村共产党员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RSFSR内，四分之一的党员拥有超过800卢布的资产，而在整个农民中，只有六分之一的农民拥有这种资产。在入党的农民中，许多人成为官员。除了他们之外，党员主要是中农——也许是工资劳动的雇主——有必需的时间来充分参与党的活动。9

在农村的共产党员中进行特殊清洗的部分原因，是农村基层组织在质量上存在弱点。在1929年至1930年期间，农村基层小组有16%的人被驱逐，而工厂基层小组只有8%的人被驱逐。10然而，这次清洗的规模不仅是由于上述形势，也是由于某些党员干部对农民普遍感到不信任。事实上，让人吃惊的是，在“非生产性”单位的小组中，清党程度要小得多（10%），尽管党的一项决议将这些小组描述为发生最严重滥用权力的单位（为自我谋利而滥用党员权力，挪用资金、裙带关系、追求名利、对群众的官僚主义态度）11、在这些单位可以看到“日常形式的腐败”，且集中了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人、官僚化分子以及来自其他党派却保留着旧思想观念的人。

对农村基层小组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清洗，也是由于当时在农村工作的许多党员的无能和墨守成规。许多报告显示，即使是政治上可靠的、致力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也不能胜任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发布的命令多于解释，而且由于缺乏对农民生活的了解，他们所做的解释仍然是抽象、远离现实的，甚至常常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们经常无法说服人们，或者颁布不恰当的法令，引起人们不满。12然而，开除党籍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和裙带关系，或与党员身份不相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13

总而言之，党在农村的运作条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符合形势的要求。从数量上看，在新经济政策结束时，真正是农民身份的农村基层小组成员只占农民总人口的0.1%左右。因此，党只能艰难地发挥其作为农村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作为在农民中介绍无产阶级思想的机构，以及作为联系苏维埃政权和农民群众之纽带的作用。党的这一弱点影响了农村苏维埃的运作条件：它们运作得很糟糕，反过来，它们糟糕的运作也对党本身产生了消极影响。

### 2.2 农村苏维埃

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当 1921 年的农民起义还是刚刚发生，农民中的不满运动并不少见时，农村苏维埃几乎与群众没有联系。他们的组成经常由党的决断确定，而确认这些决断的选举只有少数农民参加。农村苏维埃并不是真正的群众组织。

1924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专门致力于解决农村苏维埃问题。10 月 26 日，斯大林就“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向CC发表讲话。14他提请注意农民对城镇的不信任、许多农村地区的不满情绪、农民起义的风险仍然存在，以及必需发展农村苏维埃。他把这种需要与非党组织——农民委员会、合作社、共青团组织——的蓬勃发展联系起来，这些组织的繁荣是那一时期的一个特点。15在他看来，这些组织的蓬勃发展有脱离党的指导的危险，而农村苏维埃的发展可以使工人阶级完全发挥其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作用。16

几天前，即10月22日，斯大林已经在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些问题。17他特别强调了重新活跃苏维埃的必要性。在谈到格鲁吉亚几个农村地区发生的叛乱时，他说：

如果我们不根本改变对待农民的态度，如果我们不在党和非党员之间造成充分信任的气氛，如果我们不倾听非党员的呼声，最后，如果我们不使苏维埃活跃起来，给农民劳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开辟一条出路，那末俄国各地都会重演格鲁吉亚发生过的事件。18

使苏维埃重新活跃被视为一种形成**积极分子核心**的手段，在这些积极分子中，**共产党可以招募到一些人**，而**农民则可以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

斯大林认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对党处理农民问题的方式进行彻底的改变。“[党——贝特兰补注]必须根本改变对待非党农民的态度，摈弃发号施令的作风，在党员和非党员之间造成相互信任的气氛。”必须为使农村苏维埃活跃提供“物质基础”，办法是“编造地方预算”，并赋予其收税权。

虽然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而且现在被认为是党的惯例，但这些讲话中所表达的方向与实际执行情况是非常不一致的。它们被反复提到，直到新经济政策时代的结束。因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之后，斯大林在1925年5月重复了他在1924年说过的话；但他把一些观点说得更尖锐了。在向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大会介绍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定的这些任务的总结时，他这样描述这一立场：“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地而又不断地实现消灭农村中旧的行政管理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路线，实现活跃苏维埃的路线、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选举机关的路线以及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原则的路线。”21

党的农村干部对扩大苏维埃民主的路线进行了相当大的抵制。这一点在斯大林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他在报告中批评了这些干部的工作作风，同时也显示了农民是怎样对政治生活觉醒的。他首先谴责了一位地区书记的行为，他是这样描绘其态度的：“‘我们干吗要报纸呢？没有报纸倒安静些，好些，不然，农夫们一读报就会提出种种问题，那简直麻烦透了。’”

然后他又说：“这位书记也算共产党员！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种不幸。”22

这些宣言和决议是否具有广泛的影响还远远不明显，因为人们认为有必要一直重复这些宣言和决议，直到NEP时期结束。然而，变化确实发生了。例如，更多的农民参加了选举。1923年的投票比例（the proportional voting）只有30%，1925年达到45%，在1920年代后半段上升到农民全体选民（electorate）的一半以上。23

然而，我们决不能高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农民参加选举的比例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民受到压力的结果。农村苏维埃的活动或农民群众对这种活动的兴趣并不总是随之相应地增加。

在农村发展真正苏维埃政权的障碍之一是，富农在NEP时期对一部分农民群众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乡村苏维埃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不足，这使它们无法开展任何真正有用的活动。与此同时，传统的农民组织形式继续存在，而且它通常拥有苏维埃所缺乏的物质和财政手段；24因此，它们往往看起来比后者更“有效”，而且它们经常被富农支配。

最后，党的地方干部和地方苏维埃官员的态度，他们的“专制主义”，阻碍了村、区苏维埃的活动。

这种“专制主义”并不是来自有关官员的“心理”，而是来自于他们的阶级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苏维埃机构的官员（他们往往是沙皇政府的前官员）把当地的实际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除非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们不会自发地放手，让自己接受群众的控制，或允许后者管理自己的事务。只有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才能改变这种行为，但由于党在农民中的存在感不足，这种斗争很难发展，因此农民群众往往通过他们的传统组织，像村社大会（skhod），来管理他们的事务。

1925年6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农村苏维埃的情况非常不令人满意。他说：

到目前为止，情况是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同县（uyezd）和省（gubernia）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结果，一方面是管理者的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任意横行，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25

斯大林注意到，农村苏维埃的选举往往不是真正的选举，而是一种官僚手续，它使“一小群害怕丧失权力的管理者用许多诡计和压力来私拉‘代表’”成为可能。26

由于出现上述情况，在1925年和1926年组织了新的选举。为了打击以前的选举做法，投票权被扩大到了迄今为止被剥夺了投票权的某些类别的农村人口上。27

实际上，鉴于当时农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平衡，加上党在农村的组织薄弱，富农往往能够进入农村的苏维埃，这显然没有使后者更有能力满足农民群众的真正需要。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揭露了富农对农村苏维埃的渗透。其中一篇文章指出：自从苏维埃开始在乡村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后，富农就加大了对他们的控制力度，将其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尽管党组织在这些选举中比往年显示出了更多的力量[1926年？]，但在某些情况下，不对[选民]施加压力或采取行政手段的指示被理解为停止党对选举活动干预的命令。28

其结果是富农或其“代表”对苏维埃进行了渗透。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由于较富裕农民对一部分中农的意识形态影响造成的。1925年初，斯大林注意到在一些农村地区存在这种影响29——当时他正在警告人们不要试图挑起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30

富农渗透到农村苏维埃的另一个原因，是富农对贫农和中农阶层施加的经济压力。富农在村里的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使这种施压成为可能，因为他们租赁土地，出租生产资料（犁、马等），并且是一些贫农和中农的债权人。这些对富农的依赖关系反映在农村苏维埃的组成及其活动中。

活跃苏维埃的口号要求党的农村基层小组尽一切可能帮助农民群众从农民中富裕阶层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自己掌握自己的事务。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这一口号一直列在日程表上，这表明下达的任务仍未完成。因此，1926年11月，加里宁在RSFSR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上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广大群众参与苏维埃建设，也就是重新活跃苏维埃。”31

实际上，在1929年初，村苏维埃的活动还很不充分。农民认为村苏维埃是“一种人为产物，不享有传统本土农民单位，村社（mir）的威信和效力”。32当时有超过72000个农村苏维埃，每个苏维埃覆盖几个（平均8个）村庄或“有人居住的地方”。每个农村苏维埃平均有18名成员，但他们举行会议很不定期，通常只有5到7名代表参加。甚至每年只有一两次全体会议，而苏维埃的工作则由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和书记来进行。这些人工资很低——仅仅是补充其他生计来源的微薄收入——他们经常放弃工作，去做收入更高的工作。农村苏维埃主席几乎不识字，几乎没有能力阅读中央政府或地区苏维埃发行的文件，这种情况并不罕见。33

总而言之，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除了富农所扮演的作用外，真正重新活跃农村苏维埃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党在农村的弱势，许多干部对农民的不信任，农民意识形态中存在矛盾，而这些只有通过党积极推行的政策才能得到改变——这一政策旨在加强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快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团结贫农和中农的积极性，改变“土地公社（land community）”和村社大会的运行方式。

### 2.3 “农民意识形态”中的矛盾和布尔什维克党控制外的思想中心在农村地区的作用

由于农民中存在着不同的、相互冲突的阶级，“农民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些相互矛盾的观念共同构成了农民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的思想形式，他们以这种形式进行斗争，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或接受，或阻挠。

#### 宗教观念

由东正教会、宗教派别和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宗教思想，构成了社会保守主义的巨大力量，而布尔什维克党经常无法与之抗争。很多时候，党员试图正面攻击这股社会保守主义力量，而非绕过它，为其矛盾的发展做准备。这种正面攻击通常以失败告终。斯大林在1924年10月《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讲话中是这样谈到这个问题的：

某些同志有时把农民看做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以为只要做一次自然科学的讲演，就足以使农夫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他们往往不了解，农夫是从经济观点去看上帝的，就是说，农夫有时并不反对摈弃上帝，但是怀疑往往使他们苦恼：“谁知道呢，也许真有上帝；既敬拜共产党员，又敬拜上帝，使庄稼更靠得住些，不是更好吗。”谁不估计到农民心理的这个特点，谁就完全不懂得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谁就不懂得在反宗教的宣传问题上即使对农民的偏见也需要谨慎小心。34

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时，通常是避免对宗教的正面攻击，因而宗教思想能给党的活动带来的障碍也被避免了。但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当时发起的正面攻击往往以负面结果告终，许多农民聚集在富农和宗教捍卫者的周围。

#### 村社大会和村社

农民能够独立于城镇和国家而存在的想法也是农民意识形态中的一个要素。这种思想在村社（已经转变为“土地公社”）和skhod（即每个村庄的村民大会）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这些都是意识形态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们的存在有助于削弱乡村苏维埃的力量，支持了一系列抵抗工农联盟的做法，这些做法为富农的磨坊带来了粮食。

可以回顾一下，1922年的苏维埃《土地法》承认“土地公社”或“土地组合”的合法存在。实际上，这是前村公社或村社的延续。原则上它是由村社大会（skhod）来管理的。《土地法》第54条赋予这些土地公社以法人资格。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共同拥有传统上属于村社的东西，这意味着它们拥有农村苏维埃所缺乏的物质和财政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来自为使用公共土地、树林和池塘而支付的费用。35土地公社也可以对其成员征税，土地公社被视为村庄里铁匠铺、锯木厂等的所有者。

skhod的权威为大多数农民所接受，因此，村社（或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同类机构）享有比乡村苏维埃大得多的权力。1926年提交给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村社大会往往被富农所控制。贫苦农民甚至常常认为参加skhod的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他们参加了会议，也很难被听进去，甚至有时被赶出去。在1927年召开的第十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抱怨说，当时只有10%到15%有权参加skhod的农民真正参与其中，而这少数人主要由村里的富裕分子组成。36

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了skhod和其他发挥类似作用的传统农民组织所带来的问题。一位报告员指出，这些组织的年收入总额在8000万到1亿卢布之间，而村苏维埃可支配的资金只有1600万卢布。37在1927年为共产主义学院建设研究所（Orgburo, the Communist Academy’s Institute for Building）准备的一份文件中，苏维埃得出了以下结论：“经济上独立的土地公社将村苏维埃置于其监护之下。乡村苏维埃对土地公社的物质依赖，一方面阻碍了苏维埃及其下属部门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活跃，另一方面是土地公社skhod接管乡村苏维埃工作的基础。”38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谈到了农村存在的“双重权力”：农村苏维埃的权力和skhod的权力（回顾一下，skhod是一个村社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贫穷和不富裕的农民没有什么分量）。这次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改善苏维埃和土地公社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前者发挥主导作用。”40然而，在实践中，这项决议仍然是无效的。因此，一年半后，1929年5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听取了一份官方报告，其中指出：“乡村苏维埃仍然……依赖于土地公社，从他们那里得到非常多的资助。”41

为加强村苏维埃而进行的斗争，尽管在村苏维埃获得一定的财政资源并取得物质成果时取得了成功，但总的来说仍然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skhod有时甚至设法增加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变成一个“选举委员会（electoral commission）”，甚至起草村苏维埃的选举人名单。（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苏维埃和乡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后者在政治上支配着前者，就像它经常在经济上支配着它一样，例如，通过提供村苏维埃书记的工资。）传统的组织形式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在意识形态上有相当大的影响。skhod所支持的实践制度奠定了一套矛盾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的再生产。具体来说，存在着村庄自治、平等和村社的内部团结这些观念。

#### 村庄自治的观念

村社和skhod控制着土地、树林、铁匠铺、磨坊等，这就产生了村庄自治的虚幻概念，即村庄**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存在，足以自成一体。44

这种想法为**村社之外的组织干预村庄生活**设置了严重**障碍**。因此，乡村苏维埃从属于skhod的趋势，虽然被富裕农民在skhod中的作用在政治上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但它内在固有于村社的意识形态中。只能通过特定形式的阶级斗争来对抗这种现象。

与此同时，乡村“自治”的思想对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产生了相对的不关心。这被视为“两个世界”，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把统一这“两个世界”的生活标准——物质生存条件——的任务放在首位，很容易被当作是放弃乡村生活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被视为乡村“自治”的必然对应物。

的确，这并不排除提出“经济要求”，但这些要求并没有以“缩小差距”的方式表述。在NEP时期，城乡条件差异扩大的趋势**本身**并没有引起对抗其影响的斗争。在评价解释为什么这种趋势在那个时期能够发展，而没有遇到大规模抵抗的因素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最后，每个村庄自治的观念，对几个村庄的农民为了共同目标而“结盟”的构成了障碍。这方面也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城乡居民之间不平等的扩大并没有自发地产生旨在遏制这一差异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贫农和中农通过改善交换条件来改善自身条件的斗争仍然很薄弱。矛盾的是，村庄的**相对**自治（这是一个现实）和城镇对农村的依赖（在当时这比农村对城镇的依赖更大），作为一种规则，并没有成为村民可以用来确保更好交换条件和更好的工业品供应的“武器”。

因此，对于布尔什维克组织贫农、中农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来说，乡村的自治意识形态之再生产起到了消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然而，自治观念可以成为**依靠自身的资源进行发展这一观念的**载体——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过多强调这一点。

总结这一点讨论时，也许用“幻觉（illusion）”这个词来描述“村庄自治”的想法是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种幻觉，因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村庄的生存和经济发展确实依赖于城镇和城市活动：它依赖金属、部分设备、精选的种子（其使用开始变得广泛）等方面是依赖城市的。然而，这种依赖性在性质上仍然是相当次要的，因此，所讨论的幻觉与某种物质性社会现实相对应，它的力量来自于这种现实。而这种幻觉，如果不通过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加以有效打击，往往会阻碍工人和农民真正联盟的道路，没有这个联盟，穷人和农村群众的中间部分就无法推翻富农的统治。45

#### 村社的内部平等思想

农民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所有农民在乡镇中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它背后的起因——是由skhod进行的定期土地重新划分。46

然而，这种“平等”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种幻觉。我们已经看到，对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和财政资源的占有，是真正不平等的根源，而这些不平等的影响又因它们所引起的政治不平等而加剧了。因此，村社的首领通常是富裕或较富裕家庭的成员，尤其是首领，即Starosta，或“长老”，他在skhod中起着主导作用。鉴于划分土地而没有对劳动工具进行相应的再分配，鉴于这些工具最基本的磨损，富农的社会与政治权力得以维持，有时甚至得到了加强。47

公社运作的方式本身就有助于平等主义幻想的再生产。虽然土地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有利于富农，但它也使中农群体按照NEP时期特有的社会分化过程而变得更加强大。

在这一时期进行的调查表明，skhod主要是继续按革命前的方式运作——它的集会通常由跟以前相同的家庭召集和主持，由同样的人或他们的后代担任长独立的老的角色。48

虽然村社内部的平等思想是一种幻想，但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利用这种观念作为武器，从内部改造村社和skhod，努力确保贫农和中农事实上享有他们在理论上该有的所有权利。但实际上，沿着这些路线进行斗争的例子很少，也不多。党首先试图给农村苏维埃注入活力，但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因为它认为村社是一个过时的机构，注定会枯萎，无法成为革命活动的框架。这种态度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49但主要是由于党在农民中的基础薄弱，使得它在skhod（纯粹的农民大会）中比在工人、农民和办公室职员都有代表的苏维埃中更难运作。

需要补充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倾向，对所有“平等主义”观念都持怀疑态度，这无疑是通过对马克思曾经强调平等要求之局限性、指出“平等权利”50思想如何属于“资产阶级权利”有限背景的言论进行片面理解而达到的。这种片面的理解与拿着高薪的专家、工程师等人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不无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会导致无法将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引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改变它们**。

#### 与“农场独立性”和“村社内部团结”相关的思想

skhod和村社的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意识形态组织所再生产实践，滋生了两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思想：**分配给某一家庭的农场之独立性**，与村社的内部团结思想。

第一种思想与公社的土地在家庭之间的划分有关，这意味着农场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它构成了**父权制家庭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被父权制统治和从属于其的关系的物质基础，因为分割的土地是分配**给家庭**——**实际上是分配给“户主”**——而不是给个人的。

村社内部团结的观念是在强加给土地组合成员的各种义务中、他们应提供的各种“互助”形式中得到实现的。

正是在这第二种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思想的最终表现是决定不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按照1922年的法典所允许的）成立**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s*），共同耕种土地——才有可能在skhod内部为社会主义形式的劳动和生产进行斗争。

事实上，在贫农和中农的推动下，特别是通过公社的一些成员为了建立**集体农场**而**分裂**出去，确实存在着不少发展了集体的劳动、生产形式的例子。51

但总的说来，这一运动只是以有限的方式进行的。直到1927年底，党才开始真正支持它，即使如此，也还是犹豫不决，因为它没有形成党所赞成的**大型农场**，这既是出于“原则”的考虑，也是因为它们更适合于**机械化**。

布尔什维克没有认真利用NEP时期农民意识形态中的矛盾。它首先试图直接解决使贫农、中农与富农对立的矛盾，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有限的。它允许传统的组织形式在现实中生存，而当它们解体时，产生新集体形式的情况却是极少数。

在此基础上，“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心继续存在，其形式几乎没有改变：父权制家庭、教会、宗教派别。同样——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苏维埃的学校也被改造了，变得越来越公开的资产阶级化。

#### 苏联的学校和学校的意识形态

在乡村一级，小学是再生产和改造教育系统意识形态的主要中心。在苏维埃政权最初的几年里，学校是雄心勃勃的革命变革**计划**（*projects*）的主题。52然而，由于缺乏手段，也由于教师的抵制，这些**计划**对现实几乎没有影响。

1923年，即新经济政策开始两年后，这些除了少数“试点实验”外从未实现的项目被搁置了。卡拉什尼科夫在192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教育社会学的著作，用他的话来说：“早年的浪漫主义被引导到了实际成就的基础上。”53

换句话说，**重建经济**与**在农村**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者的迫切性占了上风。虽然在城镇，在幼儿园和中小学进行着“改革”实验，54但在农村地区（在富农和中农以及一部分贫农的压力下）占主导地位的是恢复“严肃教育”，恢复“基于选择和竞争性意识形态（分数、考试）的社会进步学校……导致学校恢复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地……”55这种类型的学校是“耐普曼”和大多数经济与行政机关干部所希望的，它也符合大多数教师的意识形态。

在NEP时期统治村庄的保守思想的再生产方面，正在回归生活的学校，56与家庭、教堂、村社和skhod，乃至与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载体所渗透的经济组织一起发挥了作用。

当然，当时统治着苏联农村的观念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持有的（因为一部分中农和贫农坚持社会主义思想，即使他们没有入党），但尽管如此，它们确实广泛地确保了富人和权贵在农民中的“权威”以及对乡村里社会等级的“尊重”。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未能正确处理农民内部的矛盾，从而它在农村中扎根非常缓慢，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发挥持续影响的基础是相对有利的。57最后，从1928年开始，苏维埃政府发现自己面临着它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由于国家日益致力于特定形式的工业化，这些矛盾更加剧了。

此后，新经济政策最终危机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了。然而，在农民中并不能找到作为这场危机之动力的因素：它是由城镇中的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构成的。

注释

1. See volume I of the present work, especially pp. 355 ff.
2. 《斯全》7卷，《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3. 同上
4.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II, p. 481.
5. 同上，, vol. II, p. 481, and T. 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1917–1967*, pp. 52, 162. 即使我们不考虑实际的阶级状况，而是以阶级出身为标准，我们也会发现，农民出身的党员不超过总数的20%（见Rigby）。
6.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p. 189.
7.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 489.
8.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p. 170.
9. A. Gaister and A. Levin, article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arty’s rural organizations in *Bolshevik*, nos. 9–10 (1929), pp. 75–90, and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pp. 170, 171.
10.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p. 181.
11. *K.P.S.S. v resolyutsiyakh*, vol. 2, pp. 489–490.
12. 在斯摩棱斯克档案馆（落入德军之手，后被美军接管，转至美国，供研究人员使用：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 no. T– 87,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我们发现了许多关于党在国家和城镇的工作以及1917年至1941年期间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信息。特别是，这里有调查的结果和报告，显示了NEP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情况。Merle Fainsod在*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中转载了这些文献的一小部分：关于这里所说的内容，见第139页及以下。
13. 就整个党而言，1929-1930年的清洗统计显示，最常见的开除理由是“私生活和行为的缺点”，占22%，而17%的被开除者是由于“消极怠工”，17%是因为他们是“敌对分子或与之有关”。在12%的案例中，问题是“犯罪行为”，另外12%是“违反党纪”。22%的案例没有说明开除的原因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p. 180)。
14. 《斯全》，6卷，《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
15. 当时，这些组织中有许多不是由党员领导的，有时会发生他们支持党不赞成的观点或要求。
16. 《斯全》，6卷，《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见1924年10月25日至27日全会通过的关于“Immediate Tasks of Work in the Rural Areas”的决议，*见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第一卷，第906页及以下。
21. 《斯全》，7卷，《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22. 同上
23. “Iz istorii partiinogo stroitelstva,” in *Partiinaya Zhizn*, no. 20 (1957), pp. 80-96, quoted by O. Narkiewicz,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tate Apparatus*, pp. 69; 76, n. 16.
24. 见上文
25. 《斯全》，7卷，《问题和答复——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
26. 同上
27. Narkiewicz, *Making*, p. 72
28. I. Bogovoi, “Perevybory sovyetov v derevne i rasshirenii demokratii,” in *Bolshevik*, nos. 9–10 (1926), pp. 38–44, quoted in Narkiewicz, *Making*, pp. 71–72.
29. 《斯全》，7卷
30. 同上
31. Quoted in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2, p. 220.
32.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2, p. 250. On the *mir*, see volume I of the present work, pp. 78, 85, 213 ff., 236 ff., 440, 517.
33.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2, pp. 250–251.
34. 《斯全》，6卷
35. 水域和树林被收归国有后，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但土地组合继续处置它们，就像它们处置前地主的财产一样。耕地由土地组合分配给耕种的家庭。树林和未开垦的土地没有被分配，而是根据乡政府规定的规则，自由使用。
36. See notes 3 to 7, p. 244, of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2.
37. Ibid., p. 346
38. M. Rezunov, *Selskie sovyety i zemelnye obshchestva*, pp. 33–34;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2, p. 247.
39. *XV-y Syezd VKP(b)*, vol. 2 (1962), p. 1281; and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2, p. 255.
40. *K.P.S.S. v rezolyutsiyakh*, vol. 2, pp. 366-367.
41. *XIV-y Vserossiisky Syezd Sovyetov*, no. 15 (1929), p. 14; and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2, p. 247.
42. 可以看到，在斯大林发出号召的四年后，加强农村苏维埃的财政资源的口号几乎仍未见效。1929年5月，第十四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仍然号召为这些农村苏维埃提供预算制度 (Carr and Davies, *Foundations*, vol. 2, p. 258).
43. Ibid., p. 247, n. 8, quoting *Sovyetskoye Stroitelstvo*, no. 12 (29) (December 1928), p. 100.
44. mir这个词，俄语中意思是村社，虽然它的词源与意思是“世界”的mir的词源不一样，但会让人想到后者，这两个词经常被混淆。
45. 列宁强调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见《列全》，39卷，《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
46. 关于苏维埃活动的法律基础，见本著作第一卷。
47. Y. Taniuchi, *The Village Gathering in Russia in the Mid–1920s*, especially pp. 21–22; and Narkiewicz, *Making*, p. 125.
48. Taniuchi, *Village*, p. 27; and S. Zhdanovich, “Selskiye sovyety: zemelniye obshchestva,” in *Bolshevik*, no. 6 (1928).
49. See volume I of the present work, particularly pp. 214–215.
50.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1. See Zhdanovich, “Selskiye sovyety,” and Narkiewicz, *Making*, p. 127; also above, p. 100.
52. See volume I of the present work, pp. 168–169.
53. Quoted in D. Lindenberg, *L’l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et l’école de classe*, p. 293.
54.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毫不犹豫地从杜威、德可乐利和凯欣斯泰纳那里借用教育学说，他们在苏联的弟子也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验的启发（同上，第295页）。
55. Ibid., p. 295.
56. 1928年和1929年，由于对富农的进攻和当时提出的“文化革命”口号，NEP时期的那种学校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谴责它的决议甚至被通过。但从 1930 年到 1931 年，这些对“**经济建设**”任务的谴责仍然停留在纸面上，甚至教学实验也很快被放弃。教育领域恢复了最传统的资产阶级形式。
57. 甚至到了1926年，在某些地区，如斯摩棱斯克，尽管农民对苏联政府的总体态度被认为是“良好的”，但仍然秘密张贴海报，这些海报似乎是受到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启发 (Fainsod, *Smolensk*, p. 123, quoting the Smolensk Archives: VKP 249, p. 203).